

# 独立阅读

## 致力于公民社会的常识阅读

### 2010年10月

#### 细则

- 1、阅读报告力求独立但不宣称中立，撰写过程谢绝图书作者、出版者、发行者介入，观点尊重个人趣味，不求客观统一。
- 2、独立阅读执行编辑谢绝出版机构赠书，赠书将自动排除出推荐行列。师友赠书将注明图书来源，对于相关部分，读者可以抱十倍怀疑之态度。
- 3、独立阅读欢迎读者提出不同意见，将选登部分批评类读者来信，但谢绝只有观点没有论证过程的批评。
- 4、独立阅读观察员欢迎申请加入，但谢绝出版从业人员参与，来信烦请告知专长领域并附上阅读报告一份，连续三期撰写阅读报告将列入观察员名单，连续三期没有撰写视为自动退出；一年内在“独立阅读”发表三篇及以上文章者列入特约撰稿人名单，否则视为自动退出。
- 5、独立阅读欢迎订阅，凡订阅者将成为独立阅读的定向发行对象，在第一时间与独立阅读观察员、特约撰稿人共享阅读成果，读者来信、作者申请以及订阅事宜，烦请发信至 [shrbooks@gmail.com](mailto:shrbooks@gmail.com)。
- 6、更多即时信息，可见：<http://www.douban.com/group/duliyuedu/>。

**执行编辑：**苏小和、王晓渔、成庆、言一、汪伟、扬克、孙骁骥、灵子

**轮值编辑：**孙骁骥

**观察员：**文学：朱白（广州）、朱航满（石家庄）

经济：苏小和（北京）

思想：成庆（上海）

文史：王晓渔（上海）

艺术：言一（成都）

**特约撰稿人：**戴新伟（广州）、羽良（北京）、严飞（美国·旧金山）、刘柠（北京）、夏佑至（上海）、马慧元（加拿大·温哥华）、凌越（广州）、孙骁骥（北京）、罗四鸽（上海）、扬克（德国·图宾根）、孙传钊（上海）、贾葭（北京）

**翻译：**吴万伟（武汉）、朱芳艺（美国·孟菲斯）

## 编者按：

10月份，举世瞩目的文化事件莫过于诺贝尔奖的颁布，本期“独立阅读”推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巴尔加斯·略萨专题。与此同时，1991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依然被缅甸军政府软禁，11月13日软禁即将到期。昂山素季表示，她不会接受有条件的释放。缅甸何去何从？我们拭目以待。

## 目录

###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

经济：苏小和

写作：朱白

朱航满

思想：成庆

文史：王晓渔

### 阅读报告·台港海外

---

英国 孙骁骥：扶不起的英国贵族

日本 刘柠：当“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时候

### 专题·诺贝尔文学奖

---

略萨：文学有什么用？——提前宣告图书死亡

钟蓓：巴尔加斯·略萨：五分人生，三分想象

凌越：小说结构的魔法师

### 书评

---

朱白：一个激情、风骚并决绝的女人

戴新伟：“只得萧筒一字”

### 随笔

---

戴新伟：古色何以今香

严飞：制度建设与国人素质

### 艺术

---

吴强：当宪法也成艺术

### 音乐

---

马慧元：巴赫的儿子们

### 影像

---

王晓渔：“清纯”的政治学

### 访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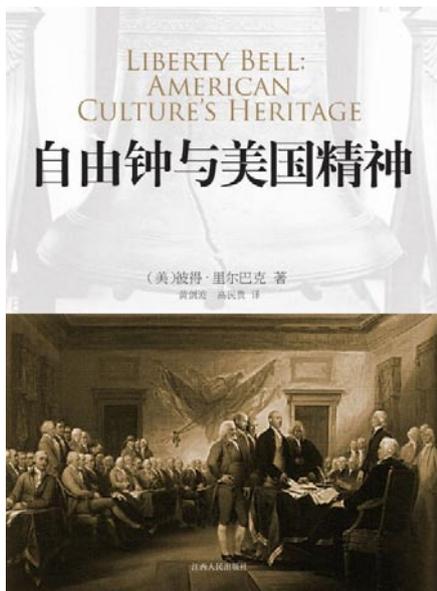
---

灵子：与时代同行三十年——徐友渔访谈

##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 ECONOMICS&SOCETY 经济·社会

观察员 苏小和 (北京, susumartin@hotmail.com)



这一段时间的阅读,有些所谓的无独有偶,竟然是集中阅读与美国有关的书籍。

熟悉美国历史的人们必然记得一个事实,真正代表美国自由精神的,不是那座坐落在纽约自由岛上高举火炬的自由女神,而是费城的自由钟。事实上自由女神是法国人送给美国人用来庆祝独立 100 年的一件礼物,而费城那座古老的大钟,则是早在 1751 年由美国人自己铸造。她甚至比美国 1776 年真正的独立要早 25 年,她是美国人奔向自由的进程中最醒目的里程碑。

彼得·里尔巴克博士的《自由钟与美国精神》(黄剑波、高民贵译,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就是以自由钟为线索,系统介绍美国精神的著作。自由钟的创意,取自《圣经·利未记》25章10节,“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里尔巴克说,“美国秉承着上帝的这一信息,致力于在这个充斥着专制的世界里,将自由与世人共享,也正是这一点,使得美国 and 美国人显得如此与众不同。然而,美国人对于自由不懈的忠诚也使美国和美国的价值观成为人们憎恨和污蔑的对象”。这样的表述听上去让人热血沸腾!某种意义上,人类自由的历史似乎正在沿着这口自由的大钟展开,几百年过去了,虽然作为物质的自由钟已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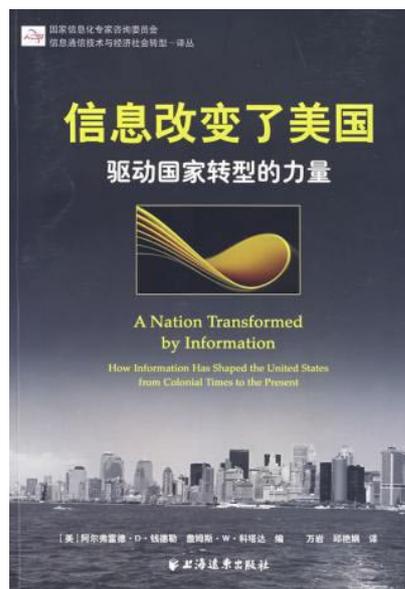
破败,自由的钟声没有销声匿迹,相反,人们对自由的追求却高涨,即使是封闭的朝鲜,即使是夜郎自大的中国,人们同样听到了自由的呼喊,人们甚至知道,只要你呼唤自由,美国的钟声就与你站在一起。

今天的美国,虽然还陷在金融危机之中,但谁都不能否认,她仍然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在韦伯开创的宗教社会学学术传统背景下,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理性化程度,就是去魅的过程。可以说,面度美国叙事,曾经用在欧洲社会发展分析的各种形式的学术理论,统统失效,都不足以解释美国传统,因为这个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国家,竟然有着最朴素的宗教性。很多去过美国考察的学者和官员,回来后很愿意用“美国是一个例外”的借口避而不谈美国,并由此认为美国的自由精神和国家制度建构,并不可以复制。

某种意义上,这本《自由钟与美国精神》正在站在美国历史与现实中的信仰的维度来叙述美国。里尔巴克沿着两条路径展开:第一,对自由钟的创意、铸造、运送、破裂、敲响等历史过程进行了细致的梳理;第二,对自由钟所承载的理念进行分析,也是美国在国际社会上各种内政、外交政策的要义所在。因此,里尔巴克博士所论述的自由钟的历史,同时也是自由理念的历史。

这条信仰的路径是如此优美!自由钟是费城的象征,也是美国精神的象征。它见证了美国最重要的事件:为第一次宣读独立宣言而鸣响;为合众国宪法通过鸣响;为送富兰克林远赴英格兰,召集市民讨论英国颁布《糖税法案》和《印花税法案》鸣响;为华盛顿的逝世鸣响。

说到美国的自由,除了信仰自由,我想另外一个最为醒目的标志,就是信息自由。著名的钱德勒和科塔达主编了一本非常有资料文献价值和历史价值的书《信息改变了美国·驱动国家转型的力量》(万岩、邱艳娟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9年1月),讲述的是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美国经济、社会发展变化进程中因为信息和信息技术而发生过的史诗般的传奇故事。这些传奇故事在每个传奇人物登场的时候,也都曾经闪烁过光芒。熟悉技术变革进程的工程师和管理者们,会如数家珍地将每个时



间进程中的历史事件、人物绘制在历史的场合之中。在一些细节的铺展之中，技术变革的神秘面纱，技术细节的发展演化对应于美国企业的兴衰、产业此消彼长、以及更加重要的经济社会转型，都在一种详尽的资料和故事中得以呈现。

这里其实隐含着—个信息技术进步推动自由秩序的美妙逻辑链。如果说未来中国的自由演进还存在某种希望的话，我会毫不犹豫把这种希望押在信息技术的引进与运用上。如果我们沿着这个路径发力，相信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中国人在这方面还抱残守缺，固步自封，那么结局将是相当悲观的。前几天，一位熟悉计算机技术的朋友很郁闷地跟我说，国外著名的网络存储服务 **Dropbox** 无法登录了。我能理解他的烦恼，据我所知，**Dropbox** 是一个优秀的在线存储服务，通过云计算实现网际网络上的文件同步，用户可以存储并共享文件和文件夹。这是一种崭新的互联网技术，此前，中国宽带产业基金的田溯宁先生不论在何种场合，都在极力传播云计算的理想，他甚至认为，中国人如果抓住了云计算这项新技术，那么在互联网领域，就再也不会受他人控制了。田先生还谈到，一家互联网公司退出中国市场，当然无伤大雅，但 **google** 代表了今天互联网行业最新的技术，这很有可能导致，在未来几年，中国的新经济将在技术层面落后于人。

工具理性意义上，任何一种性质的闭关锁国，都是对某种新技术的排斥。作为中国人伤心往事的鸦片战争，也可以沿用这样的分析框架加以解读。在充分彰显民族主义落后就要挨打的悲情之后，我们仍然必须强调，鸦片战争一开始只能定义成一次贸易战争，虽然这样的贸易过程中明显带有暴力、野蛮和毒品色彩，但贸易仍然是最主要的方法。其次，等到真正的兵戎相见，我们发现，中国人和列强之间的抗衡，事实上是一种新技术的抗衡，这包括了武器装备、贸易谈判等诸多技术指标。可叹中国人还处在长矛短刀的冷兵器时代，而列强的手里，却是步枪与火炮。新技术的缺席，再一次将中国人拖后。一个不太恰当的设想是，如果没有列强发动鸦片战争，如果中国一直坚持明朝的海禁政策，我们与西方工业革命的技术成就还要隔离多久呢？即便是 1978 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政策，本质意义上也属于一种技术层面的拿来主义。我们并没有真正学习发达国家的宪政制度，这纷纷扬扬的 30 年发展，首先是一种发达国家新技术的为我所用，其次是对国际市场的技术性参与。中国最近一百年的历史，基本上是一部“师夷之长以制夷”的历史，而最近 30 年，并没有走出这一历史轨迹。

这样的历史叙事，再一次把我带到了伟大的亚当斯密面前。他的《国富论》的确是经济学经典中的经典，可以这么说，斯密以降所有的经济学理论，都是围绕《国富论》来展开，也可以说，所有的经济学家，事实上都是斯密的门徒。有意思的是，这本伟大的著作，竟然是用口述的形式完成，而且让很多后来的学人感到佶屈聱牙。以前我的确花过心思死磕《国富论》，但收效不大。这次我偶然在旧书店里淘到了一本并不算很旧的书《我讲国富论》（苏东斌 著，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 年 7 月），算是苏先生的一部讲课稿件。客观地看，虽然有一些地方明显带有大陆陈旧意识形态的残迹，但总体看，这本讲稿对于系统了解国富论的读书人而言，应该是一门非常好的辅助教科书。

这次我读斯密《国富论》，再次感受到斯密对重商主义时代政府干预经济，追求贸易出超的愤怒，老先生简直是破口大骂。这再一次让我坚定地认为，中国当下的经济模式，还停留在 17 世纪，与真正的市场经济相比，中国经济落后 300 年。

斯密说，构成一国财富的，不是金银，而是人民能够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按照斯密的这个观点，中国今天高达 2 万多亿的外汇储备，就是一堆纸上的金银，而不是人们必需的消费品和便利品，也就是说，今天中国的所谓财

大气粗，根本就不是“国富”，而仅仅是党富。

斯密的经济学经典意义就在这里。所以有人说，200 多年的实践证明，凡是采用了斯密理论、政策的国家，经济就繁荣；凡是没有运用斯密理论和政策的国家，经济就衰败。这话听起来相当武断，可是却是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

再讲讲斯密的分工理论，这是《国富论》整部著作基础的基础，核心的核心。斯密说“动物不懂得交换，所以动物世界没有分工”。国有企业最大的坏处是破坏市场分工，阻拦迂回生产，因此，那些大搞国进民退的家伙，就是一些动物。只有国有企业的国家，就是动物庄园。

斯密说，“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原因，是各行各业和产业，由于分工而大增”。这句话具有真理的气象！分工增加市场容量，引导自由竞争，给每个人机会，导向普遍富裕，分工必须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才能达成。

中国的经济体无论如何都应该要回到斯密的轨道上来，这几乎是一个不容怀疑的常识。比如斯密说，分工理论有两个核



心要素，一是以每个人的利己心为基础，二是以平等的交换行为为表现形式。这表明，具有恩惠性质的福利政策，不是市场经济行为，垄断和腐败是不平等的源头。而且，大面积的福利行为，会造成懒惰、腐败，加剧政府的垄断行为。

由此可见，斯密的分工理论隐含着深刻的人性思考和自由理念，这让我坚信，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启蒙中国人。也就是说，如果政府愿意搞市场经济，国民的启蒙就是个时间问题，专制体制就不会长久；如果政府不情愿市场经济，甚至阻拦市场经济，那么国家又会迅速回到经济崩溃的边缘，专制体制也不会长久。而作为一名知识人，沿着斯密的学术通道，我们应认识到，要站在市场的喧闹中争自由！这很重要，离开市场谈自由，可能有些空泛，可能有些愤怒，可能有些暴力。更有可能让我们陷入某种组织情绪之中，然后再一次找不到自我，找不到自由。

## WRITING 写作

观察员 朱白（广州，[youjinma@gmail.com](mailto:youjinma@gmail.com)）

诺贝尔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不是我非要关注这些奖，而是顺其自然就知道这些消息。此时我很沮丧，这个世界提供给汉语文学爱好者的乐趣太少了，我很自卑，为什么不是个航天事业的爱好者，或者世博爱好者也行啊，只要别作什么球迷，文学青年就行了，在中国，你懂的。

鲁迅两个字，从我童年开始就知道这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名字，16卷的全集摆在那里，即便没有逐篇去读，对一个人来说，那也是一种精神力量。如今，他被玷污了，用他名字的命名的文学奖，不用调查，观众凭直觉就可以知道，这是一个需要权力无需审美，只需交易勾当无需质量价值的玩意儿。牢骚不是针对那个写女演员诗歌的车延高，尽管这人现在已经成为笑柄，也不是要求公布评奖内幕真相什么的，我就是不明白，我能理解人情、道义、交易……但，弄出这么个诗歌奖，你们真就不觉得丑陋吗？底线这东西，在我们这就真这么不值钱吗？

每年十月份等待诺贝尔文学奖出炉，已经成为中国文学圈的一道例牌——即便跟我们一点关系没有，但我们还是抱着最虔诚的态度去渴望、去等待。这里存在一个偌大的反讽，诺贝尔文学奖跟中国作家没关系，也不应该有关系，但我们不甘心啊，越跟自己没关系越来劲，再加上奥斯卡、格莱美等海外著名文化艺术奖项，这些的获予甚至参与都已经成了大国崛起的意外证明。

与其说每年等待这个大奖出炉，还不如说在这个时候等着看中国作家、中国出版商等文化人的如何丢人现眼。就在诺奖公布前几个月，曾经有人召集了一批作家，让他们列出自己心目中的诺贝尔文学奖名单，那些连规则都不懂还使劲给死了的人提名的作家就不提了，竟然还有人给几个中国作家提名——真不怕闪了舌头啊。这种古怪事儿比较好玩，我想来想去，这就跟中国男篮给 NBA 选 MVP 一样——当然，这个也不准确，男篮我们还有姚明、易建联呢，中国作家呢，哈，哈，哈。

这次获奖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其实早就入了西班牙国籍，与上一位 28 年前同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南美作家马尔克斯不同，他与中国出版结缘较早，而且从翻译到经历，略萨可以说中国形成了彼此和谐的关系。在传来略萨获奖的同时，中国文化界几乎也翻腾了起来，大家踊跃议论主要是因为这个——他的书大多在中国出版了，并且他的作品实在是太多了。广为人知的《胡莉娅姨妈与作家》（赵德明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年 11 月）、《绿房子》（孙家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年 11 月）、《给青年小说家的信》（赵德明译，上海译文出版，2004 年 10 月），跟《百年孤独》、《跳房子》等一同在那个“爆炸文学”兴起的年代，对中国文学以及中国作家造成了巨大影响。

略萨对现实不满，他视角通常是揭露和嘲讽的，在他的作品中充满了社会变迁给一个国家民众带来的悲剧。《绿房子》讲述了两个对比鲜明地域长达 40 年的社会生活，现代城市、原始森林，相同的是他们都是民众一次次受难的场所。那个象征无比享乐的“绿房子”，就如同今天我们这里那个贪官要占有一百多个情妇来营造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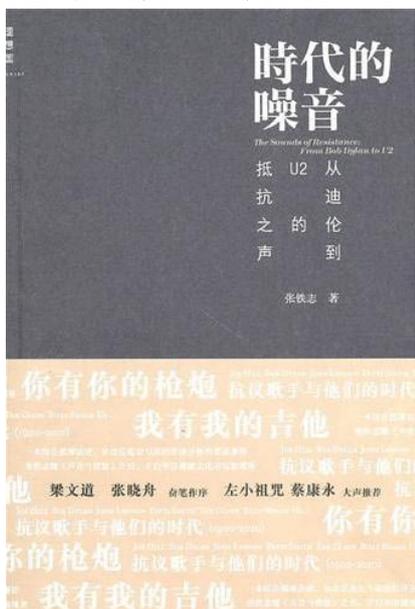


的极乐世界一样的荒谬和罪恶。

拉美作家获奖，这应该是一个好消息，他或许可以推动南美作家在中国的继续出版，消息中多年一直对中国出版乱象不满的马尔克斯终于要同意在中国合法出版其作品了，想必会有一个新的拉美文学风潮袭来吧。不好的预料是，随着南美作家28年后再次获奖，这应该也是给上个世纪那场风风火火的“拉美爆炸文学”送终的一次行为——从此，彻底结束，即便不会忘记，这也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造船厂》(奥内蒂著，赵德明、王治权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10月)非常适时，跟略萨始终与政治结缘和看不起昆德拉等当代作家不同，乌拉圭作家奥内蒂显得在政治上更独立、在文学传统上更有迹可寻，比如福克纳在他看来就是“导师”。其实国内早就翻译过他的作品，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那时》、《致无名氏墓》等都曾在期刊获选本中被翻译过，这部《造船厂》是他最著名的代表作，也是最新出版的单行本。

拉美作家获奖，这么个机缘巧合，让我这个热爱拉美文学的人，只能再多介绍两本拉美文学作品。《普埃布拉情歌》(安赫莱斯·玛斯特尔塔著，李静译，南海出版公司，2010年9月)是本意外的收获，之前我从来没听过这个作家，其实2003年时曾有过她的另外一本长篇《大眼睛的女人》(詹玲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7月)，这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之前曾有人说写出《幽灵之家》的阿连德是“穿裙子的马尔克斯”，这太不靠谱了，但这种命名对生僻的人来说很有效，那么玛斯特尔塔我愿意庸俗地称之为“踩高跟鞋的马尔克斯”。与马尔克斯的“硬接”其实也不硬，你读《普埃布拉情歌》就知道了，里面的主人公卡塔丽娜太像《百年孤独》里的某个人物了，决绝、任性、古怪，这样的人的一生，怎么书写都足够传奇。

有人说，保罗·策兰的诗是将时间凝结成词汇的一种特殊物质，我觉得非常靠谱。至于“以诗人的天性对抗历史和遗忘”就没有必要了，对抗不值得诗人去做，更何况对抗的是他人的遗忘。对于我来说，保罗·策兰的诗不需要“选择”，每一句都有他的特殊之美。有时候我也想，不要跟保罗·策兰这样的诗人计较，他的世界跟我们不同。《保罗·策兰诗选》(保罗·策兰著，孟明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是送给这个浮躁时代的一份安静礼物。



《时代的噪音：从迪伦到U2的抵抗之声》(张铁志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是一本以摇滚乐为材料写就的通俗文化读本。将摇滚与社会、政治扯到一起，是多年前就有的选题，张铁志的书写与其说是一种崭新的研究，还不如说是延承了前人的命题发展了自己的观点，重要的是这将普及一些常识、纠正一些误读。巨星尚在抗议，为什么我们就这么容易妥协了，其实这个问题纠缠了我们乐评人大概十年的时间了。这是一个淡漠音乐的时代，更甭说摇滚乐了，人们忘记了从美的角度欣赏，而是从功利和功用的角度去利用它。曾几何时，媒体上一度热炒的周文蓬的《中国孩子》就是如此误读下的结果，这只能让歌者叹气，让音乐失声。如果你觉得《时代的噪音》这种文字迷人，就更有必要去听听那些歌声。只是有一点不明白啊，不是说张铁志、马世芳等台湾乐评人不好，而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们的出版界只认这几个台湾人呢，大陆的杨波、邱大立就不能将名字印在一本自己的乐评集上吗？如果说外来的和尚好年经，如今在广州生活的邱大立已经掉了头发成了一个真正形象上的和尚了，你们觉得他还不够资格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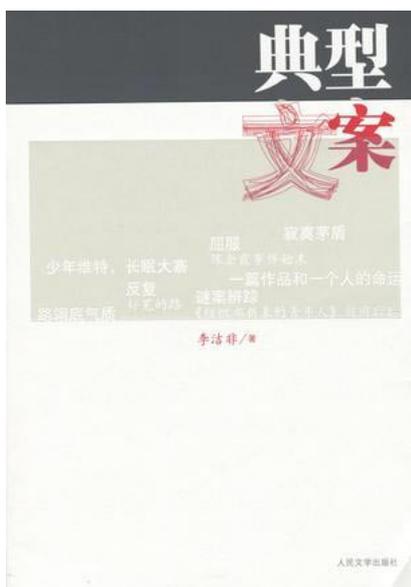
## WRITING 写作

观察员 朱航满 (石家庄, [zhm7976@gmail.com](mailto:zhm7976@gmail.com))

1936年春天，青年作家巴金收到一封来自山西太原的读者信件，此时的巴金已著作等身、颇具盛名，是许多年轻人追求的精神偶像。因此，这封来信只是意气风发的青年作家很多来信中极为普通的一封，从巴金的回信来看，这位居住在中国内地的青年读者显然是巴金的崇拜者，热爱读书，向往光明，追求自由，这是典型民国知识青年的特征。此后，这位名叫赵黛莉的知识女性先后收到巴金寄来的7封书信，从这些保留下来的书信中，可以感受到在那个风雨如磐、山河破碎的年代里，因为理想与追求，许多年轻人的心灵曾那么激动地一起跳动，他们在书信中畅谈文学与理想，诉说苦闷和未来，而同样对于

国家与民族的出路抱有相同的心情，他们都喜欢谈论屠格涅夫的小说《罗亭》，信仰无政府主义的精神信念。70 多年后，非常幸运的是，这 7 封书信被发现于太原的古玩市场，作家赵瑜几经波折，终于收购了这些书信。我是在赵瑜的著作《寻找巴金的黛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 年 12 月）中读到这些情节的，感谢作家赵瑜的一双慧眼，因为如果是被某位现代文学的研究者所获取，或许仅仅得来的便是一篇乏味的考据文章，而文学家的意义便在于，他为我们提供了这七封普通书信背后更为丰满的故事。

在这册书中，穿插着三条十分巧妙的线索，一是作家赵瑜从发现书信到购买再到寻访主人的曲折经历，一是作家巴金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生命历程和思想经历，另一个则是与巴金通信的那位署名赵黛莉的普通读者的被寻访，这三条线索在这册书的结尾时分汇集。我真是边读边感慨，感慨于作家赵瑜的执着，让他一波三折，终于找到了那位已经被历史隐没的普通人；又感慨于巴金的热情与真诚，他与一个遥远而陌生读者的通信之中，却始终地洋溢着令人感动的关爱与温暖；更感慨于赵黛莉这位普通的知识女性，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里，因为读了一些进步的书籍而受到影响，人生的命运发生了改变，因为不满于家庭束缚而离家出走，准备奔赴延安、投身抗战，但不想因为诸多原因而与一位有妻室的人相识相爱，但最终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在上海与其分手，之后的 1949 年，因为家庭出身与个性等原因，她辗转又回到西北，与女儿相依为命，从此终身不嫁。在这其中，我看到了一个追求自由独立女性在历史的波浪中沉浮的命运，然而造化弄人，历史无情，这位曾经热烈的给巴金写信，希望能够挣扎于时代枷锁的女性，最终隐没在历史的帷幕之下；而我更感慨这册《寻找巴金的黛莉》，所寻找的不仅仅是那位曾经与巴金通过七封书信的知识女性，更重要的是所要寻找的是与巴金相同的那些普通的信仰无政府主义者的知识分子们，他们在过往的岁月里，究竟是如何度过那些光阴，又把自己的生命安妥在怎样的位置之上。如此来看，这册书或许正是一个回答，但想来忽然不免有些伤感起来。



去年我曾隆重推荐李洁非的著作《典型文坛》（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 年 8 月），最近又读了这本书的续作《典型文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年 8 月），感觉两册书在精神的脉络上是承接的，但前者偏重于人，而后者则偏重于事，取“文案”一名，多少还有些为历史现场把脉诊断的意思，因此读来还是有些饶有趣味的。收录在这册书中分别有“人”、“事”、“史”三编，所谈论的时间基本都是 1949 年后的三十年中国文坛，因为过多政治与意识形态介入的原因，这一段文学史的研究价值始终没有多大的趣味，但因为李洁非的另一种思路来探察，可见到这一段文坛历史却也是最为丰富和值得研究开采的文学富矿，其对现实与未来的借鉴与惊醒意义也最大。因此，我很佩服这一研究的取向，由于过多的政治介入，必然会导致在非文学的领域去寻找发生的根源。而无论怎样的历史因缘，李洁非的笔触却始终是充满反思与悲悯的，对深陷于历史泥潭的历史人物给予更多体贴的描述，我很喜欢这其中的几篇文章，特别是《屈服——陈企霞事件始末》、《迷案辨踪——〈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前前后后》等等，对于处于历史风浪中的小人物的命运给予更多的同情与关注，诸如陈企霞这位曾被指认为是反革命集团的小人物，其最终被打倒，却是从个人的隐私入手的，手段之残忍，结局之惨烈，读后让人十分的悲凉。

读完李洁非的著作，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1949 年新政权的成立，文艺首先成为新的意识形态最重要的介入方式，而为了巩固政权和建立新的意识形态，文艺就必须服从于统一的政治权力需要，但不同于沈从文、巴金、曹禺等等这些作家晚年的悲剧人生，胡风、郭沫若、茅盾、丁玲、周扬等人的悲剧，其实只是意识形态内部的消耗与争夺，是曾经的国统区、解放区与敌伪地区的文艺领导人之间的斗争与较量，但随着最终由最高领袖所确立的解放区延安文艺的主宰地位，其他的一切都必须予以臣服。可惜的是，很多人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历史便无情地上演了一幕幕的血雨腥风，时到今日，读来竟是悲哀又有些历史的滑稽剧之感。诸如在李洁非笔下的《“从神童作家到右派分子”》、《“文艺革命”述略》等，读到的竟然是政治的阴谋、手腕、权术与翻江倒海，而文学又算得了什么？

胡文辉的《现代学林点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 年 8 月）是我近来翻阅较多的一册著述，此书以“点将录”这种带有游戏性质的文体来月旦现代学林人物，其实我是不大喜欢的，虽然会吸引一些眼球，但毕竟难免完全对号，有时会颇显牵强，局限甚大，但这种给人物排序论断的做法倒是很好的入门读物，对我这样读书浅薄的人来说，也是很容易了解到现代学林的洋洋大观的，因此断续便也读完了。胡文辉选择人物，在学术上多取其独创性，以文史领域居多，而对思想玄学领域则基本予以舍弃，另对其人生评述则又以其独立性为原则，总的来说，论述的原则不脱陈寅恪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的原则，因此在此书中基本按照学术与人生两个方面来阐述的。谈论学术，胡文辉多取其创造性，与前人相比，也更与西方同类领域相比，而谈论人生，其检验则不外乎现代历史的政治风雨，其中日伪统治、政府独裁、反右灾难、文革祸乱，无疑皆成为检验文人品行的最好实验，但读来读去，却是遗憾与无奈，遗憾的是少有干净纯粹的文人与知识分子；无奈的是，政治黑暗，政府昏庸，文人又奈何何？

不过，倒是此书的论述善于在同代学人中纵横归纳，比较归类，视野相比开阔，而注释又较为丰富，在正文之外，又提供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趣话、逸闻甚至是学林八卦，可作谈资，也使得此书能够亦庄亦谐，气象万千，从而在短短千余字之中，不但使得学界人物的身份地位、威望贡献、优长不足，都恰如其分地点到为止，而且通过几笔闲话的论述与注释的补充，让这些学界人物鲜活淋漓的呈现出来，也可见作者学识积累与笔下功力之不凡。其实胡文辉纵议先贤，总有些对于现实的参照意义，其中夹杂对于当下学林人物的议论，也可值得注意，但大多所持苛论，也是现代前贤作以比较的结果，诸如在关于余英时的论述中，便有这样一段看似闲话的议论：

民国学术史为近年显学，余氏无心以此为专业，而自成此学宗师。盖余氏论民国学术史，亦如梁启超、胡适、钱穆论清学术史，皆有广博的旧学素养以作凭藉，故能出古入今，游刃有余。台湾王汎森得其嫡传，自外部的思想史立场着眼，而又能贴近内部的学术脉络，为中年一代的佼佼者。大陆诸家，如桑兵（中国近代史）、罗志田（现代中美关系史）、陈平原（现代中国文学史）则相对缺乏古典学问的背景，山外看山，海边测海，即所谓“对塔说相论”，虽提倡总结有功，而论述终隔一层。

胡文辉书后有跋记一篇，系罗韬所作，开篇即为：“这部《现代学林点将录》，与其说是一部人物志，不如说一半是现代学林的‘梦华录’，一半是现代学人的‘思痛录’。”我读后觉得一语中的、颇有见地。我虽不敢赞同胡文辉对所有人物的评点论述，但我深为赞同他对现代学林人物曾取得成就的肯定，也深感他对诸多本可成为大器的学林人物，因为诸多外界因素的强行干扰而终于有所缺憾表示惋惜。由此想到李洁非的那册《典型文案》，深感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坛，也莫不是如此，那些也本应该成为世界文坛大师的人物，也终于被时代的尘埃所压碎，成为一个又一个壮烈而悲惨的牺牲品。如果要写成一部《现代文坛点将录》，我倒是觉得李洁非先生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



## THOUGHT&PHILOSOPHY 思想·哲学

观察员 成庆（上海，[veron.cq@gmail.com](mailto:veron.cq@gmail.com)）

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国内的知识界曾兴起过一阵东欧政治转型研究热，比如市民社会理论的兴起，最早也是受东欧剧变刺激所致，但此后因为中国经济转型的“渐进成功”，这种政治上的联想嘎然而止，相反，东欧转型反而成为了许多宣扬中国模式论的学者口中的错误典型。秦晖与金雁在2004年出版的《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就是想说明一个问题，中国所谓的渐进高增长，其实是以牺牲社会福利与个人权利的基础上达成的，而东欧经济的所谓困境，只是在经济增长数据指标方面，这是因为“右派政府”在市场化过程中反而不如中国“激进”，但是从长期来看，这种因为社会福利与个人权利保障而导致的经济增长的缓慢，却可能是未来长期发展的制度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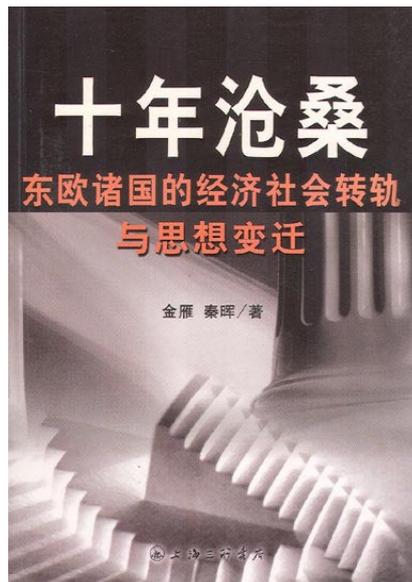
关于东欧转型与中国改制的经验对比,我并非比较政治学者,自然无法过多置喙,但从精神与文化的层面上,我常常感到有某种相似性,这种类同倒并不一定是在哲学、宗教层面存在某种共同的精神源头,而是东欧知识分子精神层面的“转型史”几乎可以直接拿来反思当下中国之精神境况。就拿最近阅读的一本小册子来说,哈拉兹梯(Miklós Haraszti)的《天鹅绒监狱:国家社会主义统治下的艺术家》(*The Velvet Prison: Artists Under State Socialism*, The Noonday Press, 1989年),薄薄一册,不过162页,里面却是格言警句迭出,让人读起来酣畅淋漓。

关于哈拉兹梯,匈牙利作家康拉德(George Konrad)对他的评价是:“哈拉兹梯生来就是一位异议分子,而且还是属于那种自我嘲讽的异议分子”。不过“异议”并非只代表着“敌我二分”,对于哈拉兹梯而言,身处社会主义匈牙利之下的“异议”文化人,其困境并不在于存在审查制度,而是这种审查制度已经深入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化为某种心理的基因,让你自审而不自知。其中他写下这样一段精彩的总结,这里试译如下:

这个问题的真理是:不能触碰的禁忌,不能忍受的生活,无法言说的言辞,难以塑造的形式,对敏感思想的永久放弃,以上种种都不会让我们的审美趋于贫乏之境。艺术大厦正在国家所建造的隔离栏外拔地而起。我们充满技巧性地沿着艺术殿堂的围墙重新安置这些家具。我们学会了与规训共处;并对此感觉宾至如归。它就是我们的一部分,而且我们还会很快地怀念与渴求它,因为离开这种规训,我们已经无法创造。(p.9)

对于当下的国人而言,固然可以对心灵的自我审查保持着警醒,但是困难之处或许在于,由于这种规训并不是清清楚楚地供奉在各种公共场所之中的法令,而是乔装打扮,潜入了私人日常生活的领域。例如我们对人际关系的不信任,对任何一种美好事物的“本能”怀疑,都是这种规训对我们长久塑造而带来的结果。以至于有的文化人会将会“讽刺”与“反对”当作文化价值的最高原则,而没有看到,我们所讽刺与反对的对象,其实已经与我们形成了精神配偶关系,文化与艺术因“反对”而存在,因“讽刺”而展现力量,而我们自身,最终却只能被戏谑与仇恨充满。

不过,这并不是哈拉兹梯强调的重点,他要谈的问题更为宏大,更耐人寻味。他所怀疑的是自由与艺术的关系被我们简化了,我们相信艺术能在自由环境下繁荣,但他却说,艺术甚至在极权体制下也能绽放出火花。这也很容易理解,比如殷宗的《黄河》、瑞芬斯塔尔的《意志的胜利》,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乐》、理查·斯特劳斯的音诗《变形记》,这个名单还



可以列的很长很长。在哈拉兹梯看来,艺术和自由的关系固然不能称之为无关的,但也是可疑的。康拉德因此在序言里提出这样一个看法,他认为哈拉兹梯的写作中包含了这样一个可怕的问题意识:“假如国家社会主义成为世界性的文明之后将会如何?是否会像儒家中国或是中世纪的欧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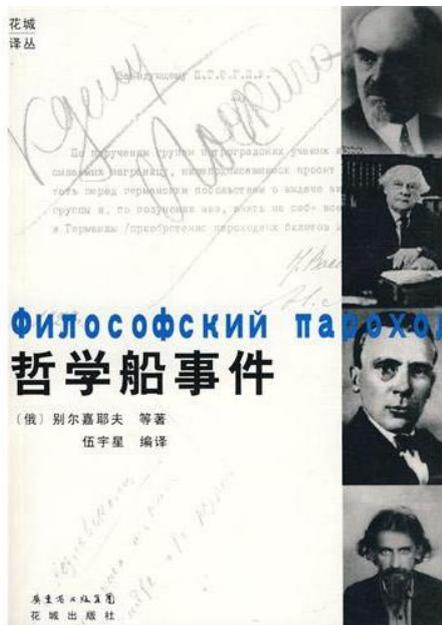
诚然,哈拉兹梯和康拉德都不是中国思想专家,他们或许并不知道中国思想中的“儒表法里”的复杂精神结构,他们追寻的问题意识来自于奥威尔那本预言式的《1984》,如果再扩大这个问题的背景,或许就是,现代技术化的世界让完全控制的治理技术成为可



能之后，人该如何自处？换句话说，艺术和文学的价值是否只能奠基在反极权的基础之上？或者说假如极权也可以让艺术绽放“恶之花”，那么用艺术和文学去对抗极权，是否意味着，我们选错了武器？

在我们的身边，可以看到各种因反抗而不停拣选着精神武器的朋友，有的愤怒，有的忧郁，有的积极，有的犬儒。哈拉兹梯在“异议的辩证法”一节中如此感叹道，“在我们的文明里，只有两种异议分子：幼稚的英雄与标新立异的艺术家的。”哈拉兹梯甚至将前者看作是“审查者的帮凶”，而后者则将会成为正常经济社会中的“经济罪犯”。因为前者将国家的控制视为唯一敌人，导致自我边缘于公共创作之外，但哈拉兹梯强调的是，他们自我放逐并非是因为他们所表达的内容，而是他们的姿态，以至于一旦他们被政府送上法庭，他们已经难以艺术家的身份出现，而只是作为一名普通的“违法者”对簿公堂。后者之所以为“经济罪犯”则是因为，他们因“标新立异”而置自身于主流经济运作之外，满足于少数追随者对“违法出版物”的购买与支持，似乎获得了独立的经济地位，但是只要这个社会还在正常运转，这些文化人将永远自我边缘，而且还会被指控为“正常社会中的经济罪犯”。

无论我们是否同意哈拉兹梯的看法，他对“异议知识分子”的处境分析无疑是入木三分，而且在我们的语境里也能找到对应的典型个案，但是问题的复杂性可能是，上述所批评的两类异议文化人，并不是只要寻找到他们的“反面典型”就可以解决这种困境，因为那可能会是“圆滑的投机者”和“惟命是从的御用文人”。很显然，哈拉兹梯告诉我们的，远非是答案，而可能是更多的疑惑。



对于政府眼中的那些“幼稚的英雄”，大部分“明智”的政府会选择驱逐与流放，就像《哲学船事件》（伍宇星 编译，花城出版社，2009年11月）里所记录的1922年苏俄政府对知识分子的大规模驱逐行动一样，因为让“英雄”与地气隔断，那是对知识分子的致命一击，时隔三十年，“哲学船事件”中受驱逐的作家米·安·奥索尔金还如此说道：

在国外永远没有“家”的感觉，无论你怎样熟悉那个国家、那里的人民、那里的语言。这不是爱国主义情感，而是一种天生的水土不服。而且也不愿意服。

由此，放逐成为前苏联对待艺术家、知识分子最常用的策略，也使得许多俄罗斯文化人被流放至西方世界，却不具备任何国籍身份，例如著名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直到政权易帜，才能回归故里。相比这些“幼稚的英雄”，世故的投机文人们的确命运不同，在斯蒂文·巴赫为瑞芬斯塔所写的传记《极权制造：莱妮·瑞芬斯塔的一生》（程淑娟、王国栋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7月）中，我们可以看到瑞芬斯塔性格的复杂一面，她性格孤僻，想成为一位男孩，而且对狂热的追求者们的态度常常虎头蛇尾，吊尽胃口，当她一步步从舞蹈演员走入影坛成名后，在1932年这个关键的年份，她参加了一次希特勒的集会，她后来回忆道：

那种感觉如同感受闪电，我眼前一亮，如同神谕出现，永生难忘。大抵在我眼前无尽地延伸，地球从中间砰然裂开，喷射出一条巨大的水柱，直冲云霄，地球因而为之颤抖。当时的我似乎瘫痪了。

不要低估而且忽视这种宗教性体验，尤其对于瑞芬斯塔这种有着很高心智的艺术家而言，仅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理解，或许并不一定切中要害，希特勒的演说具有宗教般的蛊惑力，尼采的妹妹就说，希特勒其实是一位“宗教领袖”，那么下一步的问题或许就是，假如这种宗教体验是真实无误的，我们又该如何去回答宗教体验（宗教体验并不代表某种特定宗教）与善之间的复杂关系。

事实上，许多哲学家都回避这个问题，将宗教体验视为无稽之谈，不过假如让一对父子来从哲学与宗教的角度对谈这个问题，应该会是相当有趣的经验。实际上，让一弗朗索瓦·勒维尔与马蒂厄·里卡尔的《和尚与哲学家》（陆元昶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就是这样一本相当有趣的书，虽然我很早读过，也试图为其写篇书评作个简介，但这本书的大陆译本实在不敢恭维，也就不敢轻易推荐。不过有朋友也告诉我，此书在台湾还拥有另外一个译本，是著名话剧编剧赖声川的太太丁乃竺所译，丁女士本身修行藏密，而且赖氏夫妇早年与里卡尔曾比邻而居，对于此书的翻译，当拥有各种无法比拟的优势，

可惜我并没有读到此书的台湾译本，因此只能是向各位作有所保留的推荐。既然谈到密宗，这里顺便岔开一句，刑肃之口述的《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张健飞、杨念群笔述，三联书店，2008年11月）也是我曾经遗漏的好书，此书完整地呈现了当年汉僧入藏求法的修行史，也见证了民国时期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交流的过程，其中有大量关于藏地佛教内部的观察，实在不可多得。

回到主题，除了选择接受放逐，自杀也往往是“英雄”们的一种无奈选择，比如马雅可夫斯基（尽管他的自杀原因颇让人怀疑是和爱情有关）、茨维塔耶娃。而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自杀更是一种非常普遍的时代现象。最近，中唱推出了钢琴家顾圣婴的两张纪念专辑，关于这个名字，除开资深乐迷之外，知者恐不多见。不过前不久在《读书》杂志上，赵越胜曾著文一篇——“若有人兮山之阿”，怀念的就是这位早年自杀的钢琴家顾圣婴。而关于顾圣婴的详细情况，各位可参阅周广仁主编的《中国钢琴诗人——顾圣婴》（上海音乐出版社，2001年），里面的内容读来让人唏嘘。

顾圣婴与其母亲、弟弟于1967年在上海愚园路的家里相约自杀，年仅29岁，正是青春年华，所遗留下来的录音也十分少见。但从存留下来的作品来看，抛开政治层面的同情外，顾圣婴的演奏令人惊讶，就以肖邦的幻想波兰舞曲而言，你很难相信，一位二十多岁的钢琴家能有如此超然、典雅的开篇，相比而言，傅聪显得过于飘逸，诗情画意的涂饰色彩太过明显，而另一位偏爱这首曲子的前苏联大师里赫特，一生录过多个版本，其演奏固然可称经典，但不免还有“悔少作”的状况，而顾圣婴却在如此年轻的阶段，将这首曲目诠释地如此老道，已经不仅仅是技术上的原因，而是其心灵在那种特殊历史条件下所展现出来的巨大艺术能量。



细细比较，里赫特的演奏在乐曲的肌理方面十分清晰可辨，而且抒情段落也相当迷人，但是很奇妙的是，顾圣婴的演奏相比起来具有一种很明显的“贵族气”与从容感，没有在音色上的过分雕琢，也不会抒情方面过度诠释，这顿时让我联想起德国著名钢琴家肯普夫所演绎的贝多芬。这种“节制感”在肖邦作品的演绎上相当不易，因为肖邦虽被誉为“钢琴诗人”，但是他的艺术旨趣，绝非是“夜曲”那样供人消费的布尔乔亚趣味，而是有着“家国情怀”的沉重一维，因此在柔情中展现沉重与悲情，则是肖邦作品中的最大难度。

顾圣婴的演奏则真正具有了这种“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特质，如此天才，横死于“乱世”，岂不可叹！

关于那个时代对于文化的摧毁，我们今天所作的研究与反思尚嫌太少，往往一作深究，便有人会以经济、社会等诸多原因加以反驳，认为“吃饱饭”乃是第一要义，“意识形态”是立场抉择的关键，而“文化”云云，皆是布尔乔亚式趣味，既是反政治的，也是反人民的。不过就从传统文化层面而言，那个时代带来的创伤也自不待言，圣严法师在《美好的晚年》（胡丽桂整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一书的序言里也对“文革”当中对传统文化之破坏深感痛惜，虽然法师对于台湾佛教的发展深表担心，但殊不知，在彼岸，佛教的复兴更要经过更长的时间，才能真正恢复元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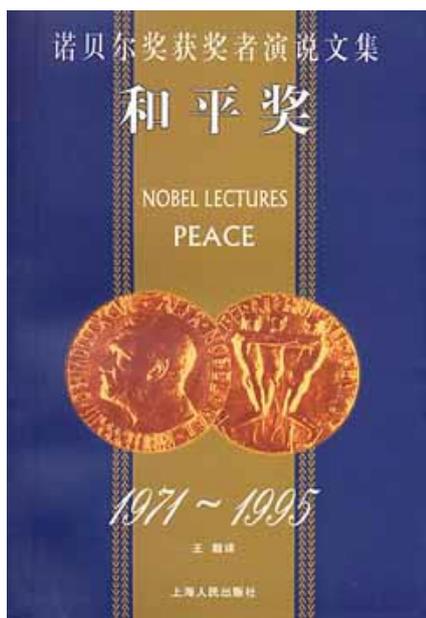
关于今日中国佛教之现状，其实可读书籍并不多见，僧团内部虽偶有片言只语，仍难管中窥豹，外人要想研究，也限于各种条件与禁忌，难有持平之论。比尔·波特这位美国汉学家，在这方面无疑具有特殊的优势，他的前一本《空谷幽兰：寻访当代中国隐士》（明洁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0月）曾在国内引发一阵不小的热潮，最近他的新书《禅的行囊》（叶南译，南海出版公司，2010年10月）也正式出版，我第一时间买到，已经快速读完，深感趣味盎然。这不仅是一本中国佛教寻访记，同样也是中国民间社会信仰的旁观录，其中许多观察既让人捧腹，也催人深思，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译者叶南译笔生动，丝毫不见中英对译的滞涩感，比如“爱谁谁”之类的口语，让人很有阅读的快乐。

图 2 为哈拉兹梯(Miklós Haraszti)

图 4 为顾圣婴

## HISTORY&CULTURE 文史

观察员 王晓渔 (上海, [wangxiaoyu1978@sina.com](mailto:wangxiaoyu1978@sina.com))



月初,在读一本出版已久的《诺贝尔奖获奖者演说文集 和平奖: 1971-1995》(王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975年的萨哈罗夫、1979年的特丽萨(通译为特雷莎)修女、1983年的瓦文萨、1984年的图图大主教、1986年的韦塞尔(又译为威赛尔、维瑟尔)、1991年的昂山素季、1993年的曼德拉……都是耳熟能详的名字。读过其中几位的著作,图图的《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江红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韦塞尔的《一个犹太人在今天》(陈东飏译,作家出版社,1998年)都让我难忘。

1990年2月11日,在监狱中度过27年的曼德拉获释出狱。当时只有12岁的我,在新闻联播里看到这条新闻,惊诧不已。监狱不是关押“坏人”的吗?竟然还会关押“好人”。囚徒不都是“坏人”吗?竟然全世界都在欢迎一个“国家的囚徒”。一个人在监狱里27年,竟然还可以如此“健康”,不仅是身体上的健康,更是精神上的健康。一个只经历过12个寒暑的少年,甚至无法想象27年究竟有多长,但看着面带微笑的曼德拉,心中升起无数“竟然”,一些坚固的观念之冰,开始冰消雪融。

1994年4月27日,南非进行第一次民主选举。图图这样回忆他将选票投进票箱的瞬间:

啊!我忍不住地叫了出来:“好啊!”我感到晕眩,如同坠入情网的一刹那,天空变得更蓝更美了。我看到人人都焕然一新,如同脱胎换骨后的美人。我自己也脱胎换骨了。简直像梦境一样。我们真担心会被从梦境中唤醒,睁开眼时又回到了种族隔离的严酷现实中。有人表达出了这种梦境的特性,他告诉妻子,“亲爱的,不要叫醒我。我喜欢这梦。”

无论在何种境遇下,图图都没有放弃“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的信念,在梦境中如此,在困境中也是如此。宽恕意味着放弃仇恨,不等于主张遗忘,这与另外一些国家主张遗忘同时主张“一个都不宽恕”截然不同。

集中营的幸存者韦塞尔,在《一个犹太人在今天》里反复讨论记忆的必要性。记忆不是控诉,控诉是为了唤起仇恨,而记忆最终指向宽恕。韦塞尔在写作之前,保持了很长时间的沉默,“不触及那首要之物”,他有意为之:“久得足够观看清楚了。久得足够学习倾听在我自己的声音里呼喊的声音了。久得足够重新赢得对我记忆的拥有权了。久得足够把人的语言与死者的沉默结合在一起了。”韦塞尔还有一本《夜》(王晓秦译,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年)被译成中文,这本书目前比较容易找到,刚刚在当当上查了一下,尚有存货,原价18元,现价10.6元。

用了这么多笔墨谈论旧书,因为对阅读者来说,无所谓新旧。这个月值得推荐的新书,也不在少数。

陈夏红兄惠赠的《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江平口述,法律出版社,2010年9月),是近年来看到的最好的口述史之一。在唐德刚先生的示范下,口述史在这几年获得一定的关注,但是也成了一些作者速成著作的终南捷径。

记忆中比较糟糕的,一本是吴学昭先生的《听杨绛谈往事》(三联书店,2008年),将杨绛先生的口述和文章拼贴在一起,再加进自己的评述,做成一个拼盘。这本获得杨绛授权的介于口述史和传记之间的著作,包含了许多为杨绛“贴金”的植入式广告,读后非但没有增添对杨绛的景仰之情,反而徒叹杨绛为何自毁形象。另一本是年初引发争议的《吴敬琏传:一

个经济学家的肖像》(中信出版社, 2010年2月), 作者吴晓波先生对传主吴敬琏先生做过20多个小时的口述史记录, 虽然他表示这只是正式进行口述史记录的时间, 与吴敬琏的交流时间不限于此, 为此书而做的准备工作时间更长, 这本书也没有按计划中的口述史形式出现, 而是成为一本传记, 但是这种快马加鞭的做法还是让人感到遗憾。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中信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年、2008年), 我经常推荐给学生。但是,《激荡三十年》之外的著作, 我却无力跟踪, 他的写作速度几乎超出了我的阅读速度。吴晓波在经济史以及当代中国经济上的观点, 我几乎全部赞同, 但每次看到他又有新著问世的消息, 只能生发出“亲者痛”的感觉, 但愿作者不会把批评他的“亲者”当做“仇者”。

重新回到《沉浮与枯荣: 八十自述》, 这本口述史可以称为个人版的共和国法学史。当然, 这样说不够准确, 因为众所周知,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 法学基本上是不存在的, 法学被政治替代, 而这“政治”, 不是指公共生活, 而是高层的权力斗争和底层的群众运动合二为一。所以, 江平先生在自序中回忆李慎之先生对他说过的一段话: “你们是搞法治的, 最终会发现法治的困惑在于政治, 法治离不开政治, 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 你们是绕不开的。” 进而言之, 法学的价值所在, 就是努力将政治从“高层的权力斗争和底层的群众运动”正本清源为“公共生活”, 这首先要从限制政府的权力、使其不能侵犯公民的权利做起, 即实行宪政。

遗憾的是, 近年来最好的口述史丛书, 可能不在人文社科领域, 而是在科学领域。湖南教育出版社的“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 已经陆续出版了一二十种, 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陈夏红先生呼吁做口述法史, 我很赞同, 不仅法学, 每个领域都应该启动这种工作。在口述法史上, 除了江平先生的这本《沉浮与枯荣: 八十自述》, 还很期待张思之先生的口述史早日问世。

除了口述史, 近期还有几本自传值得一读。赵俪生先生的《篱槿堂自叙》(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年), 我曾在打折书店多次遭遇, 竟然视若无睹。后来在网上读到其中一些片段, 叫好不迭, 也叫苦不迭, 叫好是因为老先生的文字既典雅又生动, 臧否人物青白分明, 叫苦是因为有眼无珠, 错过此书。这次《篱槿堂自叙》和夫人高昭一的回忆录《回首忆当年》合编为《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0年9月), 让我惊喜的是, 前者还增补了上海古籍出版社删除的内容, 于是当即拿下。

一本容易错过的回忆录是灰娃先生的《我额头青枝绿叶: 灰娃自述》(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年8月) 灰娃是艺术家张仃先生晚年时期的夫人, 她曾是延安的红小鬼, 人称“八路军的公主”, 从延安到北京之后, 却越来越感到不适, 领导传达领袖指示, 说原子弹不可怕, “大不了从地球这一边穿到美国那一边”, 她心想, 人类大毁灭“比汪精卫‘焦土抗战’还厉害”, 又不敢说, 患上轻度精神分裂症。“文革”爆发, 精神分裂症迅速加重, 精神病院为她设立了家庭病床, 灰娃这样回忆: “任何声音、形象, 都引起我的恐慌不安, 风吹、鸟飞、叫买声、车声……我都认为是有人布置的阴谋。” 大约从1972年开始, 她写作诗歌进行“自我治疗”, 把诗稿藏在花盆里, 后来结集为《灰娃的诗》(作家出版社, 2009年5月)。



《我额头青枝绿叶: 灰娃自述》属于“人与岁月”丛书, 这套丛书还收有熊景明先生的《家在云之南: 忆双亲, 记往事》(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0年8月), 也值得一读。但从第一辑目录来看, 这套丛书的定位有些模糊, 比如《李敖: 我的人生不可复制》(傅宁军著), 标题明显复制了西太平洋大学博士唐骏先生的《我的成功可以复制》, 不知“不可复制”从何讲起。此外, 丛书还收有职业革命家的回忆录和一些研究著作。在我看来, 不如改称“人·岁月·生活”丛书, 只收录人文社科领域的回忆录, 定位会清晰一点, 也方便读者按图索骥。

上述这些回忆录都是围绕中国, 我却想起伯林的《苏联的心灵: 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潘永强、刘北成译, 译林出版社, 2010年7月)。1990年, 伯林在《不死的俄国知识阶层》为俄国知识阶层能够幸存于一场漫长的劫难而惊喜。在他看来, 俄国知识阶层的谱系可以追溯到1815到1830年间那些主张个人和政治自由的作家们, 后继者是1917年二月革命的主要发起者, 再后来是苏联时代残存的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和他们的朋友、支持者。伯林表示, 过去的两年, “我见到了



许多苏联的公民，他们相对年轻，而且显然是许许多多同辈中的典型代表，他们看起来继承了老一代知识阶层的道德品质、正直的思想、敏锐的想象力和极强的个人魅力。”前面提到的萨哈罗夫，被伯林视为其中的代表人物。我想，“中国的心灵”也同样不绝如线，并且有复苏的一天。

灰娃刚到北京，一度请求回到延安。虽然她认为“抢救运动”荒谬、残忍甚至有些邪恶，但在回忆时对延安充满怀念，反复称赞当时的“坦诚、高尚、无私、友爱、单纯、理想”，并且表示“山沟又土又封闭，但文化绝对前卫”。《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刘春芳、高新华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5月）对国家社会主义的美学魅力进行了精细的分析，提醒读者反思文化诱惑和美学魅力背后的政治问题，指出只注重文化（以及美学）、却忽略政治是通往奴役之路。

作者勒佩尼斯先生曾经担任德国柏林高等研究院院长，他的一篇访谈《我期望具有创造性的混乱》（《时代周报》2010年8月9日）很有意思。他担任院长期间，希望所有获得邀请的学者“随心所欲地生活”，此外只有两点要求，“或者写一本很好的书；或者不写一本不好的书”。有次，一个学者向他告别时致谢：“院长先生，今年我成果累累，你看我写出了想写的书，而且书受到了好评。非常感谢你。”但勒佩尼斯却“特别伤心”，他这样评论：“我想我做错了什么事，让他把书写出来了。我的愿望是希望他通过与这些音乐家、科学家或学者交流，能够发现他原来的想法有问题，想写的书写不下去。具有创造性的混乱——这是我特别期望的，这种情况下有了结果我反而不高兴。”看过这篇访谈，我立即找到他的《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被他的“创造性的混乱”吸引。

值得一读的新书太多，下面这些只能简要地介绍一下。

前小说家徐晓鹤、现网络大侠赵无眠先生的《赵无眠辣说历史》（花城出版社，2010年8月），虽然标题和封面都包装得太像地摊风格，内容却值得回味，其中的《如果日本战胜中国》已是网络名文，不用多做介绍，如果你没看过，不妨强忍着对封面的不适买上一本。福楼拜的《庸见词典》（施康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9月），与略萨的《给青年小说家的信》（赵德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里尔克的《给青年诗人的信》（冯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坪内逍遙的《小说神髓》（刘振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4月）是同一种装帧风格，舒服得让人即使对内容不感兴趣，也想把它放到自家的书架上，可惜这几本书似乎没有命名为一套“丛书”，不便称呼。《庸见词典》属于“魔鬼词典”的风格，有的辞条看过一笑了之，有的辞条则让人举一反三。随手翻开一页，展览会的解释是“十九世纪令人癫狂的事情”，可以理解为：第一，展览会属于十九世纪；第二，展览会令人癫狂。

张铁志先生的《时代的噪音：从迪伦到U2的抵抗之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探讨了音乐和社会运动的关系，这也是我所关注的问题。如果认定文化和社会运动无关，很有可能重蹈勒佩尼斯描述的那条“通往奴役之路”。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要求文化必须和社会运动有关。比尔·波特先生的《禅的行囊》（叶南译，南海出版公司，2010年10月）就是另一种向度的著作，这位美国友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远离各种“噪音”，寻访各处隐士。此前一本《空谷幽兰》（明洁译，民族出版社，2001年；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南海出版公司，2009年）经过将近十年的时间，从滞销书变成畅销书再变成常销书。2010年第3期《华夏地理》曾刊登《禅的行囊》选段，半年之后终于得窥全豹。

卡尔维诺先生的《短篇小说集》（马小漠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9月）并非篇篇精彩，但是马科瓦尔多系列值得一读。其中很多部分此前已经译成中文，没有读过的朋友可以补一下课。在我记忆中，《在你说“喂”之前》（倪安宇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中的一些篇章，似乎尚未在大陆结集出版，不知为何。“蓝星诗库”推出《张枣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7月），收入了《春秋来信》（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没有收入的作品，比如《一首雪的挽歌》这样写道：“在一个黑暗的年代/雪又能够怎么样呢？”

有一本书，我在推荐和不推荐之间犹豫，就是陈锦江先生的《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修订本）》（王笛、张箭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7月）。关于这本书，苏小和兄隆重介绍过，值得仔细阅读。我已经有了1997年版，还是买了2010年版的修订本，想看看何处有修订。可是大致对比了一下，除了装帧上更加符合“中国近代史研究译丛”的风格，内容尚未发现有修订之处。不排除其中有标点符号、个别字句的调整，但修订幅度是否到了需要注明“修订本”的程度，是个疑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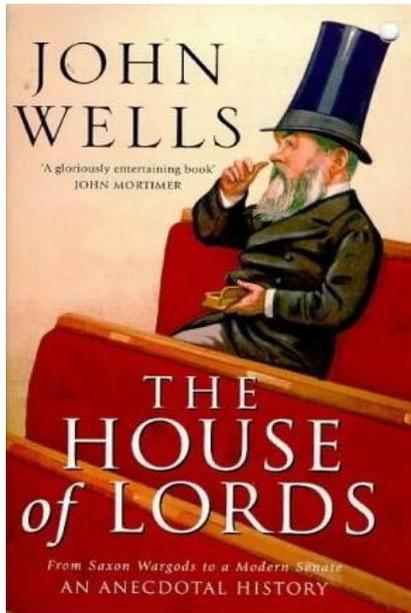
有三本书，尚未见到就想买下，是《这里不平静：非洲诗选》（冷霜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8月）、周云蓬《春天责备》（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11月），张佛泉《自由与权利：宪政的中国言说》（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留待下回分解。

## 阅读报告·台港海外

### ENGLAND 英国

## 扶不起的英国贵族

特约撰稿人 孙晓曦 (北京, [sunxiaoji@gmail.com](mailto:sunxiaoji@gmail.com))



“英国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国家，但矛盾之中他们自己会找一个位置，调节的位置，从中找到和谐的一点。既然有等级，也会有平等，讲人权自由，但亦讲贵族传统的身份，两者并行不悖。”香港文坛的才子陶杰曾经用这段话概括英国。

陶杰做过八年 BBC 记者，对于一般人眼中有些光怪诡谲的英国社会，早已是见怪不怪，尤其是遗存至今的贵族政治传统。即使是自夸有绅士风度如陶杰者，在伦敦一间古老的绅士俱乐部（Gentlemen's Club）门前也因为身份问题不得其门而入，于是自我解嘲说：“对于好多人，觉得大惑不解，但实际在英国一切就是这么自然”。

于今，陶杰所谓的“自然”，可能面临着一次翻天覆地的改变。英国的副首相克雷格前不久在众议院发表演说，称新组建的联合政府将启动一个特别委员会，旨在推行英国议会的彻底改革。BBC 新闻称，这项改革将取消由不需经过选举的贵族把持的上议院（House of Lords），改其为成员由选举产生的上议院。那些靠着在议会开会时报名，从而领取政府补贴的英国贵族们，将来在英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会日渐式微，甚至被这个社会边缘化。

其实，自 19 世纪以来，英国上议院权势一直在“缩水”，到今天已远不如由选举产生之下议院。取消上议院的“世袭气息”，不仅是议会选举改革的一部分，它背后还折射出一个世纪来英国社会的沿革和人们阶级意识的转变。

历史作家约翰·韦尔斯（John Wells）所著的《上议院：从撒克逊人的战神到现代参议院》一书这样记叙道：自 19 世纪以来，伴随着大英帝国在全球范围内的衰落，贵族的没落，英国上下议院又开始了长期的“对掐”，而进入 20 世纪，英国的历届政府在“对付”上议院的贵族老爷们方面，可以说一点也不手软。1911、1949、1958 以及 1963 年，英国政府四次通过法案，削减上议院议员的人数和任期，并且允许妇女和新的世袭成员进入上议院。这让拿惯了国家俸禄的贵族议员们感到非常恼火。

自从英国通过旨在“重新分配议席，削减贵族阶级权力”的 1832 年议会改革法案以来，贵族议员人数一直越来越少，权力越来越小，上议院越来越像是贵族阶层的“养老院”。需知，在英国贵族制度最为鼎盛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7000 多个贵族家庭，却同时占有 80% 的英国土地以及贵族院 431 个世袭席位，权势之大，令人咋舌。

英国的上下议院制，大致在 14 世纪英王爱德华三世在位期间形成，上院由圣职者及世袭贵族组成，下院由经由选举的郡县自治代表组成，二者权力大致对等。后来，上议院的贵族政治与神职人员曾经凭借其影响力对下议院形成权力上的优势。不过，下议院影响力却随着现代民主进程的发展而日长。1649 年查理一世遭处决后，克伦威尔支配的英格兰联邦

（Commonwealth of England）成立，上议院基本被拆分为成无权无势的机构。1649 到 1660 年期间，还曾经一度遭解散，英皇复辟之后，上议院才又告开会，与下议院分庭抗礼。

但最激烈的改革要数工党 1997 年上台后。布莱尔政府提案撤除所有贵族于上议院中世袭的议席，作为改革上议院的第一步。《1999 年上议院法案》获通过，法案规定除 92 名议员留任外，其余 600 多名世袭贵族失去上院议员资格。当年的 BBC 新闻评论其为“非常深入而激进的民主改革”，但是，在此之后，虽然各方争执不断，议会改革却再无进一步的进展，一搁置就是十余年。

直到今年 3 月，《每日电讯报》报道司法大臣兼上院大法官杰克·斯特劳（Jack Straw）提出将上院席位由现在的 704 个减少到 300 个并且取消议员世袭制度，议会改革才又一次引起人们广泛的讨论。对此，不少工人阶级出身的平民都表示赞同，当然，反对者也不少。

反对的声音主要来自贵族阶层本身。第12任的德文郡公爵在评价历届政府针对贵族的改革所造成的后果时，难掩失望：“贵族阶层在今天的英国不是正在死亡，而是已经死了。这是盖棺定论的事情。”已经是白发苍苍的他颤颤巍巍地说，当《每日电讯报》的专栏作家托比·杨(Toby Young)来到他豪华的庄园拜访时，他告诉对方，自己感到现在还头顶世袭的称号其实有点令人困惑，“还不如直接回到被人们直呼卡文迪什这个姓的时候”。

托比·杨十分赞同德文郡公爵的话，他在《每日电讯报》发表文章坦承，如今贵族在英国政治中扮演的角色已经显得无足轻重，但是，他接着话锋一转，贵族政治的“消失”并没有改变英国的社会不公平和阶级差异，“不列颠实际上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的阶级分明过”。

果然如托比·杨所言，虽然贵族在当代的英国日渐衰弱，但她依然是世界上等级制度最森严的国家吗？《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评论很支持托比·杨的看法，这份报纸直接将等级制度宣称为“不列颠肮脏的秘密”。

BBC4频道的编辑简尼·罗素(Jenni Russell)在谈到这个人尽皆知的“肮脏的秘密”时说道：“真的，来自于英国中等和低等收入阶层的人们也



许具有更良好的素质，但是这对于他们相对的处境来说，并没有多少帮助。社会上的不平等依然在不断扩大。与整个欧洲相比较，英国的社会流动性依然是最差的。那些幸运的上流阶层依然把持着英国最好的学校和最好的职业。”

这些传媒人士的话绝不是危言耸听，英国就业与养老金部数据显示，英国当前贫富差距创上世纪60年代以来最高纪录。这份数据还说，英国最富裕的10%人口人均资产价值为85.3万英镑，最贫穷的10%人口的人均资产只有8800英镑，相差近100倍。

“在英国，你的父母是谁往往比在其他国家更为重要。”一次聊天时，英国人菲利帕·约翰斯(Philippa Jones)这样对我说。约翰斯早年就读于英国的一件学费不菲的私立学校(public school)，但是1980年她就离开了英国。现在在一家研究机构担任顾问的她，提到当年的英国依然会感觉反感：“在70年代的英国，虽然社会开放，各种新思潮和想法都涌现出来，但是社会等级依旧森严，人们做事过于循章蹈矩。”

当约翰斯翻看今年某期《经济学家》增刊时，她找到了多年前看过的一幅照片，在那张拍摄于1937年的黑白照片中，两名哈罗公学(Harrow School)的学生身着体面干净的礼帽和西服，在路旁等车，临近他们的，是三个衣着粗鄙的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带着羡慕的眼神望着两位遥远无比的贵族学校的同龄人。

这副著名的照片多年来一直被众多媒体登载，从《生活》杂志到左派的《卫报》，都用它来证明英国社会不平等现象的严重性。在2008年的地区选举时，工党的活动家竟然传上照片中人的装束，讽刺当时保守党的领袖卡梅伦出身伊顿公学，接受的是与老百姓根本支付不起的“精英教育”。

“为什么要把票投给这些特权阶层？”约翰斯这样问道，在她看来，英国政治走不出陈腐的老路，很大程度上便是由于贵族制度的遗毒，在今天，这种对于上流社会的向往，更直接地转化为金钱和权力的衡量标准。今天的英国，一方面贵族阶层日渐没落，同时，社会阶级的隔阂仍在。国家平等小组(National Equality Panel)今年的一份调查说，这些接受贵族教育的孩子在20到30岁之间的收入会接受普通教育的孩子高出至少8%，并且这个差距会随着时间而增加。英国社会的“王子与贫儿”戏码，依然在上演。

**John Wells, The House of Lords, Sceptre; New edition edition, Aug 1998**

图2为上世纪30年代著名的新闻图片《5个男孩》

## JAPAN 日本

# 当“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时候

特约撰稿人 刘柠（北京，postdadaist@gmail.com）

近年皇居，二重桥前。西装革履的上班族、白发长者、家庭主妇，人群一字排开，背景是大手町的高层写字楼群。人们把公事包、购物袋搁在地上，只手或双手在空中挥舞日章旗，面向皇居方向，三呼“万岁”。人群的上空，一片摇曳的日章旗形成的轨迹，像乳白色的水汽。其间，零星点缀着樱红、淡粉的色调，那是“日之丸”的影子。而随着“万岁”的众声被“蒸发”的，是围绕皇室女性继承权问题的舆论——什么叫“话语泡沫”？

巨蛋体育场（Tokyo Dome），举国若狂的职业棒球公开赛中日-巨人战。等待入场观战的观众，绕着桅杆似的大柱子，一圈一圈地排成长蛇阵，缓缓向前蠕动。起初，是人群头顶上氤氲的水蒸气改变了空气的折射率，空间在扭动。随后，人群开始“溶化”，先“液化”，继而“气化”。“气化”的人流，呈涡旋状从里向外翻滚、蔓延。位于涡心处未及“溶化”的人们，有如被置身于汪洋扁舟，紧靠“桅杆”。

东京最繁忙的火车站之一涩谷站。通勤高峰的人流，通过必经之路的过街天桥，像洪水，一泻而下；又像流动的气团，无形而诡异……这是日本新锐摄影家北野谦的风景观念摄影系列《溶化流散的都市》（Flow and Fusion）中的意象。

北野谦（Ken Kitano），1968年出生于东京。中学时代，出于兴趣开始把玩机械相机的同时，在家附近的公共图书馆里接触到细江英公、土门拳和森山大道等日本摄影家和一批海外摄影家的作品。摄影，不仅作为抽象的艺术观念，而是作为一种丰富而具体的印象被植入“写真青年”的心中。大学时代，北野参加了一个叫做“491”的摄影趣味小组，成员中不仅有同龄人爱好者，而且包括诸如福岛辰夫等前辈摄影评论家，同好间经常相互品评作品，举办品位不俗的影展，琢磨切磋，使北野收益匪浅。他回忆这段生活对自己后来的创作生涯发生的影响时说：“参加‘491’的活动，并不单纯是比写真水平的高低，而是人因写真会经历某种东西，我感到兹事体大。”



“泡沫经济”末期的1989年，日本正站在从“昭和”到“平成”的划时代拐点上。19岁的北野谦在新宿车站支起三脚架，开始日复一日地拍摄通勤高峰时段从检票口吞吐出来的人流——这是他镜头的景深中最初的“风景”。鬼使神差般的，他从一开始便选择用慢快门的长时间曝光拍摄，“因为我想看一看那些从来没人怀疑过的物事溶化的样子”。结果，看到的是历来强调轮廓、个性的人如何一点点“溶”于无形，最后成了有机粒子。当他意识到自己也不过是这种粒子般的存在的时候，仿佛透过当下实在的现实看到了世界的本质，有种前所未有的真正自由的感觉。这种发现对他来说是如此重大，乃至从

内心称之为“写真带来的奇迹”，并久久沉溺其中，不思也无力自拔。如是，北野的镜头渐次从人群移至高速公路的车流，都市夜空中的花火，甚至月亮、太阳等天体。

1995年，接连发生了阪神大地震和奥姆真理教沙林毒气事件，这对挣扎于“泡沫经济”废墟中的日本社会的世道人心

构成了沉重的追问。尤其是后者，市中心若干个繁华地铁站同时遭恐怖分子投撒剧毒神经性沙林毒气的袭击，瞬间导致 13 人死亡、重伤者逾 6000 名的惨烈事实，令终日以东京各主要车站为据点持续拍摄的北野感到生命的易碎，同时有种窒息感：就在此刻，就在不远处的地下，有人正被夺去生命——“人的存在极其暧昧，无固定形态，很悬。”人，意味着什么？生命的本质何在？诸如此类的本体论思考，每每在某个外景地狂掀快门的时候，尤其是在暗室里冲印作业的时候，都会被一次又一次地强化。而通过放大机的镜头，看到感光纸上的银盐颗粒在显影液中渐次呈现、聚集、清晰了的时候，北野都会油然感动于一种均衡之美。那种美，仿佛令他回到告别懵懂的孩提刚懂事时，初次打量大千世界时的感觉——“世界，好美。”

在同为风景观念系列的《一日》(One Day)中，北野力求通过收集“光”(从日、月、星辰的自然光，到城市的街灯、烟火)，把某个场所的“一日”呈现于一枚胶片中，然后再以相纸上“影”的形式将其“还原”成那个场所的时间，并使其永驻。因此，可能的话，一天 24 小时，或者至少是从日出到日落的时间，被经过严密工程计算的微小曝光量精确分割(北野系理工科出身)，再透过常开的摄影机快门，“累积”在胶片上。于是，我们看到新宿上空的晨曦像亮剑一般刺穿笼罩四合的暮霭，天光如何穿越富士山及山脚下的火山湖，在山的一侧划下彩虹般明亮的轮廓线。不知名的小镇，主妇清晨在阳台上晒被褥；晚上，街灯闪烁，万家灯火；入夜，烟花绽放，璀璨夺目。如此乍看上去寻常巷陌的城市日常风景，只因对光与影的集约化表现，作品便被赋予了某种令人致幻的超现实色彩。

尽管在全球化时代，世界的藩篱分崩离析，人流、物流、信息流变得迅捷、频仍，但高度媒体化、同质化的发展现状却反过来妨碍、制约了对某些全球化“死角”及陌生场所的表现。正如在全球化背景下，某个事件如果未被英文媒体报道，便等于没有发生过一样，在数码摄影技术高度普及的今天，所谓“有图有真相”，倘若某个场所未被时间曝光的话，似乎其存在便是被质疑的，至少是大打折扣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日》系列不失为以“场所与时间”的影像化表达为手段，对在全球化时代，因信息不对称的落差而导致的、或有意或无意的视觉盲区或认知遮蔽现象的某种抵抗。

摄影家新近制作的肖像系列《我们的面孔》(Our Face)无疑是其观念性最强的作品。如果说《溶化流散的都市》系列是对包括摄影家自己在内的抽象的“人”的本质的思考，《一日》是对“场所与时间”的思考的话，那么该系列则意味着摄影家对“他者”存在的思考。以不同的职业、学校、公司等集团为单位，从中抽取十数人到几十人不等，分别对每个人单独拍摄，用 35mm 胶片拍成单人肖像，然后再加以分门别类，重新排序。在暗室中，以微弱曝光量连续十数次到数十次重复曝光的形式，在一枚银盐感光纸上，使人的存在“集成化”，从而“复原”为某个集团的群像——“我们的面孔”。

在数字化图片处理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尽管也有艺术家尝试用 Photoshop 的“图层”(Layer)功能追求类似效果的实现，似乎也不乏实效差强人意者，但北野显然更注重观念摄影从创意到具体操作的艺术行为的连续性、完整性，更认同胶片加感光纸的模拟式传统手工暗房技法在传达自身艺术观念上的忠实性。暗房作业是一项高度细腻的工作，不容许半点失败。一幅成功的作品，来自于对数十枚负片的曝光，加上样片的实验曝光，往往需要上百次曝光，动辄花费两三天甚至更长的时间。2010 年 5 月，摄影家为在北京三影堂的个展(北野谦摄影展《我们的面孔》于 2010 年 7 月 3 日至 8 月 20 日在北京三影堂举行)特别制作的一批等身大的巨幅(142cm×178cm)作品，在 3 名暗房助理的协助下，昼夜兼程，第一幅作品成功“出炉”，整整用了一周的时间。一幅感光纸，在严格的操作规程下，经过全部规定的曝光，直至最后被从显影液池中小心翼翼地捞出来之前，摄影家对其成像的样态及“成功”与否，完全无从把握。

但惟其如此，正因了这种手工暗房操作的不可复制的神秘性，我们才得以看到一批如此梦幻的肖像作品：在京都宫川町跳“京舞”的 30 名艺伎的肖像；在和歌山县高野山专修学院修行的 35 名真言密教僧侣的肖像；新潟女子职业拉拉队 17 名



美女拉拉队员的肖像；于8月6日“和平纪念日”，在广岛市元安川漂放慰灵河灯的39名男女老幼的肖像；在台北参加同人杂志营销会的34名化妆秀少女的肖像；天安门广场24名卫兵的肖像；在望京伊藤洋华堂前的露天放映场观影的31名农民工的肖像；在达卡的缝纫公司脚踩缝纫机工作的35名孟加拉女工的肖像；在圣地瓦拉纳西的恒河中沐浴的17名印度教徒的肖像……

由于在暗房制作的过程中，摄影家始终以人眼的瞳孔为基准来调整焦距、曝光，从而使成像后的“我们的面孔”目光炯炯而不涣散；因脸部轮廓的模糊，使面孔看上去更加柔和，有极强的感受性；服饰则既不失职业特征，同时又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某种装饰效果。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阐述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特征时，反复使用的一个概念是“灵光”，认为“灵光”的衰退和反复性是机械复制时代艺术的宿命，主张勇敢地“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如果借用本雅明的“灵光”论来看北野谦的肖像系列的话，其把呈水平方向排列的人群“集成化”并以瞳孔聚焦的形式，在暗室中“复原”成某个集团的“群像”的方式，恰恰是通过人的眼睛，客观上保有了“灵光”的有效传递，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灵光”在传递过程中的“光损”也未可知。

在对作为“群像”的摄影对象的集团选择上，北野一向回避国家、民族等宏大叙事，而局限于“每天来车站前的居酒屋喝上一杯的主儿”的程度。作为一个艺术家，前者对人群的分割方式令他感到某种压力和危险。但他以自己的方式，仍然力求把镜头对准“所有的人”：“刚拍了离岛的小学生，下次想拍六本木一带的陪酒女郎，再往后想去见见北国的渔师；拍了民间传统艺人后，接下来想见识一下从事新兴运动的分子们。”不分新旧、区域、世代、立场，只用焦距来测量世界。过去十年来，进入摄影家镜头的人数以千计，从北海道到冲绳，从斯里兰卡到巴西，从沦落风尘的女子到一步一叩首的西藏圣徒，不一而足。照他最初的考虑，制作途中甚至可以让别人替代，接茬做下去，而摄影家仅仅在其中充当一个“装置”。如此，从亚洲，而非洲、美洲，从一个业种到另一个业种；拍过人之后，可以拍动物、植物，甚至天体，长此拍下去，“也许有一天，能发现点什么”。德国摄影家奥古斯特·桑德尔(August Sander)毕一生之役致力于拍摄现代德国所有阶层和职业的人的肖像，惜“壮志未酬身先死”。其子继承乃父遗志，孜孜不倦地推进。数年前，终于大功告成，结集7巨册出版，成就了摄影史上前所未有的史诗。

作为日本当代摄影家，北野谦的作品不仅有很强的观念性、前卫性，同时也不乏将艺术观念付诸影像表达的艺术表现力。在笔者看来，北野作品中的艺术张力，主要立足于两点：一是后现代主义，二是日本独特的美意识。后者相对单纯，只需看其作品的构图、色彩、意象，便不难发现诸多的日本元素(Japanese Element)。这不仅限于题材上的富士山、樱花树和日式商店街等文化符号，更重要的，是作品中无处不在的对包括这些文化符号在内的美的内核的展示技巧。一种节制、冲淡、有张有弛的，不事铺张却纹理细腻、富于层次感的表现手法，使那些原本稀松平常的风景(如沿海工厂群等)，也带上了某种敦厚的质感和沉郁的节奏。

至于前者，是一个颇复杂的问题。北野谦开始艺术创作的年代，正是日本“泡沫经济”即将破灭的时期，伴随着经济的高度增长，现代化已发展到极致，整个国家面临经济萧条、全球化与“后冷战”、从传统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型等矛盾的考验，从社会文化到道德人心，开始呈碎片化发展，自此拉开了日本后现代的帷幕。正如我们从北野最初的观念摄影作品《溶化流散的都市》中所看到的那样，一种曾几何时“有型有款”、令人确信不移的东西突然间便成了“暧昧”的代名词，继而分崩离析，“溶”于无形。借用美国文化批评家马歇尔·伯曼(Marshall Berman)援引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表述，“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图1为《东京巨蛋体育场》(Tokyo Dome)(东京, 1990年)

图2为新潟女子职业拉拉队17名美女拉拉队员重叠而成的肖像(新潟, 2000年)

## FOCUS 专题·诺贝尔文学奖

### 文学有什么用？

——提前宣告图书死亡

作者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翻译 吴万伟(武汉, [wuwanweione@yahoo.com.cn](mailto:wuwanweione@yahoo.com.cn))

在图书博览会或者书店里，我常常碰上人们走上前来请我签名的情景。此人会解释说“我是代表妻子、或小女儿或母亲请您签名的。她非常喜欢看书，热爱文学。”我马上问道“你怎么样？你不喜欢读书吗？”答案几乎总是一样的：“我当然喜欢读书，不过我很忙。”这种解释我听过很多遍了，这个男人和千千万万男人一样有太多的事要做，有太多的义务和责任要完成，因此没有办法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文学上，一连几个小时沉浸在小说、诗歌、或者散文中。在这些人看来，文学是可有可无的活动，无论在陶冶情操，提高修养方面多么有用，多么高雅，但从本质上说它是一种消遣，是有钱有闲的人才能享受的高雅活动。就像体育运动、电影、桥牌游戏或象棋一样，一旦碰上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任务或义务，就可能被毫不犹豫地牺牲掉。

文学似乎越来越成为女性的活动，这一点已经非常明显。在书店、在会议上、在作家的作品朗诵会上、甚至在大学文科院系中，女性人数明显超过男性。人们对于这个现象的传统解释是，中产阶级女性读书多是因为她们工作时间比男人少，所以许多女性觉得她们更有理由把时间花在幻想和想象中。我对这种把男性和女性截然分开，各有独特的美德和缺陷的解释极其反感，但毫无疑问，文学读者越来越少，而在仅存的读者中女性占了绝大多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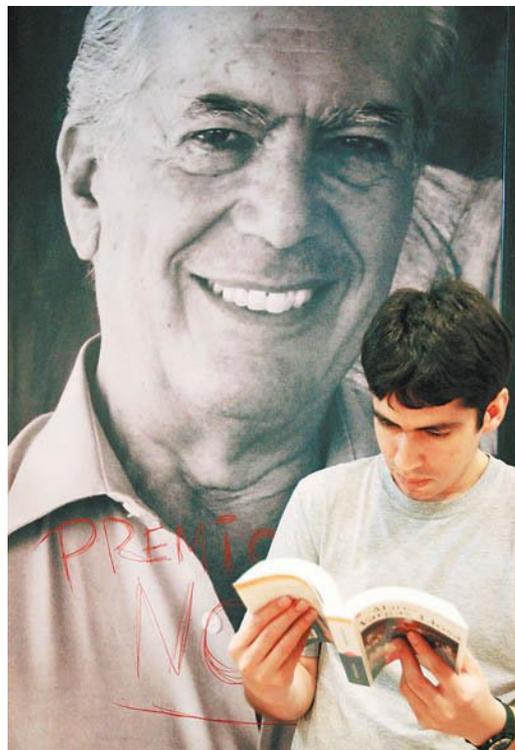
这几乎是世界各地都存在的现象。比如在西班牙，西班牙作家协会最近进行的一次调查发现，该国一半人口从来没有读过一本书。该调查还显示，在读书的少数人中，承认读书的女性高于男性 6.2 个百分点，这个比例还在增加。我为这些女性感到高兴，也为这些男性感到遗憾。我非常同情那些有读书能力而放弃读书的人。

他们赢得我的同情不仅因为这些人没有意识到自己错过的快乐，而且因为在我看来，没有文学的社会或者文学像某种隐蔽的罪恶被排斥到社会和个人生活的边缘，被视为宗派崇拜之类东西的社会注定成为精神荒芜、自由遭到破坏的社会。在本文中，我要驳斥把文学看作奢侈的消遣的观点。我认为文学是人类思想最重要和最宝贵的活动之一，是由自由的个人组成的现代民主社会培养公民的不可或缺的活动。

由于科技的迅猛发展和随之而来的知识被瓜分的碎片化过程，我们生活在知识专业化的时代。这种文化趋势在未来一些年可能进一步强化。当然，专业化带来很多好处。它使得人们能探索得更深入，进行更大的实验。专业化是促使科技进步的推动力量，但它也产生了消极后果，因为它消除了共同思想和文化特征，这些本来是促使人们共存、相互交流、感受共同体的归属感的東西。知识专业化要求专门化的语言和越来越晦涩难解的密码，因为信息变得越来越具体越来越琐碎。这是特殊主义和传统格言警告过我们的分裂：不要只看见枝杈和树叶，以防你彻底忘记它们是树的一部分，也不要只看见一棵树，而忘了它是树林的一部分。意识到树林的存在能产生普遍性的认识和归属感，这使得社会成员团结起来，防止社会分崩离析，导致人们成为一个个惟我独尊的原子。国家或者个人的唯我论导致偏执狂和神志失常，让人扭曲现实、制造仇恨、引发战争甚至种族屠杀。

在当今时代，科技不能发挥融合作用恰恰因为知识的无限丰富性和知识发展的高速度，这已经造成知识的晦涩难解和专业化。但只要文学存在，文学就一直是人类经验的共同特征，人们通过文学能够辨认出自己并进行相互之间的对话，无论其职业、生活计划、地理位置、文化传统以及个人境况多么不同。文学能够让生活背景完全不同的个人超越历史：作为塞万提斯、莎士比亚、但丁、托尔斯泰的读者，我们能够在超越时空的情况下相互理解，能够感受到自己是同一物种的成员，因为在这些作家的作品中，我们了解到共同的人性，看到我们种种差异背后的共性。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伟大文学作品中明确表现出来的这个真理更好地保护人类摆脱偏见、种族主义、宗教和政治宗派以及排他性的民族主义等种种愚蠢思想或行动了。所有国家和地区的人从根本上说都是平等的，不公不义才会在人们心里播下歧视、恐惧、压迫、剥削的种子。

没有什么比文学更好地教导我们认识到在民族和文化差异之中人类遗产的丰富性，认识到差异是人类多样创造性的表现。阅读好的文学作品当然是愉快的享受，但它同时也是学习的过程，它帮助认识到我们的身份和经验，我们的美德和缺陷，我们的行为和梦想，我们的幽灵和自我，我们和他人的关系，我们的公共形象以及我们最隐蔽的内心世界等等。



正如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所说的“这种矛盾真理的复杂总结”构成了人类生活的现实。在当今世界,人类的这种总体性知识和生活智慧或许只能在文学中找到。甚至在人文科学的其他学科中如哲学、历史、艺术、更不要提社会科学等都已经找不到了。它们已经无法维持这种全局性的视野和普遍性的话语了。人文科学也已经屈服于知识的致命分工和碎片化了,越来越孤立地守候在相互分割的专业领域,其词汇和思想已经不再能被普通人所理解。有些批评家和理论家甚至想把文学也变成科学。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小说的存在不只是为了探索人生经验的单一领域。文学的存在是通过想象力丰富人类生活的完整性,这是无法被分割、被切断或被简化成一系列永远不会消失的范式或者公式的。这就是普鲁斯特的观察的意义所在“真正的生活,文明的、发人深思的、完整实现的生活,这就是文学。”他没有夸张,也不是在表达自己对写作的热爱。他是在提出一个特别的主张,即经受了文学的熏陶,生活会得到更好地理解 and 实现,更加丰富和充实的人生要求人们与他人一起生活,一同分享。

文学有助于人们培养博爱的情感,迫使他们开始对话,教导人们超越一切暂时的障碍认识到共同的根源和目标。文学把我们运送到过去,把我们与从前时代的人物联系起来。通过阅读流传下来的作品,我们分享这些人物的谋略、快乐和梦想。这种超越时空的人类集体经验的归属感是文化的最高成就,没有什么比文学在每一代人身上复兴文化遗产方面做出的贡献更大的了。

博尔赫斯在遇到有人问“文学有什么用?”时总是非常恼火。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他总是回答说“没有人询问金丝雀的歌声或美丽的落日有什么用。”如果因为这些美丽的东西的存在,多亏了它们人生哪怕暂时变得不那么丑陋和悲哀,我们再穷追不舍它们存在的合理性难道不是太猥琐了吗?当然,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因为小说和诗歌并非像小鸟的歌声或壮观的落日那样是天生的或偶然的,它们是人类创造的产物,提出问题是合理的。我们应该询问文学是如何来到世界上的,为什么,它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能持续这么久等等。

文学作为没有形状的幽灵存在于作家的内心意识中,通过作家的无意识、作家对周围世界的敏感性以及作家的感情投入的联合作用而投射到作品上。正是这些东西使得诗人和小说家在寻找词汇的斗争中逐渐形成了形式、躯体、运动、节奏、和谐与生命。当然这是人造的生命是想象出来的生命,是由语言编织出来的生命,但人们竭力寻找这种人造生命。有人常常寻找,有人偶尔寻找,因为他们缺乏真正的生活,无法享受他们渴望的那种生活。文学不是通过单个人的作品而开始存在的,它的存在是在被其他人接受从而变成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后才出现。也就是多亏了人们的阅读,它变成了人们共享的经验。

文学的第一个有益的影响发生在语言层面。主要交流工具(词汇)一直受到文学熏陶和美化的社会比一个没有书面文学的社会在表达自己时会更准确、更丰富和细腻、也更清晰。一个不读书,缺乏文学熏陶的社会就像是聋子、哑巴和失语症患者组成的社会,这里因为语言粗俗和低级导致交流存在很多问题。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个人。一个不读书或读书很少或只读垃圾书的人是残疾人:他说话很多,但能表达的东西很少,因为他的词汇不足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感情。

其实,这不仅仅是语言上的局限性,也代表了思想和想象力的局限性。语言的贫乏也是思想的贫乏,因为思想观点和用来理解生存状况秘密的概念恰恰就存在于词汇里。我们只能从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学习如何正确地、深刻地、有力地、巧妙地说话。在创造人们用来交流的语言方面,任何其他学科或者艺术形式都无法替代文学。要说话得体,掌握丰富和多样的语言,能够找到合适的用语来表达想交流的思想和感情就是要更好地思考、教导、学习、对话、幻想、梦想和感受。语言以偷偷摸摸的方式在我们的所有行动中甚至在那些似乎和语言没有任何关系的行动中引起



反响。多亏了文学，语言才不断进化，达到了精致和美妙的高度，这增加了人们表达快乐的可能性。

文学甚至充当了为爱情、欲望和性行为本身赋予艺术创造地位的作用。没有了文学，性爱就无法表现。爱情和快乐将变得更贫乏，将缺乏雅致和精美，无法获得文学幻想提供的那种深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读过秘鲁文学家加尔西拉索（**Garcilaso**）、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家彼特拉克（**Petrarch**）、17世纪西班牙文学家贡戈拉（**Gongora**）、或法国现代诗人波德莱尔（**Baudelaire**）的夫妇将比那些因为看电视肥皂剧而变成呆子一样的文盲更重视快乐也更能享受快乐。在文盲的世界，爱情和欲望将和满足其动物本能的东西没有差别，他们也无法超越最原始本能的粗俗满足。

人们现在配备的旨在取代文学的视听媒体同样不能教导人们坚定和熟练地使用语言所包含的超乎寻常的丰富可能性。相反，视听媒体倾向于把文字贬低为形象之下的次等内容，因为形象是媒体的最基本语言，把语言限制在口头表达的最简化的范围内，这和书面语言相差十万八千里。把某个电影或电视称作“文学性的”不过是说它乏味的委婉语。因此，电台或者电视上的文学节目很少能抓住公众的注意力。据我所知，这个规则的唯一例外是法国贝尔纳·皮沃（**Bernard Pivot**）的读书节目《猛浪谭》（**Apostrophes**）。这让我想到文学因为充分的知识和对语言的充分掌握不仅是不可缺少的，其命运与书籍的命运紧密相连，密不可分。现在许多人已经宣称图书行业已经走到尽头。

这让我谈到比尔·盖茨。不久前他来到马德里访问了西班牙皇家科学院，该机构开始和微软公司进行合作项目。其中盖茨向院士们保证，他个人担保字母“-”决不会从电脑软件中消除，这个承诺让五大洲的四亿操西班牙语者松了一口气，因为从电脑空间中消除这个基本字母将造成前所未有的大问题。但在对西班牙语做出温和的让步后，在离开科学院大楼前，盖茨在记者招待会上誓言要在去世前完成他的最高目标。他解释说，他的目标就是先终结纸张然后终结书籍。

在盖茨看来，书籍是不合时宜的产物。他认为电脑屏幕能够取代纸张的迄今为止所能想象到的所有功能。他也坚持说除了更轻外，电脑占据空间更少，更容易传输，通过电子媒体传输的新闻和文学比报纸和书籍更具有环保优势，因为它们不用破坏森林，而这是造纸行业的灾难。盖茨向听众保证人们将继续读书，不过是在电脑屏幕上阅读，因此，更有利于环境保护。

盖茨讲话的时候，我并不在现场，我是从报刊上了解这些细节的。如果我在现场，我将向盖茨喝倒彩，因为我要揭露他把我和我的同事们——写书的作家直接纳入失业者行列的意图。我也会有力地驳斥他的分析。屏幕真能在所有方面代替书籍吗？我看未必。我非常清楚像因特网这样的新技术在交流领域和信息共享方面带来的革命，我承认因特网给我的日常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帮助，但我对这些不寻常的方便的感激并不意味着我会相信电脑屏幕会取代纸张，或者电脑阅读能够代表文学阅读。这是一个我无法跨越的鸿沟。我不能接受电脑屏幕上的非功能性的或非实用性的阅读行为，也就是既不寻求信息也不寻求有用的或即刻的交流的阅读行为能够获得像我在读书时得到的那种把梦想和词汇结合起来的快乐、那种亲密感、那种思想集中和精神孤独。

或许这是我缺乏实践和长期接触书籍和纸张写成的文学造成的偏见，但即便我很高兴地在网上搜索世界新闻，我决不会在屏幕上阅读贡戈拉的诗歌、乌拉圭小说家奥内蒂（**Onetti**）的小说或墨西哥作家帕斯（**Paz**）的散文，因为我肯定阅读的效果不同。虽然我不能证实，但我相信因为书籍的消失，文学将受到沉重的甚至是致命的打击。当然，“文学”这个术语不会消失，但它可以被用来指代一种既不是我们当今理解为文学的肥皂剧也不同于古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和莎士比亚悲剧的文本。

还有另外一个理由使得文学在国民生活中享有重要地位。没有了文学，作为历史变革的真正动力和自由的最好的保护者的批评性思考将遭受无法弥补的损失。这是因为所有优秀的文学都是激进的，都提出我们生活的世界的挑衅性问题。常常是在作者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所有伟大文学作品都表现出煽动性的倾向。

文学对那些满足于自己命运的人来说没有表达什么，这些人满足于他们现在的生活。文学是反叛精神的食粮，是非正统思想的传播者，是那些在生活中拥有太多或者太少的人的避难所。人们在文学中寻求庇护，以躲避不快乐或者不完美。并排和骨瘦如柴的战马骛骖难得（**Rocinante**）和困惑的骑士在拉曼恰镇（**La Mancha**）田野上一起骑马（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唐吉珂德》中的情节——译注），和阿博船长（**Ahab**）一起海上追捕鲸鱼（美国作家海曼·梅尔维尔的代表作《白鲸》中的人物——译注），和包法利夫人一起喝毒药，和格里高尔·萨姆沙（**Gregor Samsa**）一起变成昆虫（卡夫卡小说《变形记》中的人物——译注）：这些都是我们发明出来的使我们自己躲避冤屈和不公平的生活的哄骗的方法。这种生活迫使我们总是在希望成为其他人以便满足我们拥有的众多欲望时成为同样的人。

文学只是暂时地让这种激烈的不满趋于平静，但是在这个奇迹般的瞬间，在这暂时的人生悬空中，文学幻觉提升和转移我们到历史之外的地方，我们变成了没有时间的国度的公民，在此意义上我们成了神仙。我们变得比日常生活中处处受到限制时更紧凑、更丰富、更复杂、更快乐、更健谈。当我们合上书本，放弃文学幻想回到现实生活中，把它和刚刚离开的美妙

世界进行对比，等待我们的是多么令人失望的情景啊。但惊人的发现也在等待着我们，也就是说，小说中的虚幻生活比我们清醒时过的受到现实条件限制的无聊生活更美好、更漂亮、更多样、更全面、更完美。优秀的文学真正的文学总是颠覆性的、坚强不屈的、敢于反叛的，因为它挑战现有秩序。

在阅读了《战争与和平》或者《追忆似水年华》（法国作家马塞尔·普鲁斯特的作品——译注）后再返回到我们充满琐碎细节的世界，每个地方都遭遇边界和限制，每走一步都破坏我们的幻觉的世界里，为什么不感到受到欺骗了呢？甚至不仅仅是需要维持文化的持续性和丰富语言，文学对人类进步的最大贡献或许是提醒我们（在很多情况下是无意识的）世界很糟糕，那些假装与自己本性相反的权势者和幸运者在撒谎。他们宣称世界能够被改善，能够变成我们想象的或者我们的语言能够创造的理想世界。自由民主的社会必须拥有负责的和批评性思考的公民，我们意识到不断考察我们生存的世界的必要性，即使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任务，我们仍然要尽力让世界变得更加接近我们愿意生活的世界。没有比阅读优秀文学作品更好的办法来挑起人们对生存的不满了。没有比阅读优秀文学作品更好的办法来塑造不受当权者的操纵，拥有永久的精神动力和丰富想象力，敢于批评和独立自主的公民了。

文学具有煽动性，因为它激发读者认识到世界的不完美。虽然如此，这并不意味着文学作品将导致即刻的社会动荡或促进革命风潮的出现，正如教会和政府的确立审查制度时似乎认为的那样。一首诗歌、一部戏剧或者一篇小说的社会和政治影响是无法预测的，因为它们是集体的或者是集体经验。它们被个别人创造出来被个别人阅读，但人们从自己的写作和阅读中得出的结论差别很大。因此，确立精确的模式很难，甚至根本不可能。而且文学作品的社会后果与其美学质量没有多大关系。海瑞特·比彻尔·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的平庸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似乎在促成美国对于奴隶制的恐怖的政治和社会意识方面似乎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很难辨认文学的这些影响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它们根本不存在。重要的一点是它们是公民行动带来的影响，公民的个性部分就是书籍形成的。

优秀的文学虽然暂时消除人们的不满，但实际上通过塑造针对生活的批评性的和非正统的态度增加了人们的不满。甚至可以说文学造就了更加不快乐的人。不满现状，与现实生活发生冲突就是要寻找或许并不存在的东西，就是要进行徒劳的斗争，就像《百年孤独》中的奥瑞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Aureliano Buend**）上校明明知道他会败地一塌糊涂仍然进行的战斗一样。所有这些都可能是真实的，但同样真实的是，如果没有了对生活中的平庸和肮脏的反叛，我们将继续生活在原始状态，历史的脚步将停止不前。独立自主的个人将不再出现，科学技术将不再进步，人权将不再得到承认，自由将永远消失。所有这些都产生于不满现状，产生于挑战不充分或不可容忍的生活的反叛行为。因为这种嘲笑现实生活的精神，文学发挥了伟大的推动力量，正如唐吉珂德疯狂的寻找，而他的疯狂恰恰就是阅读骑士小说而来。

让我们尝试虚幻的历史重构。假设一个没有文学的世界和从来不读诗歌和小说的人类。在这萎缩的文明里，其可怜的词汇——嘟囔和猿猴一样的手势将凌驾于词汇之上，不再有某些形容词。这些形容词包括：唐吉珂德式的、卡夫卡式的、拉伯雷式的（**Rabelaisian**）、奥威尔式的、萨德式的（**sadistic**，施虐狂，源自法国作家萨德，他以性倒错施虐狂描写著称——译注）、马索克式的（**masochistic**，受虐狂，源自奥地利小说家马索克，**Leopold von Sacher Masoch**，其作品对受虐狂曾作描绘——译注），所有这些术语都有文学的源头。当然，世界上仍然有疯狂之人，偏执狂和虐待狂的受害者，有不寻常爱好和令人厌恶的过分行为者，喜欢制造痛苦和承受痛苦的二足动物。但我们将不会了解到在我们的文化规范所禁止的这些异常极端行为背后的基本人性。我们将不会在自己身上发现塞万提斯、卡夫卡、拉伯雷、奥威尔、萨德和马索克的天才向我们揭示的特征。

当小说《唐吉珂德》出现时，它的首批读者嘲笑这个超级梦想者以及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今天我们知道“哭丧着脸的骑士”（**caballero de la triste figura**）坚持认为在风车之处看到了巨人，并用他看似荒谬的方式行动。这实际上是最高程度的慷慨，是抗议这个世界的苦难并希望改变这种状况的一种方式。如果没有体现在塞万提斯的天才的说服力创造出来的小说主人公的话，我们充满积极的道德含义的理想或者理想主义的想法将不是现在的样子，将不是清晰的和可敬的价值观。这种说法同样适用于渺小的现实的女唐吉珂德——爱玛·包法利，她竭力要过一种从小说中认识到的充满激情的奢华生活。她就像一只蝴蝶，过于接近火焰，终于在烈火中丧生。

所有伟大的文学创造者都开阔我们的眼界，让我们看到自己未知的方面。他们让我们能探索和充分理解人类共同的深渊。当我们说“博尔赫斯式的”这个词时，马上魔术师般地出现我们思想和现实的理性秩序的分隔，让我们进入虚幻的世界，一个强有力的优雅的思想体系。那里几乎总是迷宫和神秘莫测，充满了文学典故，提到各种人物，他们的奇特性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因为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自己性格中隐含的欲望和真理，这些都多亏了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的文学创作而呈现出来。每当我们作为没有防备的个人遭遇到曾经造成现代世界这么多痛苦和不公的压迫性的权力机器的威

胁时，“卡夫卡式的”这个词就像那些带有支架的老式照相机的镜头进入我们的头脑，让我们看到专制政权、一杆子插到底的政党、缺乏宽容的教会、令人窒息的官僚系统。如果没有布拉格这个受到折磨并一直保持警惕的犹太人用德语写的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我们将不能理解孤独的个人的无奈感受和被折磨和歧视的少数人的恐怖。在遭遇囊括一切的权力时，他们可能被当权者在无须追随者出面的情况下轻易地消灭。

形容词“卡夫卡式的”的亲属“奥威尔式的”表达了 20 世纪极权主义独裁者造成的可怕的痛苦和极端荒谬的认识。这是历史上最复杂、最残酷、最绝对的独裁，它控制了社会每个成员的行为和心理活动。在小说《1984》中，乔治·奥威尔描述了屈服于老大哥的冷酷和令人胆寒的阴影下的人性，此人拥有绝对的权力，通过恐怖和技术的高效结合，消除自由、平等、和创造性，把整个社会变成无灵魂者的蜂窝。在此噩梦般的世界里，服从于权力的语言已经被改造成“新话”，所有创造力和主动性都被清除，变为一连串的陈词滥调，以确保个人臣服于这个制度。当然，《1984》的可怕预言并没有实现，苏联的极权共产主义像德国和其他地方的极权法西斯主义一样走上穷途末路，在中国、落伍的古巴和北朝鲜，它也日趋没落。但是极权主义的危险从来没有彻底排除，“奥威尔式的”这个词继续描述这种风险，帮助我们理解这个现象。

文学的非真实性和文学谎言也是人们认识最隐蔽的现实的宝贵工具。文学揭露的真相不一定是令人高兴的，有时候我们从小说或者诗歌的镜子中看到的自身形象就是魔鬼。这发生在我们阅读萨德幻想的可怕的性虐待情节时，或马索克和法国评论家巴塔耶（Bataille）令人诅咒的书中的黑暗撕裂和残酷牺牲中。有时候，这种场景非常恐怖和惨烈使得这些书不可抗拒。但这些章节中最糟糕的不是鲜血、羞辱和接近于折磨的爱情，最可怕的地方在于人们发现这种暴力和野蛮行径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它们是隐秘人性的组成部分。

这些迫切扭曲的猛兽隐藏在我们身体中最隐秘的地方，从其生存的阴影中寻求展现自我的合适场合，实施可能摧毁理性、社会、甚至生存的无限欲望的控制。首先进入人们思想的这些阴暗之处，并发现其破坏性和自我破坏性的潜力的东西不是科学。是文学做出了这个发现。一个没有文学的世界就相当于对这些可怕的深渊茫然无知，而我们迫切需要看到这些东西。

不文明、野蛮、缺乏敏感性、言语粗俗、无知、依靠本能、情感乏味、爱情原始等，这些就是我描述的没有文学的世界的主要特征，这个噩梦将让整个类屈服于权力和正统思想。在这个意义上，它也是纯粹的动物世界。原始本能将决定日常的生活行为，生活的特征就是生存斗争。人们害怕未知的东西，满足于物质需求。这里根本没有精神追求的任何地位。而且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摧毁一切的单调还伴随着悲观主义的可怕阴影，因为人们感到人类生活从来如此，未来依然如此，没有任何人或者任何东西能够改变它。

当人们想象这样的世界时，人们可能忍不住想象热带国家那些用腰布蔽体的原始人，生活在拉美、澳大利亚和非洲的现代社会的边缘地方的小规模的神秘的宗教性部落。但是我的头脑中还有另外一种失败者。我描述的噩梦是社会过分发展而不



是发展不足造成的后果。因为技术进步和我们对技术的臣服，我们或许想象一个充满了电脑屏幕和说话者的未来社会，那里没有书，或者书（也就是文学作品）已经成为物理学时代的炼丹术：古老的好奇心，神经兮兮的少数人在媒体文明的地下墓地悄悄从事的勾当。我担心，虽然这个电脑世界繁荣和强大，生活水平高，科技成就多，它可能成为严重缺乏文明，完全没有心灵的地方，成为那些放弃自由的后文学时代的无灵魂者的荒原。

当然，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乌托邦的可能性不大。在我们故事的结尾，历史的终结还没有被书写出来，一切都还没有确定下来。我们未来将成为什么样子完全取决于我们的视野和意志。但如果我们希望避免想象力的缺乏，确保我们的敏感性永不满足的精神常存，学会雄辩有力地讲话，巩固我们的自由，我们就必须行动起来。更准确地说，我们就必须读书。

图 1 为一位读者在略萨画像前阅读略萨的作品

图 3 为略萨获奖后其作品销量猛增，书商在向读者展示略萨的作品

图 4 为 2010 年 9 月略萨在法国巴黎参加其个人著作展

译自：The premature obituary of the book, Why Literature? By Mario Vargas Llosa

[http://www.uwec.edu/pnotesbd/Llosa\\_article.htm](http://www.uwec.edu/pnotesbd/Llosa_article.htm)

作者简介：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乔治敦大学伊比利亚美洲（Ibero-American）文学和文化教授，最近刚刚获得 2010 年诺贝尔文学奖。他的新书《色鬼的盛宴》即将在 11 月份由法劳斯特劳斯和吉罗出版社（Farrar, Straus & Giroux）出版。

## FOCUS 专题·诺贝尔文学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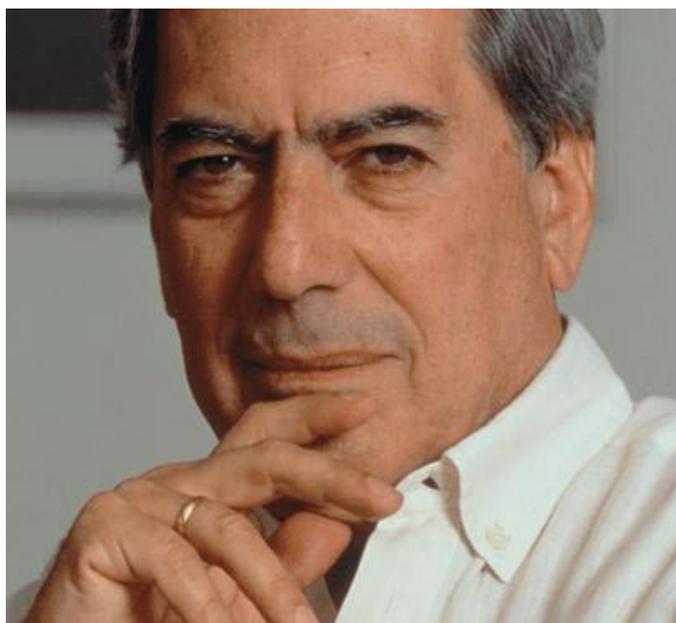
### 巴尔加斯·略萨：五分人生，三分想象

钟蓓（北京，[dearestbei@yahoo.com.cn](mailto:dearestbei@yahoo.com.cn)）

诺贝尔文学奖经常都在用不同的标准替“冷门”下定义，但今年获奖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是个“热门”。“热”是因为老先生时常出现在博彩公司开出的名单上；因为他的小说、文学创作理论书籍在这几十年间不断被重新出版。一位在英国的书店雇员在 twitter 上写到：“今年的诺奖得主大家都认识，书店能大松了一口气”。

摊开略萨的简历，1936 年 3 月 28 日出生……符合诺贝尔评委口味的经历俯首皆是：成长在军政府统治时期的秘鲁；有浓厚的政治兴趣，一度参加秘鲁总统竞选；文学创作上，写过长中短篇戏剧文学史文学评论；文学科班出身，是曾经风靡一时的拉丁美洲的“文学爆炸”的主将之一，获诺奖前已经拿过拉美最高文学奖“罗慕洛·加列戈斯小说奖”、西班牙“塞万提斯文学奖”、以色列“耶路撒冷文学奖”……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略萨先生身体健康。

瑞典学院在揭晓诺奖时表示，略萨对权力结构、个



体的坚持、反叛与抗争有鞭辟入里的刻画，为此向他致敬。瑞典学院秘书长彼得·恩格伦德将略萨称为“天赋如有神助的说故事者”，因为他笔下的世界“结构庞杂，角度多元，呈现出不同的声音和不同的时空。”他“以一种崭新的方式去写作，因此推进了叙事艺术的发展”。

### 有多少人生可以贩卖？

略萨是那种典型的贩卖自己人生的作家，从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城市与狗》（1963年）开始，他就从丰富的人生经历中取材。这个关联了着他少年时期军校学习和生活的故事，主人公是“狗”（军校学员），内容折射了“城市”（秘鲁社会）的军事独裁统治。很快，书被“城市”列为禁书。

略萨继续在人生的长河里挑选素材，10岁时全家在皮乌拉居住时的所见所闻，当记者时去过的地下酒吧、舞厅、妓院的经历，在大学时随考察团去原始林区看到的印第安人的部落生活，刺激着他的创作神经。

“《绿房子》就是从这些回忆中产生的。在这部小说里，我企图通过妓院的建立在皮乌拉人的生活中和想象中所引起的混乱，以及一群冒险家在亚马孙河流域的所作所为及其不幸的遭遇，以虚构的方式，把秘鲁两个相距遥远、差别很大的地区——沙漠地区和森林地区——连接起来。”从政客到地痞、修女到妓女、军官到士兵、神父到妓院老板、外国冒险家到印第安土著……整个秘鲁北部的社会生活面相都被囊括在“绿房子”里。

《绿房子》的叙事结构是好玩的智力游戏。全书由4部分和1个尾声组成，每部分有一篇“序言”和若干章节，每章又包括若干场景。内容上，略萨写了5个故事，通过打破时空次序的方式，5个故事被切割成情节小块安排进不同场景。在人为制造的阅读困难里，读者的兴趣和注意力被充分调动，一边阅读，一边排序。除了编码式的整体结构安排，略萨在这部小说里也运用了“中国套盒”的写作方法。在一个套一个套一个的叙述者转换过程中，将故事向前推动。《绿房子》使他获得首届“罗慕洛·加列哥斯国际小说奖”，而且帮他提升了不少在拉美文学界的地位。再之后，有人就把他和加西亚·马尔克斯、胡里奥·科塔萨尔以及卡洛斯·富恩特斯一起视为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第一集团军。

写到《胡利亚姨妈和作家》，略萨以自己 and 第一任妻子胡利娅（也是他舅妈的妹妹）之间发生过的鸡零狗碎给这本书打了层半自传的粉底。书的出版对姨妈是个雪上加霜的打击。不仅因为花心的略萨刚和她离婚，立刻娶了她的外甥女帕特里西亚，而且略萨丝毫不觉得向公众抖搂自己与前妻的事儿有多羞愧，也未尝意识到姨妈和她的生活在书出版后被彻底冒犯了，他甚至没有任何歉意。这个没有写作经验的愤怒女人随即提笔写出了一本《巴尔加斯没有说的话》（又译《作家与胡利娅姨妈》）。至此以后，她再没从《城市与狗》的版税中收到一分钱。但此前，略萨已经把这本书的版权让给了她。

经历写完了，略萨必然转向他熟悉的历史题材库。在事实配合想象的基础上，他完成了《公羊的节日》（1998年）。这回他把笔端对向多米尼加共和国元首特鲁西略。作家严肃地描写元首：“只要休息一分钟，他恢复体力的本领就可以让他戴上超人的光环。”“30多年来，这个国家发生的一切多亏了元首的领导。”“特鲁西略可以让水变成酒，让面包成倍增加，只要他老人家高兴。”特鲁西略的后人看到这本书，扬言要宰了略萨。

### 天堂在另外那个街角

从这几年诺奖得主的人选看，不论是2009年德国女作家赫塔·米勒，2006年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2005年英国剧作家哈罗德·品特，他们都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巴尔加斯·略萨的获奖再一次扣动了文学与政治之间的扳机。

新闻发布会上，略萨对媒体说：“对于一位拉丁美洲的作家来说，避免政治是困难的。”“文学是生活的表现，你无法将政治从生活中铲除。”

去年5月，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宣布，为庆祝他亲自主持的周日电视脱口秀《你好，总统》开播10周年，将推出一期长达4天的马拉松谈话特别节目。第一天，查韦斯滔滔不绝地讲了6个小时。同时，他向正在加拉加斯参加会议的一些拉美知识分子发出辩论挑战，正在此间访问的略萨接受战书，条件是是与总统一对一。第二天，查韦斯就宣称要保持中立，不参与辩论，并戏称略萨不够资格，要想跟他单挑，得当上秘鲁总统。

竞选总统的事迹应该是略萨人生中最昏头的冲动。1987年7月，略萨和帕特里西亚回秘鲁度假。时任秘鲁总统的阿兰·加西亚宣布政府准备对金融业实行国有化。略萨认为“国有化”的背后是加强政治独裁统治的一项重要经济举措。随着全国的抗议活动兴起，他和几位朋友起草了《面对独裁统治的威胁》的抗议宣言，并在各大报刊上发表。谁知这份宣言让略萨成为政治明星，每天都有各地人士来他家畅谈，朋友们也让略萨出面组织大规模集会游行，被燃烧得无法控制的略萨甚至组建了新政党“自由运动组织”。

至于文学……

当时正在创作的《继母颂》里的情爱场景都无法留住作家的心啊！帕特里西亚说：“你的心和魔鬼已经签订了协议。”

1990年，57%的秘鲁选民和摆了他一道的竞争对手让作家在总统竞选中败下阵。带着堂吉珂德式的伤感，他离开了秘鲁，回到欧洲的舒适环境继续文学创作。

2003年4月15日，《时代》周刊记者采访略萨：“您对支持乌托邦政治思想家的作家有什么看法？比如：智利诗人聂鲁达、古巴诗人纪廉、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

“在文学领域，作家迷恋乌托邦思想是自古至今常有的事情。由于热爱文学，作家常常梦想有个完美的世界，梦想有个与自己的希望一致的世界。不幸的是，他们往往把真正地狱般的社会制度看作是完美社会。有时有些大作家，比如加西亚·马尔克斯，支持那些践踏人权、囚禁持不同政见人士的政权，这让我非常难过。但是，正如天才作家加缪说的那样，艺术才华绝对不会以政治上的清醒为前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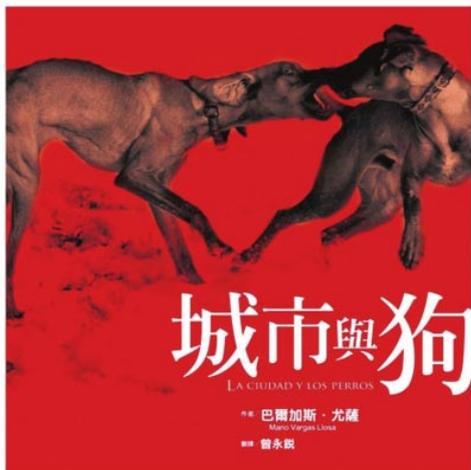
### “文学爆炸”的家长里短

“文学爆炸”圈子里的人没有留下系统的文字证据，因为他们太爱旅行、打电话，不像英国的布鲁姆斯伯里(Bloomsbury)文学圈，通过一些形成文字的日记、书信和回忆录，几乎可以一步步重建起他们的生活、社会关系、友谊、爱情。

在那些争吵和好、和好争吵的游戏里，萌动的心思和念头的起落都成为不可言说的秘密。只有当考据癖需要，或者巴尔加斯·略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样的大事儿发生时，曾经被记录下的只言片语才被重新翻出箱底。

他们曾像个“大家庭”，彼此是亲人般的朋友。孩子们聚在一起时，甚至被称作“迷你文学爆炸”。巴尔加斯·略萨、加西亚·马尔克斯住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萨里亚区时，两家是隔了一个街区的邻居；卡洛斯·富恩斯特和何塞·多诺索是好朋友；加西亚·马尔克斯家搞装修，换下的红窗帘直接挂进了多诺索家的起居室；多诺索夫人少有机会穿的红裙子后来成了略萨夫人帕特里西亚的最爱……而巴尔加斯·略萨与胡里奥·科塔萨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结识的过程是再俗气不过的爱情小说里的一见钟情式：

因为《绿房子》，巴尔加斯·略萨获得“罗慕洛·加列戈斯小说奖”，他乘飞机从伦敦赶到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领奖。在迈凯迪亞市机场，他碰见了从墨西哥城飞来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只此一面，他们成了朋友，在频繁往来的通信里，哥伦比亚作家称呼秘鲁作家是“文学界最后一位堂吉珂德”，而秘鲁作家认为哥伦比亚作家是“美洲的阿玛迪斯”。



这份看似美好、肉麻的惺惺相惜甚至让两个人动了合写一部长篇小说的念头，而小说的主题是1930年代秘鲁和哥伦比亚之间发生的战争！

巴尔加斯·略萨和胡里奥·科塔萨尔相识在餐馆，虽然不同桌，陌生丝毫不影响伟大作家们的相遇，一番海阔天空的文学侃大山，彼此心里就把对方当做朋友。整个过程，不到一顿晚饭的功夫。饭快吃完，巴尔加斯·略萨才知道这个保养得很好的“同龄小伙子”比他大22岁，是他早年读过的《角斗士》、《国王们》的作者胡里奥·科塔萨尔。

巴尔加斯·略萨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商量好的战争最终不是靠写出来的。1976年2月12日，拉美的文艺名流汇聚墨西哥城出席某电影首映。文坛明星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巴尔加斯·略萨如期而至，众目睽睽下，后者一拳砸在前者左眼眶，嘴里还嚷嚷：“你在巴塞罗那对帕特利西亚做了那事儿，怎么还敢来这跟我套近乎！”作为巴尔加斯·略萨打人的证据，左眼“熊猫眼”的加西亚·马尔克斯肖像照从此到处流传。至于“那事儿”是哪事，30多年来，天知地知一个女人两个男人知，其他人都不知。

可知的是“那事儿”影响巨大，不仅毁了亲人般的友谊，而且让打人凶手巴尔加斯·略萨晚了28年获诺奖（据说1982年瑞典文学院取消把诺贝尔文学奖同时授予两人的决定，以免发生其中一人拒绝领奖的尴尬。），晚了28年成为“一样的人”（得知巴尔加斯·略萨获奖，加西亚·马尔克斯在twitter上发了一句话，“现在我们一样了！”）。

图1为略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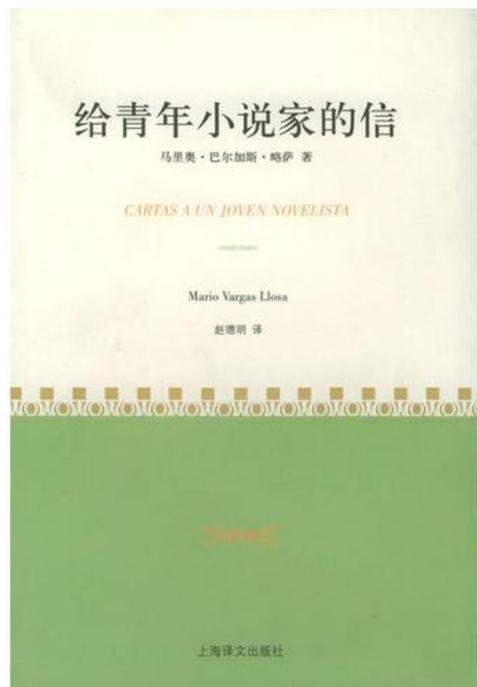
图3为略萨（右）与马尔克斯，二人曾经反目成仇

## FOCUS 专题·诺贝尔文学奖

### 小说结构的魔法师

特约撰稿人 凌越（广州，iamlingyue@yahoo.com.cn）

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第一章《绦虫寓言》中，略萨就写作和荣誉的关系亮出自己的观点，劝诫年轻小说家们要将献身文学抱负和求取名利区分开，因为“作家能够获奖，得到公众认可、作品畅销、拥有极高知名度，都有着极其独特的走向”。现在，诺贝尔文学奖这一文学世界最大的荣誉，终于迈着独特的舞步找到了这位“受之无愧的作家”。和诺贝尔文学奖近年得主获奖前国际知名度普遍不算高不同，略萨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和一批杰出的拉美作家一起为世人所瞩目，常常和略萨并列被论及的这些拉美作家包括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科塔萨尔、富恩特斯等，



其中每一位作家得诺贝尔文学奖似乎都算不上新闻，这回略萨得奖，估计大多数人的反应会是欣慰中带着平淡：“哦，是他。”略萨大概也是获诺奖前在中国被译介得最充分的诺奖得主，仅在去年就有上海译文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两套略萨文集共计六部长篇小说在中国出版。

略萨小说在世界范围内广受欢迎，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是其中携带的拉美文化中特有的热烈、蓬勃的气息，主题涉及非常广泛，政治、社会、情爱、历史、种族等等都在略萨小说中得到汪洋恣肆地表现，但是对于“小说反映现实”这一古老的小说命题，略萨一定持坚决的否定态度，因为在他看来，“小说家不选择主题；是他被主题选择。他之所以写某些事情，是因为某些事情出现在他的脑海里。在主题的选择过程中，作家的自由是相对的，可能是不存在。”略萨的小说性感、迷人、热气腾腾，和拉美的现实有着缠绕般的紧密联系，可是谈起小说，略萨是不折不扣的形式论者：“任何小说都是伪装成真理的谎言，都是一种创造。”但这和他小说中扑面而来的现实感并不矛盾，因为读者获得的那种“活生生”的感觉，正是得益于略萨娴熟地使用造成艺术错觉的技巧和类似马戏团或者剧场里魔法师的戏法。

略萨被公认为是所谓拉美“文学爆炸”里的一个重要支脉结构现实主义

的主将。他的许多小说结构都颇为新颖别致，这些结构设计多半和小说的主题完美地凝合成一个整体，最终使整部小说呈现出魔幻又逼真的艺术效果，也就是略萨一再强调的“说服力”。所有文学都不可能真正“反映现实”，因为文学在直观上就是一堆文字语言符号而已，可是有意义的是，这些在特定时空下被赋予含义的语言符号通过奇妙复杂的相互作用最终让读者获得一种无与伦比的“真实感”，哪怕作家所写的事情在情节的层面完全不合常情、匪夷所思，略萨喜欢的许多作家皆属此列——科塔萨尔、博尔赫斯、鲁尔福、卡夫卡等等。如此看来，文学的关键正在于如何让文字与现实产生复杂的互动，包括略萨在内的一大批优秀作家正是以此为起点展开他们精湛的思考。

略萨的相关思考集中体现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一书中，这是一本只有七万六千字（中文）的小册子，但却是理解略萨那些卷帙浩繁的小说的关键。在书的第二章《卡托布勒帕斯》中，略萨将写长篇小说比喻成穿衣的过程：“作家要渐渐地给开始的裸体，即节目的出发点穿上衣裳，也就是用自己的想象力编织的五颜六色和厚重的服饰逐渐遮蔽裸露地身体。”这个裸体是指在作家脑海中挥之不去促使他产生创作冲动的形象、事件或想法。而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中，略萨所要展示的正是这用以遮盖裸体的厚重服饰，他的展示如此细致，我们不仅能看到这服饰的颜色、款式和质地，甚至可以看清纽扣的形状、微微凸起的针脚，以及服装表面细密的纹路。——不用说，这可是一位手艺高超的裁缝。

这种讨论小说的方式说明略萨是一般意义上的形式主义者，略萨在第三章《说服力》中也坦承：“小说中最具体的东西就是形式。”但是和所有敏锐的作家一样，略萨对自己所有结论性的观点都怀有一种警惕之心，以避免这些观点在过分的强调中走形变样，因此我们很快又看到略萨对刚才那个观点的进一步解释：“内容和形式（或者主题、风格和叙述顺序）的分离是人为造成的，只有出于讲解和分析的原因才能成立，实际上是绝对不会发生的。”

实际上，书的前三章都是为略萨在随后章节中专注地谈论形式问题做着准备工作，扫清观念上显眼的障碍。第一章《缘虫寓言》强调走上写作之路的先决条件是对于写作本身的热爱，一种不计名利和后果的热爱，当一个年轻作家准备把时间、精力、勤奋全部投入文学抱负中去，他才有条件真正成为作家。第二章《卡托布勒帕斯》主要是讲生活现实与文学现实之间复杂的对应关系，结论是：“小说家强烈渴望有一个与现实生活不同的世界……并用这种现实去代替他们接触的生活中的现实。”但很快略萨又察觉这样的观点有失偏颇：“我觉得如果不是从生存本身出发，不是在把我们这些小说家变成我们虚构作品中对生活从根本上的反抗者和重建者的那些幽灵的鼓励和滋养下进行写作，我觉得很难成为创作者，或者说对现实的改造者。”这段话其实也印证着略萨在后面章节中，对于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所做的复杂而略带游移的论述。这种还算鲜明的形式主义观点，大概会让试图从政治和现实层面解析略萨小说的学者感到不适。从小说的效果看，略萨确实不是只懂得玩弄文字的“纯粹”作家（这其实已经不是略萨所说的形式，它已经被大众读者习惯性缩小了范围和领地），但略萨也不是现实生活简单的对抗者，略萨小说中所透露出的清晰的反抗精神，是更高意义上的政治：“凡是刻苦创作与现实生活不同生活的人们，就用这种间接地方式表示对这一现实生活的拒绝和批评，表示用这样的拒绝和批评以及自己的想象和希望制造出来的世界替代现实世界的愿望。”也就是说，作家的政治态度体现在想象和现实之间永恒的对立关系上，而优秀的作家往往是在这两者的接壤地带发掘出宝藏。对于另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有关小说作者真诚与否并以此作为评价小说成就的一个标尺，略萨也在书中亮出自己看法，这看法如此明确，大概他是想腾出更多的篇幅及早展开他关于小说的形式分析：“真诚或者虚伪在文学领域不是道德问题，而是美学问题。”

在厘清了这些基本问题之后，从第四章《风格》开始，略萨得以坦然专注地进入他所擅长和热衷的形式分析，当然敏感仍然让他在论述中瞻前顾后，尽量寻找准确妥帖的措辞，以使自己的观点更具弹性和说服力，可是这些都是局部的问题了，他可以集中“优势兵力”予以解决，不再会被事关全局的问题所困扰。同时略萨在后面的章节中也时常回到前三章讨论过的概念——真实、现实、说服力、真诚等等——目的是为了以此为依据审慎地去品评那些技术手段的优劣——一种相对性的基本观念一直处在略萨思维的核心地带。

在具体进入形势分析时，略萨善于以相对立的两个例子来讨论某种技巧，这样做的好处是他无论怎么细致地对某个方面进行详尽阐发，都不至于落入极端的陷阱。比如在论述叙述者空间问题时，他一方面列举福楼拜的观点：坚持主张叙述者应该深藏不露，只限于讲故事，而不能就故事本身发表意见；并盛赞福楼拜此举“为他在现代小说和古典小说之间划出了一条技术界线”。另一方面，略萨也对雨果的巨制《悲惨世界》中那个经常离题千里，迫不及待表达作家自身观点的声音给予充分理解。在讨论现实层面和想象层面的关系时，略萨则分别以罗伯-格里耶的《嫉妒》和维吉尼亚·伍尔夫的《达洛维夫人》为例，前者发展出一种旨在物化现实，把现实所包含的一切——甚至感觉和激情——都当作具体物品来加以描写的叙述技巧，后者则反其道而行之，透过字里行间巧妙的描写虚构天地的视角，成功地把整个现实精神化、非物质化。略萨对相反例证的阐述也证明他对于形式技巧在价值取向上持中立态度，他所讨论的各种小说技巧到底得服从于一个更高的东西，那是精神？

对现实的态度？或者美？至少略萨这种既热衷技巧又不迷信技巧的务实态度——他在书的最后一章说得明白：“文学批评是在运用理性和智慧，但在创作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还包括直觉、敏感、猜测，甚至偶然性，它们总会躲开文学批评最严密的网眼。”——，最终使他游刃有余地使用这些形式工具（花样繁多的技巧的使用，反而让他免去了形式上的偏执感），并悖论般洗去自身所携带的形式色彩，为对生活现实的强力介入扫平了道路。对于许多论者从现实政治层面谈论自己的小说，略萨一定会报以狡黠的微笑，因为那恰恰证明他在小说中不断抖出来的那些戏法终于得逞。

略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赵德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10月，15元。

## BOOKREVIEW 书评

### 一个激情、风骚并决绝的女人

观察员 朱白（广州，[youjinma@gmail.com](mailto:youjinma@gmail.com)）

拉美文学正在被今年诺贝尔文学奖新得主重新唤起，巴尔加斯·略萨此时是那块土地上的眼下最耀眼的明星，尽管此人早就不生活在那里了。

其实不知道真正的拉美文学现状如何，所谓被唤起也是隔靴抓痒式的幻想，那些真正的拉美文学书写者此时是否依然魔幻、还是想象力几近泛滥的旺盛，我们最多也就是通过新鲜的作品远望一下。真正应该和一定会被唤起的是阅读的兴趣。既然我们的出版人这么爱跟风，想必会在不久的时间狂出一批拉美文学的译本吧。就有限的阅读来说，不是太多，而是太不及时和系统，拉美文学的精品正等待着有眼光的出版人不断发掘。

《普埃布拉情歌》不是跟风之作，而是填补空白的作品。这样美好的作家，让中国读者等了这么久才能邂逅，实在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除了说明我们的出版人眼光狭隘以外，大概只能说明浩瀚的拉美文学宝库里，实在太多的金矿不为人所知了。



墨西哥作家安赫莱斯·玛斯特尔塔，迄今在中国出过两部小说，除了这本正将谈论的《普埃布拉情歌》，还有一本《大眼睛的女人》（詹玲译，南海出版公司，2010年9月）。玛斯特尔塔虽贵为“拉美文学新一代领军人物”，并且1975年出版第一本诗集《色彩斑斓的鸟》后就作品不断，但在我们这里一直没有被合理地介绍过。中国出版界和评论界对其有着难以理解的冷漠，除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曾出版过一次《大眼睛的女人》的同一种译本外，没再见过她的其他资料。《拉丁美洲小说史》（朱景冬、孙成敖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600多页、仅20世纪下半期小说一章就介绍了近40位作家，也是对玛斯特尔塔只字未提啊。这难道真是拉丁美洲过于神奇，牛逼哄哄的作家太多，以至于专业的学者们都关注不及了？

几年前看过智利作家伊莎贝尔·阿连德的作品，这位被称作“穿裙子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我看来，作品色彩是足够斑斓了，也有精心设计的魔幻圈套，但这一切跟玛斯特尔塔比起来少了必要的灵魂。你能看出来模仿，却看不出来内心的渴求。如果还不够鲜明，那我就得放弃客观地说，玛斯特尔塔是阿连德的十倍，是马尔克斯的一半——十倍什么，一半什么，你说什么都行，反正我没说，你挑不出我的漏洞。

美国的《出版家周刊》对玛斯特尔塔评价说：“每一页都充满画面感，将神秘的拉美大地上男人与女人的故事融合于乱世的剪影之中。”这不是正是对《霍乱时期的爱情》这样伟大小说的评论吗？只不过玛斯特尔塔少了一些男人式的野心，或者说她将野心更多地放在书写个人情感史上，谁说个人的历史就不能是史诗了呢？在宏大、崔巍、浩瀚这些形容逐渐堕落成庸俗化的空洞作品代名词时，如果我们用之来形容个人的历史、片段的情感，我倒是觉得这些词儿还不错。

普埃布拉，墨西哥中东部的一座古城，在历史上经历过殖民、战乱、地震等各种灾难。作为一名女作家，安赫莱斯·玛斯特尔塔没多少兴趣去关注那些宏大的历史，或者人类文明的颓败，你知道一名女作家，她可能更感性。《普埃布拉情歌》写的是一座山峰般高大的女人的一生，她的情感生活，儿女情长，爱恨情仇，宏大的历史只能作为背景出现在小说中。

小说主人公在一个随时都会把反对者拉出去枪决、为了一栋房子就搞暗杀的社会环境里，但她心里想的、眼睛看的全是自己的爱欲，虽然没有张爱玲写香港沦陷时的那些惊世骇俗的句子出来，但也能看得出来，那么多鲜血、那么浩大的社会动荡以及关乎群体生命的一场场劫难，都只不过是她情感地图上的一个个坐标。玛斯特尔塔甚至连所谓的故事背景都懒得交代了。通过个人感情生活的起伏去控诉殖民和战乱？千万别给玛斯特尔塔戴上这些莫须有的帽子，她只在乎自己的情感，那种个体生命的微小动荡，并不比改变人类命运的历史事件可怜，它们存在于个人的剧本或者个人历史的场景中，于你可能是可有可无，但于每一个经历者来说，它就是全部。

安赫莱斯·玛斯特尔塔写的是将军夫人的一生，从“卡特丽娜”十五岁嫁给将军，陪伴着将军暗杀对手、竞选总统的戎马生涯一生，随着将军地位没落死于抑郁寡欢，她的时间也结束了。她每天经营着自己的情感生活，家庭族谱徐徐展开，有将军的情人，也有将军在外面生下的孩子，自己和将军生的一对儿女，还有用来述说心事的闺蜜，当然还包括她的两个情人，等等，这些人物成了小说的主体。至于胖子总统、其他将军、幕僚都成了一桩桩建筑，是这些有血有肉人物身旁的呆板建筑而已。就人物而言，那些达官贵人完全不如司机“胡安”立体生动。这中间，她和将军发生了许多浪漫故事，比如周末去看斗牛比赛，他们生了两个孩子，并一同抚养了将军在外面的几个私生子，有的跟她同龄，相处得过分的融洽，她陪伴将军走南闯北，撒娇、任性、古怪，浪漫而多情，在将军竞选总统或者需要她张罗场面的事情上，她又变成一把体面的交际好手，但读者都知道，这其中的内心波澜和纠结曾经有多么深重。在于将军的婚姻中，“卡特丽娜”有过两个情人，都是在将军眼皮底下发生的，她疯狂的爱，没想过太多生死，只顾一头扑上去。

说实话，“卡特丽娜”的遭遇让人想到了那句老掉牙的话——性格决定命运。“卡特丽娜”性格古怪，从她十五岁嫁给一见钟情的将军开始，她的人生就像一出魔幻神奇的剧本，她用自己古怪的逻辑和坚定的观念来判断和理解一切突如其来的事情。不难想象，这个人总会让人联想到马尔克斯《百年孤独》里的某个小姑娘。美丽没有过于实际的描写，但读者肯定能发现这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女人，还有一个指挥家情人“卡洛斯”眼里的“浑圆的屁股”，“卡特丽娜”既可以摆出州第一夫人的雍容华贵，也可以像小女孩一样跟她的男人撒娇，在丈夫将军“安德烈斯”的眼里她始终是一个“还有很多男人想和她上床”的女人。

伴随着将军的轰然倒掉，“卡特丽娜”的生命虽还有呼吸，但已经结束了。她出乎常人地去送葬，“终于，我哭得比孩子们还凶，这是寡妇应该做的”，自己颠簸起伏的命运走到了终点。墨西哥本土对作家的评价是：“玛斯特尔塔笔下的女性有一个共同点：她们都能在大大小小的不幸中生存下来，靠天赋的幽默感在日常生活中披荆斩棘。”主人公“卡特丽娜”所遇到和选择的生命完全没有历史轨迹可循，她没有机会去从前人那些学到什么，只能凭着生命的本性去经历。如果要给这个人物再多一点读后感上的定义，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白羊座的女人。

读《普埃布拉情歌》时，有时候会觉得作者玛斯特尔塔本人就是一个任性的小女孩，她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从来不在乎世上已有的那些约定俗成，然后会突然给你一句让人汗毛倒竖的句子，比如——“可怜的孩子，”他摸着我的脑袋说，“你会幸福的，你会遇到一个中意的男朋友的。”“你就是我的男朋友。”我吸吸鼻子，站起来吻他。——这是父女之间的一段对话，并且是在女儿结婚很多年后遇到点委屈回家之后说的。

说到父女感情，“卡特丽娜”无比爱她的爸爸，关键时刻她总是会想起他，可是在父亲的死，玛斯特尔塔只用了一百多个字，“她”淡然地说——“我不想谈爸爸的死。我想，所有人都认为他的离去是对我们的背叛……”如此淡化处理父亲的死，我以为是小说写到这里最佳手段，放在“卡特丽娜”的性格中，无比恰当。

对比书中几段描写“卡特丽娜”生命中男人的死，也是非常有趣的事情。除了轻描淡写父亲的死，还有化悲恸于无形的情人的死，最迷人的当然是将军的死。在权利斗争中败下来的将军，生命末年留下无比残败的身影。哀嚎、暴躁，又无可奈何。“我怎么会想死？我不想死，可我正在死，你没看见吗？”玛斯特尔塔用一个句子就将自己的描写与那些文学中经典的死亡场景并列在一起。

玛斯特尔塔在小说中至少还贡献了一场经典的情感悖论——丈夫放任自己心爱的妻子与别人偷情。他坚定地以为妻子所做的一切都是忠实自己的。一切，不管她做什么。如果说在约翰·欧文的《盖普眼中的世界》中，丈夫与偷情的妻子一同疗伤的情节是两性关系在自然逻辑下的必然选择的话（妻子意外的婚外恋让他们两个人都很难受，但两人谁也离不开谁，要忘记和度过这段痛苦的事件，所以两人都需要疗伤），那么将军对“卡特丽娜”的爱就那么无私吗？“卡特丽娜”与将军的爱，

少了独享、占有这种爱情中约定俗成的元素，还能称之为爱情吗？

【墨西哥】安赫莱斯·玛斯特尔塔：《普埃布拉情歌》，李静译，南海出版社，2010年9月，25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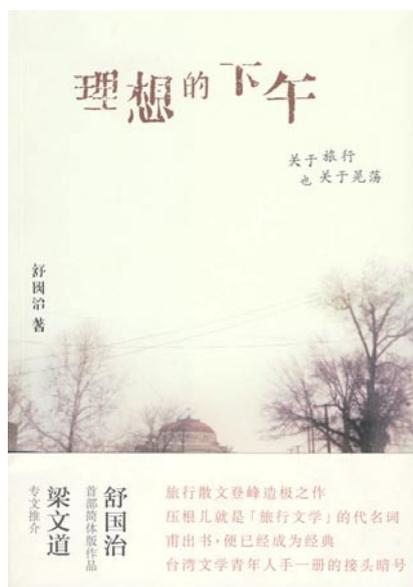
## BOOKREVIEW 书评

### “只得萧简一字”

特约撰稿人 戴新伟（广州，[pessoa1935@gmail.com](mailto:pessoa1935@gmail.com)）

舒国治系导演李安的同学，年轻时壮游美国，写的文章率多关乎旅行，按理应该早早觅一部台湾版一读为快才是。只因为先入为主听说“做作”，“不好”。等到今年年初读引进大陆的第一本，“关于旅行也关于晃荡”的《理想的下午》，读到诸如“乃我自儿时至青年无数次亲近它之后的感受便是如此”，“然在随时可见的下午却未必见得着太多正在享用的人”，又如《早春涂鸦》、《旅夜书怀》这样古奥的文章题目，确实有如置身山野，到处磕磕碰碰。这样的境况在舒国治文中堪称层出不穷。你要想来个时下所谓的“悦读”恐怕够呛。不过，假如存心要读舒国治，这些佶屈聱牙布置出来的荒山野岭，你就不得不放慢脚步，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过去。快读基本上是不可能的。而慢读舒国治则可以扭转先入为主的看法：确实做作，但……

关于舒国治其人其文的微言大义，梁文道写的导读《但少闲人》庶几胜任，只是读者未必要那么形而上的东西——如果慢慢走完舒氏山野，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位与现代人生活方式迥异的人，绝非有意识要做领头羊，去引领一股子新生活的潮流。他没有电视机不看电视，但并非要读者向他看齐。文字里的山山水水吃吃喝喝都是求个自在，那是他选择的。正如他这样不工作、四处晃荡，饱看山水，身心俱畅，然而未必说今晚读了他的书，明天就要一大早去冲老板挥挥手，做个自由人。这不是不用脑的电视广告，这是生活。舒氏文章透露的，正是芸芸众生尽管拣自己满意的生活方式生活，如此而已。



《理想的下午》写到在国外的旅行，也有在大陆的游记，新一本《流浪集：也及走路、喝茶与睡觉》篇章更多，同样有在美国打工的纪录，也有在江南吃烧饼、在山东淘旧书的故事，还有进入城市，对台北的观察，如《台湾人的包包》、《台北女子之不嫁》。应该说，远远谈不上要断绝与文明社会的关系，只不过行事多少显得独特罢了。以游记而论，同是中国人，舒国治对牛津的描写，就与“哑行者”蒋彝不同（《推理读者的牛津一瞥》）。蒋彝写到牛津的墙——与友人聊天太晚，只好半夜翻墙，舒国治则说，牛津的墙将沉静分割。从写法上看，蒋彝的文字多少有些英伦随笔的味道，而舒国治则是一如他所谓“英国的全境，只得萧简一字”，也是“只得萧简一字”。同文引用旅行作家 Jan Morris 1965 年出版的《牛津》说，“牛津这城市，那儿总是有太多钟声在雨中敲得当当响”，他连此公的名字也翻译成奇崛的“鹤·莫里斯”。

《理想的下午》与《流浪集》如果单纯视之为游记，那么舒国治确实是一位异常优秀的旅行作家，盖因他所开辟的线路就与他人不同。如桂林郊外的景色，他认为“压根就是宋画里的桂林郊外”，这样别致又一把抓住重点的图说，让人立刻起兴欲作桂林游。但他游记写作最值得一记的，我以为应该是《旅行指南的写法》、《再谈旅行指南》，最绝的是《一千字的永康街指南》，为一条街写一篇小型指南，实用，简单，且让人受用，即使是我这样热衷读旅行指南的人（可以读“孤星”读

得津津有味)也深表赞同。表面看来,这是资深老驴友力矫当今太厚太多太面面俱到旅行指南的用意,而实质上看,未尝不是一种新鲜的游记写作理念。假设一下,如果你要为别人介绍你自己居住已久的某条街,自然对这条街就有了另外一副视角——决不同于每天单调重复的路线和邻居。在这个到处充满了简单粗暴、千篇一律建筑的年代,在每个城市的逐渐变为同一个城市的年代,往大一点说,这未尝不是一种深具人文气质的写法。

巧的是,舒国治深以为赞赏的,就有一九二三年徐珂编的《西湖游览指南》,一九二九年陆费执原辑、舒新城重编的《实地步行杭州西湖游览指南》,以及一九二五年陆璇卿编的《虎邱山小志》等等。

可以看出,之所以舒国治推崇这样别致的写法,实在是出于流行的旅行指南太庸常太产业化之故。这跟舒氏生活方式(姑且这样称呼)与现代社会生活方式的不同何其相似。记得近十年前,乔纳森兄在《万象》杂志谈旅行与旅游的区别,观点新颖令人耳目一新,然则在舒国治这里,感觉他是能把旅游过成旅行的那种人,因为他那些与众不同的巧思与经历。这些细节是读舒国治的乐趣。读完他的两本书,回过头来说他的做作,他的书确实不是“幽闲小品”,哪怕可以悠闲地看(即时下所谓“悦读”)。我留意到,这两本书里的文章,近十年写的居多,早期也有。这种自由散漫、自成一格的文字能够发表出来,则台湾的纸媒就并非人文理想没落了——而这是近几年来常常听到的论调,其中不少还是业内人士断言。作为同行,不免多少有狐悲之感。现在读到这种做作的自由,则不免要狐悲于自己周遭充满太多现实问题的论说了,现实反而越来越单调空洞。假设一下,换个化名,舒国治的这些文章还能发出来吗?这似乎可以拿来考量一种文化生态。虽然舒国治文中甚多“佳美”,但他的文风却与坊间所见的台湾文学有所不同,没有散文家那种或甜美或惆怅的文学腔调;他让读者磕巴的文句不仅赞美吃喝还赞美拉撒这样粗俗的东西,大概就此抵消了抒情的味道,这与台湾近些年来服膺西方各种主义、主题先行的炫技派小说写作也不一样。舒国治的散文——既然是游记,不妨用山水来比拟,弄文字的人都期望与别人写得不一样,舒国治正是设计了一条“独特的线路”,才使得山山水水有别于他家。他有意识的少、不通顺、奇崛、萧简。像这样具有文体自觉的作家很少,然而成功的也很少。

顺便说一句,读舒国治是年初在一个山沟的一夜两天读完的,虽然做作一说已经产生了效果,无奈手边只有舒国治,只好磕磕碰碰读下去,真是牙帮子都崩坏了。那天晚上在山沟里闲逛,居然也遇上了一大群狗——如果你读过舒国治《早上五点》写到的在台北遇狗,自然明白我的心情。要学他那样放情山水,实在没有勇气,然则自己所经历过一些细节,确实有别致的细节,恐怕每个人都是如此吧?

舒国治:《理想的下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27元;

《流浪集:也及走路、喝茶与睡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26元。

图1为舒国治

## ESSAY 随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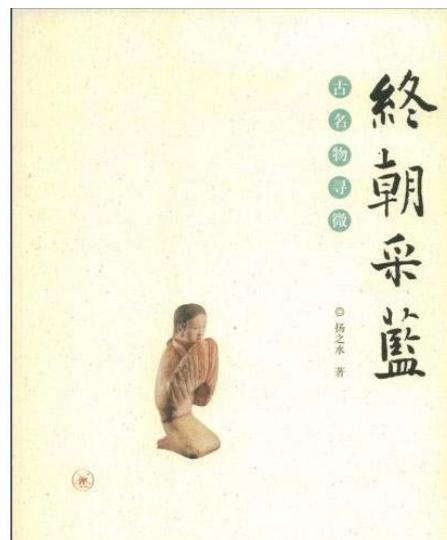
### 古色何以今香

特约撰稿人 戴新伟 (广州, [pessoa1935@gmail.com](mailto:pessoa1935@gmail.com))

(一)

读扬之水,纯属偶然。

今年初夏在北京国子监街一家小店随缘得到两串菩提子念珠,因造型过去未见,颇有兴趣了解。偶然拿起《终朝采蓝·古名物寻微》,正好翻到二二四页讲念珠:手串和朝珠的来源都是数珠或曰念珠,而数珠和念珠本是梵语“钵塞莫”的意译,即为记数诵经或念诵佛名的遍数而用。此外尚有“摄心”之效,即为修善业者祛除杂念,用心专一。又说到念珠一串的数目一般有九种说:即一千八十、一百零八、五十四、四十二、二十七、二十一、十四,又有古来念佛宗袭用的三十六珠与禅宗所用十八珠两种,总为九种。而最常用到的数目,是一百零八颗和十八颗。(页二二二至二二六)读此自然立刻数了手上的念珠数目。这篇《十八



子》似正好为我解惑，也因为此文通读了《终朝采蓝》，领略到无数胜景。开篇长文《唐宋时代的床和桌》，论述古代中国人从床向桌子这一坐具的转变，这是一个常见的主题，记得香港的赵广超先生也写过，他采用的是图文漫画式，令人一目了然，亦甚有趣（参见《国家艺术：一章木椅》，三联书店，2008年5月）。不过，扬之水的文字有别于如此凝结在一个主题上，从这篇考证不仅可以看出贯穿了《终朝采蓝》与后面要谈到的《奢华之色》的以图、诗文证史的研究方法，还可以看出她是如何从这些不同的载体松散地集合一个主题，逐渐地让读者体味到床与桌的在唐宋的时代气质，因此材料虽多，反而令人有胜义披纷之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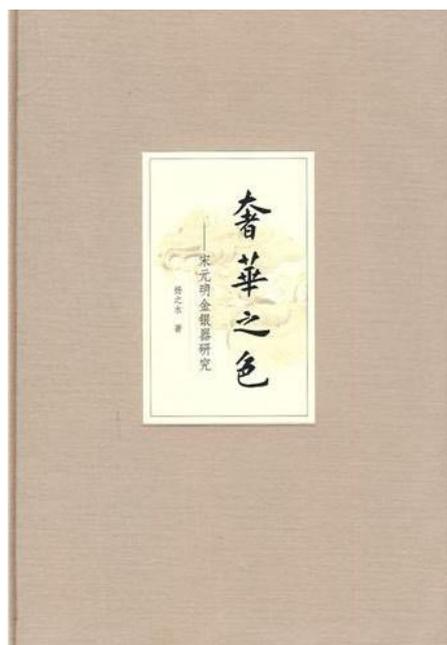
简单说来，名物考证，有一条从古到今的线索，对此物最普遍的认知（往往是粗浅的，甚至是麻木的），仅仅是这条线索上的一点，考证即是向读者讲述位于这个点上的名物是如何从条线索上走来，它的起源、定义，最初的功能，又将如何逐步被改变地走下去。同时，它在每个不同的点（姑且以“不同时代的不同名称”来指代），跟时代风气、人物影响之间的相互作用，因之构成的小变化，佐以文献、实物的考察，脉络是清晰的，读者读起来仿佛听故事，看风景，主线不歪，点面不乱，自然好听好看。前述念珠即是从念珠的起源、作用以及从宗教功能逐步演化普及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来讲述的，《宋代花瓶》同样如此。当然，有很多名物事实上是古名物，早与我们目下的生活失去了联系，如茶角、砚山、纸被纸衣、行障与挂轴等，但像笔筒、摺叠扇、剔牙仗等，依然算今天的事物，读起来和手腕上的念珠一样让人有兴味。前些时候在电视上看到燃沉香木（屑）是目下的一大时兴，想来香炉还算日用品，如书中提到在福建看到的竹火笼，幼年冬天经常见老人人手一个，置于长衫前襟之下（前襟俗语“布前”），竹火笼里放灶中烧过的木头，蜀语为“呼炭儿”，竹火笼则称之为“火提子”。蜀中冬天，室内外气温相差不大，火提子是“暖老温贫”之具。前不久似在清代某入蜀为官者的笔记里也看到记载此物，现在应该和福建一样在乡下可以见到，惟蜀中之制，略近台北《香薰香炉暖炉》所载图样（页二零四）。

《终朝采蓝》二十篇“古名物寻微”，综合起来，是过去雅人的生活场景，它不是竹火笼那样下里巴人的东西，这是肯定的，它所组织起来的况味与格调，也非今时社会所有的。有趣的是，因为这个一个清雅的主题之下，花瓶、念珠、茶角等篇章所引用的古人诗文，都别具它们单独存在的风姿，像《十八子》中提到的白居易、皮日休、陆龟蒙等人的禅诗，都是以前从未读到的，这些诗在此书中可以说获得了一个比在它们自己诗文集里更深入的被认知机会。第二十一篇《一花一世界》，“约二分之一的篇幅是文物出版社《大圣遗音》中明清部分的图版说明”（见后记），针对每一件物品，写上大约二三百字的小随笔，共五十六篇，从介绍、描述道评价，短短三百字写的一目了然，灵动异常，洵为大手笔。看作者后记的意思，似乎有写《名物辞典》的意思，不能说不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

## （二）

读《终朝采蓝》是偶然，读《奢华之色》则顺其自然。

《终朝采蓝》最后一辑《一花一世界》收录的五十五篇名物小记，二十五、二十六是明代的耳饰，扬之水在这两篇小记中证以图片，清晰地介绍了耳环与耳坠的区别。在新出的《奢华之色》里，《奢华之色》的副题是“宋元明金银器研究”，卷一为“宋元金银首饰”，卷二为“明代金银首饰”，卷三为“宋元明金银器皿”，刚出第一卷，自然首饰是其中大宗，其他如钗、簪、步摇、梳背、耳环等等，蔚为大观。比起《终朝采蓝》里的二三百字，这本书对于每种名物的探寻，要深入得多，对作者而言，也要困难一些。如导言所说，金银首饰对于过去中国人来说，在收藏和考古系统都占较次地位，加之出土实物较少，处于金银器研究的薄弱环节。进行此项研究，也是因作者与湖南省博物馆的合作课题《湖南宋元窖藏金银器发现与研究》，亲见大量的出土实物。读完本书，宋元妇女的头饰差不多形象地展现在读者眼前。



与《终朝采蓝》的名物记不同，《奢华之色》固定在金银器这一大主题之下，以卷一而论，是从宋元时期的各种金银器形状、特点（第一章），来总结这些饰物的“纹样设计与制作工艺”（第二章）。相比念珠、花瓶、茶角、砚山、纸被纸衣、行障与挂轴等事物，金银首饰更能显示过去的时代风尚，因为它在每个时代都是跟时尚息息相关，“不仅是财富与艺术的合一，也因为它所具有的展示性而

成为生活时尚不可忽略的一个风向标”（见本书导言）。不过，我觉得最有意思的，还在于这本书谈论的虽然都是古代器物，

然而与今天的生活紧紧相连——金银首饰并不像茶角、纸被纸衣、行障与挂轴已经成为古物，相反依旧是女人的必需品，是时尚潮流的重要展示品，几乎每个家庭都不可缺。而现代人正好清晰又亲切地了解到对自己如此熟悉的饰物从何而来，耳边这件饰品是如何衔接古今的。

除了衔接现在的这一大特点之外，对饰物图案造型的研究也颇有趣。简单的说，耳环是如何打造出来的？最初的设计是参照了什么？又如何定型，成为一种模式，一如我们现代人习见的样式？本书附论《“掬水月在手：从诗歌到图画”》是一篇绝好的解答，文章从一位不太出名的唐诗人于良史的《春山夜月》却很出名的颌联“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入手，考察它自唐以后屡屡出现的诗歌意象，从宋元人的诗词化用，广为流传，到以书法、图画的形式应用到瓷器、金银器上，并且逐渐形成一种样式，在制作者和受众那里都得到了普遍的认可。这是过程漫长但含义丰富的解读样式“典故”的考证，是对此书第二章“纹样设计与制作工艺”一个绝好的补充。“掬水月在手”这个典故往返解读，就可领会到饰物上的花纹——满池娇饰纹、二龙戏珠纹等，造型——飞天、狮子、摩羯等等，均是在各个时代风气的影响之下产生，逐步形成“式样”的，又同时能显现出各个时代的特征。

### (三)

对普通读者来说，遗憾的是没有功力、眼光发现此书与其他好的相关研究书籍之间的异同，包括它们的研究方法、结论等等，因此读后只能弥补知识缺陷。但这种阅读应该是与收藏热无关——无论是《终朝采蓝》还是《奢华之色》，主观目的并不是呼应这个伟大的“世纪收藏”热。它们不能为你在古玩市场“掌眼”。你可以从学术的角度把这些书与收藏类的书区隔开来，书里也没有动人心魄的寻宝故事，甚至不能教你识别高仿品，但是通过各种器物、典籍所收集起来的名物概念，却非常形象地组成了古代中国人文雅生活的场景。作为现代人无法、也没有必要去复制这样一套生活场景，既是生活模式的不同，也因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主题。但由日常生活提升出来的美感与品位是一致的，对庸俗的丑恶的反感也是一致的。了解自己过去的文化内涵与特点，并不是避免出丑——类似于不要成为“鉴宝”节目上拿着“妖孽”的藏家，而是明白那些出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东西（家具、首饰、各类的饰物）它们是如何来到这个时代的，又该如何合理地看待它们和使用它们。古代的物件之所以强烈地引起一个普通人的好奇心，你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它所代表的财富，然而推而广之，这笔财富恰恰跟我们自己的文化挂上了钩——它代表了时间的沉淀，代表了我们所不知道的过去，包括先我们而生的人，是如何生活的等等。我们对自身的好奇心可能就依附在这些过去的事物身上，而往往又被财富观念简单地蒙蔽了。

我记得当时在潘家园走了一下午，心中亦有念想，但分文不敢花。令人惊叹的不仅仅是念珠，还在于每个雷同而又高科技含量的摊位所呈现出来的当今社会之整体审美和品位。反倒是在国子监街的小店里，既无预期又无比照，买到了缘份之物。然则这串念珠，就真的比潘家园的更好？在“地球村”的目下，你完全可以在任何一个城市买到这件饰物，这是无可疑义的。不过，读收藏类的书，固然可以增进知识，有助于自己的辨别力，但是对于品位与格调的训练，却需要《终朝采蓝》、《奢华之色》这样的“无用之书”。对于真正好的事物的表达，可以理解为揄扬，也可以理解为对对立面的泾渭分明的批判，相比过去的时代，眼下更缺乏这样的对立。这也是为何让专家都哭笑不得的“妖孽”为何如此众多的原因之一。好在有这些“无用之书”，让人有一份闲心来反观自己所处的时代，这些琐碎的事物们，究竟会在这个时代里如何安身立命？古色如何今香？正因为你站在了各个流动的“古色”之上，才能改变自己的观念和观察方法，去看待它们在今天的位置；才会冷眼旁观，对整个的社会风气与精神面貌有所警惕，摸索出品格与时风之间微妙的比例。

读书或许亦然。扬之水老师在读书界的口碑自无话说，作为编辑行当的前辈，成功转型到学术界亦足以令我等后辈眼热。因此，她的著作也“从众”买了不少，似乎除了《楹栳楼读书记》均有收藏，且几次搬家，均置于常用书书架上（因此才会偶然翻读有关念珠的文章），《终朝采蓝》确系我第一本完整阅读的书。既感惭愧，又深觉读书的缘份：你不知道与一本书何时相遇，有这样偶然的开端，似乎才能打开一个相对集中的主题。读《终朝采蓝》，能够把握整本书，对作者的研究方法、文章布局、语言风格，均有清晰的了解，对书中透露的品位和论述不仅认同，而且对自己有极大的丰富和提高。回顾近年读到的在收藏热之下的几种古代名物书籍，皆不免小趣味，语言与论证都缺乏克制和约束（比之此书，或是学术训练的差异？），仅仅堆砌材料，不见独到见解。何况文字芜杂，令人不欲卒读（不排除是读者的好恶；我最近又去书店找了“几种古代名物书籍”再读，唯恐当日读得不对头，导致走宝。但还是难改旧观）。简言之，不如在《终朝采蓝》一书得到的多。读此书，颇觉作者甚少功利心，因此读者也不免放松。你是没法拿着此书到潘家园的。它所讲述的整体氛围，是与今天人的生活非常远的，无论研究也罢，传承也罢，它都是非常小的一块，并且与我们当今的时代具有强烈的隔绝性，但正是这种隔绝性让我们得以反观自我。

扬之水:《终朝采蓝:古名物寻微》,三联书店,2008年11月,65元;

《奢华之色:宋元明金银器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4月,96元。

## ESSAY 随笔

# 制度建设与国人素质

特约撰稿人 严飞(美国·旧金山 [fei.yan@green.oxon.org](mailto:fei.yan@green.oxon.org))

国人素质低,连带着中国人的劣根性,都因着上海世博会而被媒体挖掘出来,曝露在聚光灯之下。随地乱丢垃圾、翻越护栏插队、假扮残疾人走绿色通道、液晶电视上的U盘以及3D眼镜屡次被偷、德国馆门前高喊“纳粹、纳粹”……凡此种缺乏文明和基本修养的行为,无不让人惊愕,继而反思,为什么一场旨在提升国家形象和民族崛起的盛会,反却演变成了一个受人诟病的道德洼地?

难道仅仅只是国人素质低吗?未必见得。这次暑假,我利用短期回国的机会,也去参观了一次世博,并且还为了体验排队的苦趣,专门挑了沙特馆排队。这其中,有两件事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第一就是在很多地铁站里的自动扶梯,绝大多数乘客们都会很自觉的站立在右侧,将左侧的通道让给有急事的人先行。以前在香港工作的时候,搭乘自动扶梯左行右立早已内化为每日生活中必须遵守的一项行为规范,以至于有段时间每次回到内地,看见乘客拥挤自动扶梯的场景时都会皱眉。两相比较,上海今年的进步无疑是非常明显的。第二件事情发生在沙特馆排队的时候。排队的过程中秩序井然,虽然等候的时间十分漫长,但天南海北的游客聚集在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也有说有笑的互相攀谈起来,甚是其乐融融。可惜天有不测风云,排到一半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台风雨。原本遮阳用的棚子完全抵达不住凶猛的暴雨侵袭,不少低洼一点的地方,地上的积水已经没过了小腿,游客们只能选择站在护栏边的长椅上。这个时候整个排队的秩序开始混乱和骚动起来,刚才还相谈甚欢的游客们都开始争先恐后的翻越护栏,以期能避开有积水的地方,早点入馆躲避风雨,而原本维持秩序的安保人员和武警这个时候似乎也完全找不到踪迹了。混乱中,我就看到3名金发的老外,依仗着自己人高马大,一连跨过五道护栏,冲在了不遵守排队规则的最前面。

对国人低素质与劣根性的批评,世博之前就不绝于耳,想来世博之后,也不会因此而停止。但对此问题的所有探讨,都止步于就着单一现象的简单评析,而模糊了问题背后的本源。如果说指责国人低素质是因为长期以来礼仪的缺失和教育的失败,那为什么一方面我们看到人们可以开始逐步将日常生活中诸如“搭乘自动扶梯左行右立”这种最基本的行为规范付诸行动,而在另一方面却又可以肆意地打破业已建立好的排队规则?如果说中国人的低素质让世博蒙羞,可为什么最先打破排队规则,翻越护栏冲在最前面的却是几名西方游客呢?真的是中国人素质低而西方人素质高吗?

素质到底从何而来?素质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是一个需要好的制度去约束、规范人们的行为,进而通过人与人互动中的示范效应,将其内化的过程。就好比有序搭乘自动扶梯一样,制度并不只是提供出一个激励机制以改变人们的行为动因,长期来看还改变了人的素质,这一改变就是内化。当引入一种合理的机制后,就可以做到有效规范人们的行为,引导人们做有利于整个社会合理运行的事。

旅美作家林达在《总统是靠不住的》一书中,提出了“总统是靠不住的”这样的论点。因为人性犹如洪水,作为个体的人,他功利、自私、利己、享乐,在诱惑面前难以把持,常常会侵害旁人的利益以保证自己的私利,特别是当这个人占据了一个国家最有权势的职位的时候,更要徇私枉法了。正如曾撰写了“联邦论文集”的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所言那般:“我们应该假设每一个人都是会拆烂污的无赖,他所做的每一个行为,除了私利以外,便别无其他目的。”所以总统是靠不住的。

那么如何制约“靠不住的总统”呢?这里,林达巧妙的用了“一个收银机的故事”,揭示出了美国宪政制度的奥秘。当店员有小偷小摸的冲动想要打开现金抽屉公饱私囊之时,那么,就设计出收银机这样的机器,迫使雇员按照规矩如实地记录下每一笔交易。如果违反监管的规矩,那么现金抽屉即便想打也打不开。既然人是靠不住的,那就“必须用一种机制去筛选不可靠的人,同时用这种机制去限制和规范人的不可靠的行为。”正是在很多诸如“收银机”这样的制度制约之下,人们内心中

的“幽暗面”才受到限制，不再肆虐为害，而人们自私自利的行为也可以互相牵制，互相抵消，社会的公共利益也因此得以保全。

类似的，经济学家梁小民也曾在一篇题为《制度比人性和政府更重要》的小文中，用18世纪英国政府如何解决罪奴运输过程中高死亡率的案例，说明了制度的重要性。1770年，英国政府宣布澳洲为它的殖民领地，并开始将判了刑的罪犯一批批地输送到澳洲。运送罪犯的工作由英国私人船主承包，运费是按上船的人头结算。由于船上拥挤不堪，营养与卫生条件极差，结果导致罪犯在航程途中平均死亡率达到12%，单船的最大死亡率达到37%。当时英国到澳大利亚的罪犯运输之路几乎成了一条“蓝色死亡之路”。那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一是进行道德的说教，寄希望于人性之善。二则是政府干预，以法律条文的手段促使私人船主改善船上的卫生条件。但事实上，当时既没有出现乞求船主大发慈悲的一幕，英国政府也没有制定相关的法律规定，而只是改变了运送罪犯的结算制度：政府不按上船时运送的罪犯人数付费，而是按下船时实际到达澳洲的罪犯人数付费。新制度由此显现出了强大的动力，运往澳洲罪犯的死亡率下降到1%。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改变船主的贪婪、利己、趋利，而罪犯死亡率却得以大幅下降，这正是得益于制度的巨大力量。

回到世博会中种种不文明的行为上，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一问题的出现并不应该仅仅怪责于国人的素质低，亦或是检讨政府对于文明礼仪的宣传力度不够深入，而是应该去反思我们在制度建设上的缺失。一个可以观察到的世博会中制度建设的例子，就是如何有效的规范人们不要乱扔垃圾。一个长队排下来后，我们常常看到排队等候区域的地上一片狼藉，同时整个园区内也时常可以看见人们随手乱扔垃圾，亦或者是一个垃圾筒四周堆满了很多垃圾，这就说明园区内垃圾桶的数目不够，工作人员清理垃圾筒的速度跟不上游客扔垃圾的需求。但是当组织者在排队的地方每隔几步放置一个大垃圾袋后，地上就明显干净了许多。这里，放置垃圾袋前后排队的人群参数基本没有发生变化，人们原本所拥有的素质也没有发生变化，唯一的变量就是制度。制度存在的目的，正是在于通过对社会主体的行为施以规范，在必要的时候做出惩罚，以维护秩序，实现社会的善治。同时，一个好的制度也会公正地调节利益相关者的权益纠纷，化解社会矛盾。这种约束、监督和控制的机制，倡导的是人性中的积极面，并疏导人性中的消极幽暗面。

同理类推，当台风雨过来的时候，组织者并未有提前做好相应的预警措施，免费雨衣几无准备，遮雨棚的设计并没有考虑到防避大风雨的情况，而对于园区内排水系统的最大泄流量也预估不足，以至于出现极端混乱的场面，也就不足为奇了。

大国的崛起，诚然如龙应台所言，乃是根源于文明的崛起。而文明的崛起，也不应该仅仅只是寄望于“生活在其间的公民自主地改造生活”。很多评论都在说，政府要从思想教育和文明宣传的角度着手，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加深公民的思想道德学习，从而以期人们出现思想觉悟上的“内在”变化，自觉地提升个人素养。但是单一的说教并不能改变人性，只能用一套良好的制度去筛选与引导。所以若想每位公民“生活得更加从容、克制、理性而有尊严”，若想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首先必须改善的，是其所依存的制度。制度之善的背后是公平和正义，因此可以抑制人性之恶，保护、激励并发展人性之善。只有建立一套把自私自利的行为转变为有利于社会的制度，通过制度的规范疏导，才可以从根本上提升公民素质，以及一个国家的整体形象。

## ART 艺术

### 当宪法也成为艺术

吴强（北京，[qiangwu.de@googlemail.com](mailto:qiangwu.de@googlemail.com)）

一个周末，北京草场地100号文件仓库，一场主题名为“身边人·身边事”的四人艺术展开幕。除去拆迁、维权、暴力这些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题材，艺术家金锋的作品《招牌》分外引人注目，几十面常见的机关招牌被代之以宪法的各项条款，关于人民权利的文本变为挂在墙上的装饰，耐人寻味。

当宪法文本也成为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进入到“身边人·身边事”的生活世界中，不知道这算宪法之幸还是相反？至少，有一点是确定的，中国当代艺术正在进入我们的生活空间，不再是意识形态的诠释者，或者西方画廊的禁脔，或者博物馆的收藏。只是，这一真正贴近生活的艺术不是以她的装饰之美或者收藏价值打动人们，看看23日下午开幕式上络绎不绝的普通观众，就知道《招牌》的魅力，如同上亿颗手工打造的陶瓷瓜子，这种生活化的艺术代表着艺术家的表达，代表着人民

的诉求。艺术，不仅有着天然的艺术之美，更因契合时代审美的政治关怀而具有前所未有的政治活力。

这大概就是艺术的本质，审美和人的自由的密切关系，就像 18 世纪欧洲宫廷的人文主义浪潮一样。当宫廷的社交不再围绕着权谋和诡计，开始以审美的方式谈论艺术和文学，人们就开始重新理解自己，也就重新理解了权力。哈贝马斯把这一变



化归诸公共领域的转型的起点，近代艺术也便因此具有了时代的政治烙印，开始引领一场启蒙运动的到来，然后改变了几乎所有人的生活，包括欧洲宫廷的专制政治。

一年前，曾经采访住院中的也是后来的陶瓷瓜子创作者艾未未，不久前他的陶瓷瓜子在伦敦泰特画廊公开展出，吸引了许多国际媒体和当地普通观众的注意。他承认，他并非如外界所想象的那样似乎一夜间变成社会活动家、一个老愤青，而是艺术探索的推进使然，是中国当下形形色色的身边人、身边事、生活世界的去政治化重新唤醒了他在纽约多年艺术生活当中的抗争记忆。艺术，如果没有对生活庸俗化、去政治化的反抗，便没有灵感，徒具形式。通过政治的抽象，艺术空间与生活空间的活力相互贯通，创造出人们对艺术、对政治、对生活的全新理解。

在这意义上，艺术，作为政治的诠释者，便是为我们生活的社会立宪。每一个艺术家、每一幅艺术作品或者装置，都在以特有的审美视角重新定义着生活世界的原则，并且留下巨大的思考空间。

感谢金锋，当我驻足《招牌》作品前，赫然发现“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这些似乎在日常生活已经久违的词句让人热泪盈眶，这不正是我们热爱的国家的一个个基石吗？它们其实也应该被铭刻在所有公共广场和建筑内，在无数件诉讼纠纷中挺身而出被律师和法官传颂，在每天的国旗升降时回响在每个公民的脑海。宪法规定的人民权利和正义不正是任何一个伟大国家应当努力为之奋斗的唯一目标吗？

这或许本应是无数机关单位门面招牌的真正含义，也是保证推进体制改革正确方向的标准，却那么富有审美的愉悦，不能不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见证着艺术家们，无论是行为艺术、装置艺术还是表演艺术，正在引领着一次新的人文主义复兴浪潮，从草场地到泰特涡轮大厅，引领着时代的无数支画笔、键盘、照相机和摄像机，共同创造着一场新的艺术运动，也是我们时代的新的政治。

图为“身边人·身边事”展览现场

## MUSIC 音乐

### 巴赫的儿子们

特约撰稿人 马慧元 (加拿大·温哥华, [huiyuanma@gmail.com](mailto:huiyuanma@gmail.com))



买了这样一本书,《大提琴组曲》,作者西卜林(Eric Sibling)是一位加拿大记者和音乐爱好者。此书讲述巴赫大提琴组曲的发掘、演奏等渊源,主要谈巴赫和大提琴家卡萨尔斯的与此相关的足迹,颇有几分动人。这个家伙以成年爱好者的身份去学大提琴,虽然抱怨“我离学会大无伴奏,还有几光年的距离”,但其处处追索历史蛛丝马迹的细密心思,让我十分敬佩。书中有处史实的小错,如果是别的书,我就懒得理了,但出现在此书中,让我坐卧不宁。想了想,在网上找到作者信息给他发了封短信,他第二天就回复说已在下一版中改正,我才松了口气。

先把作者的音乐见解放在一旁,此书的贡献之一是挖掘了很多关于巴赫的“周边史实”。不要忘记我们谈论经典艺术,总和死亡相关,我们终将翻到艺术家的辞世那一页。他的家庭、后人、遗产、遗作、房屋这些细节,在当时是令人伤心甚至可怖的,就像任何一个死亡在人群中激起的漩涡。今天读来,一切悲伤都已平静,一切命运都已知晓,而艺术家被稀释的生命——他的后人和传统,仍然存在很多悬念。

了解巴赫的人,都躲不开巴赫的忠实学生 Johann Krebs。我们对他的了解不多,但知道因为巴赫的风格在身后不再流行,

害得 Krebs 终生陷于贫困。而巴赫的儿子们,除夭折之外,还有可怜的 Gottfried Heinrich, 巴赫的第二任妻子安娜的长子,据说非常有才能,弹琴很出色(巴赫说 Gottfried 是个“未能发展的天才”),可惜有精神问题,无法独立生活。父亲死后,他和已经结婚的妹妹住在一起。自然,巴赫的手稿被几个音乐家儿子“瓜分”,没有他的份。另一个儿子 Wilhelm Friedemann 则终生感到“名人儿子”的压力,既有强烈的成功愿望又备受现实的折磨,性格不佳,与人不合,最终不得志地死于贫困,就像许许多多饱受挫折的文艺青年一样,不过他确实留下了不少作品。我对他最初的了解,是因为这样一件事:巴赫为了教这个儿子练琴,写作了著名的平均律和管风琴三重奏鸣曲(BWV525-530)。

在俗世上混得最好的是 Johann (John) Christian Bach, 巴赫最小的儿子。他到意大利求发展,改入罗马天主教,后来在伦敦成名(据说他的地位和待遇是当年的巴赫所“只能幻想的”)。巴赫去世的时候他只有 14 岁,但巴赫非常疼爱他,留给了他几卷键盘曲集和其他手稿。在伦敦,他为“皇家剧院”写歌剧,渐渐被当成了“英国作曲家”,和亨德尔相仿。他还和另一位出生于德国的音乐家阿贝尔(Carl Friedrich Abel)结为同盟、好友,联手开系列音乐会,持续了近二十年。他中年之后幸运不再,被人欺诈钱财,健康恶化,46 岁就去世了。

卡尔·伊曼纽尔·巴赫(CPE)是儿子中的另一名人,也是一位传世的作曲家。他曾经比巴赫本人还有名,结交很多贵族、音乐家、文人等等,拥有强大的人脉。他是老爸声誉的坚决捍卫者,也指挥了老爸的很多遗作。不过,弗雷德里希大帝对他并不慷慨,付的钱不多,两人含怨多年。

音乐学家罗森在《巴赫和亨德尔的键盘作品》一文中提到 CPE,说他的键盘作品是大胆、尖锐的,有戏剧性、有动人的瞬间,只是不够圆满(coherent)。当然,创作总是被这两个因素制约:创新和圆满,只有天才外加万般凑巧,才能将两者的比例,混合到足够不朽的程度。罗森说,“他启示了下一代人对戏剧性的敏感,而他的古怪、奇异,为严肃的表达带来了活力,不然的话,音乐险些成为只能表现美丽、天真和戏剧性的东西。”“他的大量键盘作品如果说让人有些失望的话,首先是因为

它们创立并体现了最高的标准；而除此之外，它带给人的完全是欢愉。看上去，他的作品简直有点讽喻意味：这样新鲜、平衡却没有套路（相对于莫扎特和成熟期的海顿而言）的新音乐，和维也纳音乐家们对巴赫、亨德尔的重新发掘（1780年左右），居然只相差几年。此时距巴赫已经有一代的光阴，巴赫的儿子们在此间已经保留、传承了一部分传统。”“CPE的庄严缺少广度，正如他的热情缺少智慧。”罗森和另一学者托维论及CPE的地方零零星星不少，尤其是，经常用海顿和他做比较。在我看来，也许我们可将CPE视为海顿在某些方面（比如交响曲）的先驱。关于在装饰音上的试验，恐怕连莫扎特也没有超过他。今天我们听CPE，要么出于对巴赫的爱屋及乌，要么是对那段充满丰富实验的时代的好奇。其实历史话语权形成的过程，不就如此？音乐作品如果乏人演奏的话，就永远不可能被人认知，所以如今我们无法目击那鲜活的点点滴滴，但至少借了巴赫的光，偶尔能探得音乐形式的“扬弃”。

音乐遗产之外，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尘世中的死亡。巴赫去世后，安娜(Anna Magdalena)守着五个仍然住在家的孩子，生活一下子被击碎。巴赫没留下多少钱，因为钱大半用在开音乐会、买乐器上了。她用巴赫的许多康塔塔换来六个月的生活费，又卖掉《赋格的艺术》的一些复本来换钱。后来，她和三个女儿住到一起，之后的岁月就从历史上消失了。巴赫和前妻所生的儿子，似乎并没有帮助陷于贫苦的她。59岁去世的时候，她的名字列在下葬记录中：“受慈善救济的女人”。

图为 Johann (John) Christian Bach

## FILM 影像

### “清纯”的政治学

观察员 王晓渔（上海，[wangxiaoyu1978@sina.com](mailto:wangxiaoyu1978@sina.com)）

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山楂树之恋》，号称“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不仅干净，关于这部电影，最常见的形容词还有纯真、简单、朴素……张艺谋抱怨清纯的女孩越来越难找，更是引发一片附议之声。



然而，在众多附议声中，小说原著的作者艾米，却成为坚定的异议者，她在博客上对张艺谋持续进行批判。按照常规，张艺谋已经与莱妮·瑞芬斯塔尔并肩，在电影史上占据一席之地，艾米在《山楂树之恋》之前没有什么名声，能够得到张艺谋的青睐不亚于被“钦点”，可是这位作家似乎没有兴趣成为御用导演的御用编剧，大有与张艺谋划清界限的意思。在接受《时代周报》（2010年10月18日）采访时，她表示自己要“尽力指出张艺谋对小说的误读”。

“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这句广告词沿袭小说原著而来，并非作者艾米的意思，而是出版商的行为，仅是一种宣传，不可当真，张艺谋却把广告词的精神贯彻进电影，一丝不苟地寻找起清纯的女孩。记者询问小说作者艾米：“很多讨论都是围绕‘纯’、‘不纯’、‘装纯’这样的概念，作为作者，你认为用这些概念来讨论这本小说有效吗？”艾米回答：“讨论‘纯’‘不纯’‘装纯’的人，不是在讨论这本书，是在讨论张艺谋。至于有没有效，要看你对‘有效’和‘纯’如何定义了。如果‘纯’就是张艺谋理解的‘对世事一无所知’，而‘有效’就是读懂这本书，那当然是无效的。”

为什么小说作者艾米认为无效的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发扬光大？先是出版商，然后是张艺谋，接着是人民群众，都对“清纯”产生了兴趣。当然，读者有“误读”的权利，但是读者们的“误读”为何如此一致，仿佛被统一了思想？

“山楂树之恋”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那个年代的男女关系，在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里，不仅不怎么干净，还有些下流。女医生陈清扬见到男知青王二，让他证明她不是破鞋，可是王二反而和陈清扬发展成“奸夫淫妇”。当地的惯例是“把

一切不是破鞋的人说成破鞋，而对真的破鞋放任自流”，王二的下流行径具有了以毒攻毒的特效，消除了陈清扬的烦恼。

《黄金时代》的文字，以纯真、简单、朴素的标准衡量，称得上低俗、庸俗、媚俗：“我过二十一岁生日那天，打算在晚上引诱陈清扬，因为陈清扬是我的朋友，而且胸部很丰满，腰很细，屁股浑圆。除此之外，她的脖子端正修长，脸也很漂亮。我想和她性交，而且认为她不应该不同意。”为了免去打字的麻烦，我在新浪网上找到这段文字复制粘帖，发现“性交”两字被\*号代替，再接着看看上下文，王小波的小说遍布\*号。

与张艺谋的清纯美学相比，王小波滑到了低俗美学的边缘。电影《山楂树之恋》有没有美化历史，成为争论的焦点。批评者认为“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纯属虚构，或者只是个案，以此批评电影美化历史。辩护者则反复声明剧情源自真人真事，并非孤例，以证明电影忠实于历史。“史无前例”时代的爱情状况，需要研究之后才能得出结论。在看到相关研究成果之前，我基本持中立态度，认为当时的爱情是干净和下流并存，《黄金时代》里的“奸夫淫妇”和《山楂树之恋》里的“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平分秋色。

很多观众看了电影，对那个时代充满缅怀，表示误解了过去，对“史无前例”的时代不能一概否定，不能简单称之为灾难，因为那时还有“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在文艺青年的思维里，“自由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纯情故，生命亦可抛”，悲剧的时代制造了悲情叙事的气氛，恰恰满足了他们自我感动的情感诉求。于是，20世纪70年代在《山楂树之恋》里，成为“贫穷而饱含理想的时光”。

我对电影持批评态度，但并不认为“史无前例”的时代不可能出现“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而是认为，一个时代，即使真的遍布“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也不足以心向往之，只会让人心生恐惧。以“干净”和“下流”来衡量爱情，彰显“干净”、批判“下流”，这个标准本身就值得存疑。身体接触是“干净”还是“下流”？接触到什么程度是“干净”？在电影里，静秋和三三的亲密切接触重在拉手，而在原著中两者的关系不限于此。为了达到“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的效果，张艺谋“净化”了原著。“干净”成了禁欲的代名词，“史上最……”无非是“史无前例”的另一种说法。

### 三

一个在《英雄》里盛赞暴君的导演，怎么缅怀起“干净的爱情故事”？在《英雄》里，秦始皇被塑造成忍辱负重的“先知”，痛心于列国纷争，认为只有统一才能天下太平，这种精神最终感化了刺客。《山楂树之恋》是女高中生静秋和男地质队员老三的纯情故事，纯情到男主角得了文艺电影最为高发的白血病。两部电影的剧情似乎毫无关联，却又有着隐秘的联系。

张艺谋歌颂完善良的暴君，又寻找起清纯的民女，这是精神分裂吗？以民女的视角来看，这当然是精神分裂，民女见到暴君避之惟恐不及（亦不排除投怀送抱者），一个人怎么能既喜欢民女又喜欢暴君？但是以暴君的视角来看，就没有什么矛盾的，民女越清纯，越能唤起暴君的欲望。“山楂树之恋”正是献给“英雄”的礼物，天下一统了，接下来可以玩点“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了。

《英雄》的秦国以法家治国，这一点众所周知。但另一个细节却被忽略，在《山楂树之恋》的纯真年代，京城正在发起一场叫做“批儒崇法”的运动。“崇法”，这是《英雄》和《山楂树之恋》的隐秘联系。这不是说张艺谋具有商鞅、韩非、李斯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而是他以艺术家的敏感捕捉到这层意思，或者说张艺谋的知识结构就来自这种模式。莱妮·瑞芬斯塔尔后来反复辩称：“我只是一个艺术家，不太关心现实，只想留住过去的所有美好。我只忠实于一切美与和谐的事物，或许这样的处理方式是相当德国化的，但这并非出自我的意志，而是源自潜意识。”张艺谋同样可以这样自我解释，只需要将“德国化”换成“中国特色”即可。

### 四

《英雄》的逻辑是天下“定于一”，“定于一”有儒家和法家两个传统。

在《孟子》里，孟子见梁惠王，称天下“定于一”。如何理解这个“一”？孟子以仁政作为“一”的核心精神，明确表示“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但按照公羊学的思路，天下定于“大一统”，这也是后来的主流解释。如果“大一统”和仁政产生冲突，何者优先？在孟子那里，仁政优先。公羊学不否认仁政，也强调“大一统”的合法性，但是，当它成为“儒表法里”之儒，仁政就逐渐作为口号而存在，在实际运转过程中法家成为主导。

在《商君书》里，“壹”是反复出现的关键词。法家的“壹”不是指仁政，主要指农战，即对内重农，对外重军，“故圣人之为国也，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重农，经常被视作君主注重民生，但是在很多时候，这是以“君子之心度君主之腹”。民国学者刘咸沂强调法家和农家的区分：“务地贵粟，古之政要，李悝、商鞅亦与许行、白圭异趣，不得以为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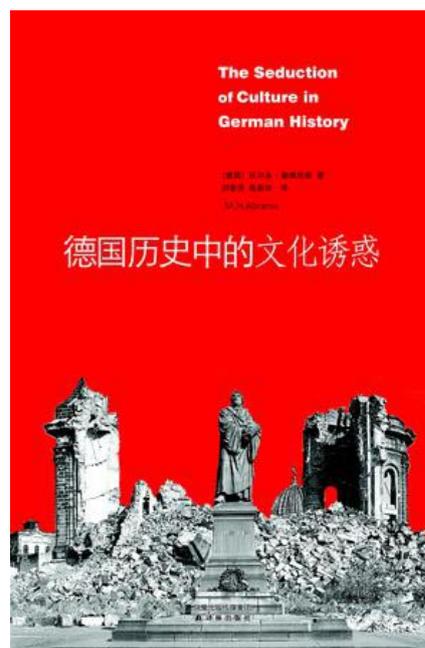
(《刘咸炘学术论集》子学编上,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

在重农与抑商并列的情况下, 重农的根本目标是成为军事帝国, 国家富强的实质是君主专制、民力枯竭。民国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这里的“国”是君主的代名词。《商君书》中“弱民”一章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称:“民弱国强; 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英雄》让秦国提前贯彻了“儒表法里”的精神, “大一统”是无可争辩的目标, 反对者要么幡然悔悟, 要么自取灭亡。这是一封写给反对者的“劝降书”, 劝说反对者以天下为重, 搁置争议, 拥戴秦皇, 否则就是意气用事, 目光短浅, 不理解秦皇的良苦用心。

孟子称:“不仁而得国者, 有之矣; 不仁而得天下者, 未之有也。”顾炎武严格区分“国家兴亡”和“天下兴亡”, 前者“肉食者谋之”, 后者“匹夫有责”。他们都“以天下为己任”, 不把自己与一家一姓之国家捆绑在一起。《英雄》也强调天下, 但是这个天下被纳入到秦国的国家利益, 天下国家化。根据《史记·商君列传》, 商鞅三见秦孝公, 前两次谈论帝道、王道, 秦孝公志不在此, 第三次见面, 商鞅谈论霸道, 与秦孝公一拍即合, 掀起了商鞅变法的序幕。这里所说的“帝王之道”, 以三代为模范, 重在“天下”, 而“霸道”重在“强国之术”。

《英雄》于2002年上映时, “定于一”的国家叙事在知识界尚未成为主流, 电影遭到了激烈的批评。如果《英雄》在五、六年后上映, 张艺谋可能会受到称许, 因为国家主义已经成为思想时尚。从这个角度来说, 张艺谋比刘小枫、甘阳更敏锐, 只是后两者更具理论抱负。



## 五

德国学者勒佩尼斯在《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译林出版社, 2010年)里指出:“德国的一些知识分子成为纳粹政体的追随者——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如此——的原因, 并不仅仅是受种族宣传和反犹太主义的影响, 而更多是由于美学的吸引和仪式的诱惑。”

张艺谋作为“秦粉”(这个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990年的《古今大战秦俑情》), “由于美学的吸引和仪式的诱惑”, 不仅反复以秦国为主题, 还在《山楂树之恋》里回到最接近秦政的时代。有人批评张艺谋热爱“史无前例”的时代, 他像莱妮·瑞芬斯塔尔一样倍感冤枉, 因为他认为自己在意的是艺术, 不是政治。但是, 艺术和政治很难截然二分, 尤其在政治权力控制一切的秦政时代。“清纯”不仅与美学有关, 更与政治学有关。对此, 《商君书》已有详尽论述。

朴和淫, 在《商君书》里是一组对立的观念。民风是朴还是淫, 不仅属于个人的道德和美学范畴, 更是关系到国策层面, 关系到能否定于壹(农战)。《商君书》明确指出, 重农政策和愚民政策、先军政策构成良性循环, 农耕不需要民众有太多学问, 民众思想简单, 就不会轻视农业, “民不贵学则愚, 愚则无外交。无外交, 则国安而不殆。”全民务农有利于愚民, 愚民有利于国家稳定, 既能让国家拥有粮食储备, 便于发动战争, 又能使农民平时安于耕种, 战时积极充当炮灰。正所谓:“圣人知治国之要, 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 则民朴而可正也, 纷纷则易使也, 信可以守战也。”

公开称赞愚民政策, 有些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很多时候, 《商君书》用“朴”代替“愚”, 强调“重农”胜过强调“愚民”。这是一种政治的修辞学, “朴”和“愚”、“重农”和“愚民”基本可以划等号。可是, 后世读者往往被这种修辞学吸引, 赞美重农政策下民风之朴, 忽略愚民政策下民风之愚。还有一些读者, 认为可以取重农之精华, 弃愚民之糟粕。但法家的重农和愚民是同一件事情, 无法分割。《商君书》反复表示:“属于农, 则朴; 朴, 则畏令”, “民壹则农, 农则朴, 朴则安居而恶出”。重农之精华就是愚民, 如何取舍?

《商君书》指出“有道之国务在弱民”之后, 接着指出:“朴则弱, 淫则强; 弱则轨, 强则越志; 轨则有用, 越志则乱。”(此处有两种版本, 本文依蒋礼鸿, 从简书之说)朴和淫成为治理国家的一对重要指标, 民风纯朴就会循规蹈矩, 服从命令听指挥; 民风淫荡就会有奇思怪想, 破坏稳定团结的局面。

淫(有时也称为“奸”)不限于作风问题, 包括除了朴之外的几乎所有品质。按照《商君书》的思路, 要对贵族征收重税, 但“劫富”不是为了“济贫”, 而是为了从根源上杜绝“辟淫游惰之民”, 即游手好闲之徒; 要禁止粮食买卖, 于是农民中的懒汉必须努力耕种, 商人中的勤劳者也无利可图, 只能改行务农; 要禁止靡靡之音、奇装异服, 这样才能“意壹而气不淫”,

专心耕种；要禁止旅游，以免产生“奸伪、躁心、私交、疑农”的花花心思；要把酒肉视为奢侈品，然后鼓励艰苦朴素……

是否有利于农战，是朴和淫的判断标准，有利于农战者是朴，无助于农战者是淫。朴，包括但不限于干净、纯真、简单、朴素、清纯、勤劳、老实；淫，包括但不限于游手好闲、靡靡之音、奇装异服、好逸恶劳。

为什么张艺谋既热爱帝国和君主，又热爱清纯的民女，《商君书》早已给出答案。“清纯”，是一种政治学。

## 六

文章写到最后，在网上看到一个帖子，考证《山楂树之恋》的剧情。作者认为地质队员老三得了白血病，不是出于文艺电影的惯例，而是因为地质队在探测铀矿，而铀是制造核武器的必备材料。

这个花絮再次告诉我们，“史上最干净的爱情故事”和一个“史无前例”的时代，如何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 TALK 访谈

### 与时代同行三十年

——徐友渔访谈

特约撰稿人 灵子（北京，[lingzi0815@gmail.com](mailto:lingzi0815@gmail.com)）

“我有时会担心自己两头一事无成，还会被人批评因为学术做不下去了，才来捡些容易的事情做。但是即便充满矛盾、困惑，我还是愿意这样做下去，我觉得，只要无愧于自己的良心即可。”

由复旦大学出版社编辑的学术系列丛书“三十年集”收录了三十名“五零后”学者三十年来每年发表的重要文章。徐友渔的文集名为《与时代同行》，从收录的文章，从早期的《罗素认识观述评》、《与维特根斯坦的三次遭遇》到《要什么样的现代化》《忏悔是绝对必要的》、《一代人的使命》，从题目可以明显看出其关注领域的变化。

两个多小时的谈话里，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我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然而这些年来他遇到的困惑，却是理性也难以解决的。



问：你在上海书展的发布会上说：“回顾三十年来的学术生涯，我最大的感触是自己始终在纯粹的学术研究和社会责任之间挣扎。在书斋里做学术是最感兴趣的，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矛盾越来越激烈，知识分子有责任去兼顾对公共事务的关怀。”这种矛盾是从何时开始的？

徐友渔：我这种矛盾由来已久。但是，知识分子在说社会责任或者历史使命之前，首先要能用学术成就来证明自己是个优秀的学者。撇开这一点，就像鲁迅说的，成了“空头文学家”。

我1982年研究生毕业，八十年代中期去英国牛津大学留学。1994年出版了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哥白尼式”的革命》，1995年获“金岳霖学术奖”。这不

是官方和政府的奖，但却是学术界公认的。它证明了我作为一个学者的身份与资格。

去牛津之前，我觉得牛津又怎么样嘛，咱们不是有北大清华吗？而且说北大清华排在一百名开外，牛津是前几名，我心里很不服气。但去了牛津之后，我的看法很快就改变了。与我合租一房的几个中国留学生，导师不是权威，就是学科的奠基人，还有诺贝尔奖获得者。我体会到，个人的聪明才干是一回事，但更多是靠水涨船高。只要在牛津这样的学校泡一段时间，即便付出的努力跟国内一样，都会比在国内提高得快得多。

我马上意识到，自己不管再突出，靠个人努力绝不可能使这一代中国学人的学术水平有一个整体的提高。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足球队有个很好的队长容志行，技术非常优秀，基本上关键球都是他进的。但他表现再好，中国足球队还是输。因此他放弃球星生涯，自己做铺路石，办了一所志行少儿足球学校。他觉得提高整体水平，比自己当明星重要。对我来说也面临这样的选择：是继续发挥我自己的原创力，把自己的学术做到国际水平，还是我不做这件事，而致力于使整个中国学术水平有所提高？

**问：八十年代时在犹豫个人学术成就还是为提高整体学术水平作贡献，那你觉得在后一种选择上能做点什么呢？**

**徐友渔：**当然能，这方面我有很多体会。八十年代中国有几个重要的学术和文化山头：一个是以汤一介、乐黛云、庞朴、李泽厚等为主力的“中国文化书院”，一个是先后以金观涛、包遵信为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我所在的是第三个，甘阳、王焱等为主力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当初我们这批人真是踌躇满志，研究生刚毕业已经在中国的思想文化舞台上大展身手。我虽然不是聚光灯照着的那个人，至少也是舞台上的一个。那时候觉得自己刚从牛津回来，做学问一做就是第一流的，又身处这么重要的一个文化山头，我们做了一大批书，跟各种出版社合作，策划中国未来怎么样，有时候出版社来约稿还爱见不见，心中已经有点飘飘然了。我们也画了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蓝图，而且有些想法到今天来看确实是独到和高明的见解。就是说，那时候我们作为一个整体如何提高中国国民素质，与个人做学问发挥创造力是完全一致的。

**问：比如呢？我一直很困惑，所谓道德重建、文化重建，到底从实际意义上能做点什么？**

**徐友渔：**这要分析，就要谈到八十年代的形势了。当时有几个文化路向，一个是杜维明、汤一介他们觉得中国的传统文化被破坏了，要重新恢复。这是非常好的想法，现在的国学热就是这个路线。第二个是金观涛、刘青峰夫妇领导的“走向未来”丛书，他们是自然科学院为主的一帮人，认为中国历来是受一些不正确的世界观、历史观影响，所以主张用世界上最先进的自然科学成就转移到社会科学领域。他们当时基本把中国的思想文化阵地全部占领了。汤一介看到国学的复兴，金观涛看到中国应该迎头赶上最新的科技潮流而且在社会科学去运用它，这些想法都高明得不得了，而且要贯穿下去，要翻译和出书，这是一片辉煌的天地，是以前意识形态里面没有的。

我们这批人是北大跟社科院年轻的一批研究生，我们看到，大家再有眼光，但西方最重要的人文思潮根本没有触及，什么是现象学、什么是存在主义、什么是分析哲学，我们就占领这块。另外一个独到的想法是，不是马上取代现在的意识形态，而是缓慢地从根基上做起。所以我们的主编甘阳当时引了一句话：中国二百年内就是翻译。就是通过西方著作使中国人知道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就做这件事，使中国文化跟世界文化能够接轨。

这从长远来看就是提高中国人的思维素质。像我搞分析哲学，就觉得中国人一考虑问题就像中医一样，什么东西都是甘草，都治不好也治不死，什么都是易经，说一也是它，说二也是它。我觉得中国的思路应该改变。我在中国提倡语言分析和逻辑的事情，做的学问是最抽象的，但是对于中国长远来说又是最要紧和最切中要害的。

那时候我感到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天分和提高民族的整体素质是一回事，像是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和可能，而且自己又置身其中，这样的状态非常好。个人与民族的状态完全是融为一体的，我个人做好了，民族也好了，每个人都煞有介事，整天很忙碌，认为自己肩负重担。

这件事在八九年被打断了。有着无限热情的年轻学者，为中国设计的文化蓝图一夜之间就被粉碎了。只是现在回想起来，八十年代确实有无限的遗憾。

**问：事实上，你很快就注意力转为关注当下社会生活。**

**徐友渔：**九十年代初，尤其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转型期间的阵痛就表现出来，社会充满不公平、不正义。中国发生那么大的变化，有那么多社会问题出现，我再做书呆子就觉得有点没有心肝。

要表达社会关怀，只有情怀是不够的，还是要有深厚的学理支撑，于是我就从纯粹哲学转成政治哲学，研究什么是正义、

什么是公正。

原来的领域很想继续做下去，毕竟你已经在这个领域开了个好头儿，应该巩固这个地位。而且这是一条很简单的路，当时做个所谓优秀学者，年龄大点当个权威学者，再往上老前辈，这是大多数人的路数。换一个东西就要重头开始，好像你本来已经在一场长跑比赛中跑在前面，再坚持下去很可能拿冠军的，突然你又换到另一场比赛里，要从队尾开始跑起，这实际是很痛苦的选择。

**问：那你这种选择能得到学术界的理解吗？**

**徐友渔：**有个知名学者，曾公开在杂志上点名说：中国现在有些知识分子学问做不下去了，或者曾经做的很好但创造力退化了，因此就挑一些轻松的、特别容易在社会上暴得大名的事情来做。他还点了其他几个特别关心社会现实的人，比如《现代化的陷阱》的作者，不顾她是最早、最系统、最深刻揭露中国社会不公正问题的事实，认为她不过是个新闻记者，没有学术修养。

大家都劝我，这种话理他做什么。我坦率讲——这说法非常肤浅。

有些人对死学问没有兴趣，我正好相反，有着超出常人的热爱。我见过世界强队，知道进入世界第一流的队伍到底有多艰辛。在牛津我不仅跟世界著名的导师讨论，还跟一批年轻的哲学家一起讨论。已经成名的人是怎么做的我知道，没有成名想要成名的人现在是怎么做的我也知道，我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我在牛津的导师是迈克尔·达梅特，这个专业里最著名的哲学家之一，在那里受到很好的训练；同时我去国外的机会多，掌握新的资料十分便利。我甚至一度觉得，社科院也相当于国家队队员，你如果不像国家队队员那样牺牲娱乐、牺牲你所有的爱好，只是兢兢业业盯着干，你不可能把学问做得很好。

人不是天才，能在多个领域齐头并进的人不多。可能一两年之内你还可以参加国内、国际学术会议，还可以就专业问题发言，但再过几年肯定不行。我知道学问艰辛，我有这个自知之明。所以后来这个领域我根本不说话了，所有邀约都不参加。

政治哲学这一边也有个做多少的问题，你是纯粹从学术上研究当代政治哲学呢，还是作为理论武器，用来分析中国现实？这个问题，客观地说，我至今还没有解决。

**问：大方向虽有，但肯定会面临各种具体的选择，比如一段时间里是潜心做学问还是经常出现在公共舆论平台上发声。**

**徐友渔：**你说的完全对，而且这种选择非常频繁。我搞逻辑哲学出身，是高度理性的人。但是在碰到这种最关键的问题的时候，我实际是凭着感觉走。如果某个事件发生，没有人站出来说话，或者没有人比我说得更清楚，我就会觉得有这个义务。

**问：比如什么事情呢？**

**徐友渔：**比如公民权利平等的问题。“选举法”规定，代表名额“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也就是说，农村人口只是城市人口选举权的四分之一。中国农民的选举权，是制度层面上最根本的城乡差距。这篇文章发表于《法制早报》，2004年12月2日，题目是《几个农民等于一个市民？》。

再举个例子，张悟本事件。老百姓应该知道他的方法是不科学的，揭露和制止他是必须的。但政府在处理张悟本事件时，却是用行政力量进行的，这种力量是非法治的，莫名其妙的人，夜里把悟本堂拆掉了，看起来很严厉，其实却使一些人逃避了责任。比如有的地方打黑，表面上是取缔一个坏事情，实际上却带来更坏的事情，就是践踏法治。

**问：你既然明确知道自己对那些冷学问热爱且擅长，为什么还不能选择这个方向呢？是因为对社会的责任感吗？还是一定要选困难的事情做？**

**徐友渔：**比较准确和客观地说，自己关心公共事务，而且有时很投入，大概有这么三个因素：首先是跟时代有关，如果我在英国、美国那样的平稳社会就不会做这种事。第二是跟人的本性有关，我觉得一个人的人生应该充满热情，对社会有比较强的爱憎态度。如果什么事情都看得很平淡、无动于衷，就没意思了。第三还是我抱定一个宗旨，别人能做的事情我肯定不做，干吗一定要冲到第一线去？

形成这些原因跟个人天性也有关系。我从小因为家庭条件好些，接触的书比别人多。比方我初中时期看小说，看雨果的《悲惨世界》、《九三年》，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我天然对不幸者有一种同情。或者看托尔斯泰，这种古典人道主义的影响对我很深。我从来摆脱不掉，而且也不打算摆脱。

我一再说自己是很理性的人，二者只能选其一的话，我可能还是略偏重社会性方面。为什么呢？我觉得做学问最重要的素质我有，就是那种对思想的洞察力。我做学问是很轻松的事情，比如我从来没有进过哲学系，甚至说过很难听的话，我每天上厕所就拿一本哲学书，就这么看出来。但我觉得人生要追求全面的价值最大化。有些品质是在象牙塔里没法满足的，比如道德勇气。人在某些专业领域有天分当然很珍贵，但我觉得这未见得是稀世之宝，而正义感、敢于实践的勇气，中国知识分子中是大部分做不到的。我是一个不怕死的人。我既然做得到，社会又需要这东西，我更愿意做这些。

我觉得一个人只想挑一种比较轻松的、一帆风顺的生活是没有乐趣的。我有很多烦恼、矛盾和内心冲突，但这也许是一个人追求生活意义的表现。

**问：华师大的许纪霖先生一直关注知识分子群体的变化，他认为这一代知识分子有一个共通的特点，从来不是为学问而学问，而是怀着想要解决社会问题的心愿，为问题而学问。所以你们最终的目标都不在学术成就上。**

**徐友渔：**在绝大部分意义上我承认他说的是对的。我们这代人不论自己想把自己说成是怎样，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这种动荡，经历过下乡，从基层干起，要说为学问而学问，我觉得有点说不过去。你不是那种世家出身的人。但是另一方面，我研究罗素，他可能是西方哲学家里面最主张为学问而学问的。我可能略与许纪霖说的不同的一点在于，至少我能够进入为学问而学问的这种状态。

**问：问题是你就不同意全心进入。**

**徐友渔：**是这样。谈到这个问题，从宏观来说，可能会涉及一种很深刻的看法。

做学问是一个民族最根本文明的标志，但中国近代以来遭受西方列强尤其日俄侵略之后，苦难深重。中国人由于自己运气不好，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在文明思想学术积累的层面很惨。我明明喜欢为学问而学问，但由于社会责任感，虽然这是正面的品质，却不得不在某种意义上放弃学问，放到历史长河中看，实际上刚好体现了中国民族近代以来非常悲惨的悖论。

一般人认为梁启超这样的人多了不起，吹他的学问，我看他学问根本不行，为什么？他那么好的文采、功夫，为什么最后做出这个结果？他就是时运不济。中国这么悲惨，他要考虑国家的命运，没法专心致志做学问。我觉得我们实际上是在整个国家近现代以来这种不幸的命运里面生存的，这种命运是我们逃不过去的。

真想在这种情况下做学问的，自认为在国内干得很好，到牛津一看就知道自己其实也不行。客观地说，就算我是为学问而学问，大家以为在国内当个博导或者拿了很多国家奖、课题基金，就很了不起了，真正见过大世面之后，才知道自己是根本不行的。所以那头也做不了，这头也做不了，这不光是我个人的命运。

在这个问题上，我自己也有一些民族主义情绪，比如我对日本侵略者特别憎恨，本来我们能够在思想学问上跟外国人比拼的，但就是因为国无宁日，思想文化方面的建设荒废了，我们事事不如人，而且这种差距是短时间赶不上的。这种做不到就是历史命运决定的，这种命运就包含日本侵略、内战这样的因素。你把它连成一片看，一个人想挣脱一个民族的命运另外开辟一条路是难以实现的。

**问：真的为学问而学问的话，就是移居国外埋头研究，不理中国社会发生的这些事。**

**徐友渔：**对，这种人也有很多，比方我们哲学和逻辑上的杰出人物王浩，他在西南联大也是没被很多人看入眼的，但是他就在那边就做出来了。还有杨振宁、李振道、吴健雄都是这条路。

**问：你之前说到底是做个人的学术，还是带动整体学术水平发展，其实未必是矛盾的。有时候，也许纠缠在当下的社会、政治、民族中，反而很难有所超越，一段时期内可能作用很大，但是放在历史长河里也许会很快因为这个时代的过去而淹没。那些埋首做学问的人所取得的成就，有时反而更能经得住考验，他们的成绩也许更能使中国整体的学术水平有一个大的发展。**

**徐友渔：**对，我刚才想说的也是这个。其实选择哪一头都是很痛苦的决定，这就是民族的命运决定个人的命运。想到这一点还是挺丧气的。我们这种做学问的人也有很强的自尊心，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我们经常感到惭愧。那些不懂的人看起来很风光，我们心里知道实际上矮人家一头，其实心里挺难受的。事情就是这样，有什么办法呢？

但是我也从来不抱怨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如果我在美国，也许跟自己理想中很够格很标准的学者一样了，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有机会当一个美国人或者法国人，尽管我周围很多朋友已经很容易就当上了，而且回来以后还或多或少有种优越感。我一点不觉得他们的选择比我好，甚至认为我的选择比他们高明得多。我觉得一个人接受命运以后最大限度的跟命运抗争，才

是人生意义之所在。

**问：我从书中看到，八十年代时知识分子与现在有很大不同。**

**徐友渔：**我八十年代走上舞台，不仅是观察者，还是亲历者，是见证人，观察到中国知识分子很深层次的东西。比方八九之后要寻找另外一种新的思想方向和生存方式，那时为什么昆德拉在中国大行其道。

**问：大陆引进昆德拉的书，你最初是什么感受和思考？**

**徐友渔：**我看昆德拉看得非常投入，昆德拉那种深刻揭露专制主义非常透彻。专制主义把人性压抑到某一个地步，而且西方为了反专制又采取了西方式的轻浮跟虚伪，我觉得我深有同感，写得非常漂亮。他也不愧是一个在专制制度下保持人性的作家，我对他的评价非常之高。

**问：那么，当昆德拉受到知识分子的追捧后，你对他的批评指向哪里？**

**徐友渔：**八九之后，很多知识分子的热情和梦想全部都没有了，一方面是愤慨，一方面也不可避免恐怖的情绪，找不到出路。怎么办？民主自由或者改革开放的希望好像一夜之间都没有了，那时的气氛好像要拉回到毛泽东时代。

知识分子有一个毛病，就是不满足平庸的生活，他一定要为自己形而下的日常生活找一个形而上的理由。他要被迫适应新的犬儒主义生活，就要证明这是现在唯一正当的选择，昆德拉适逢其时。

这些人把昆德拉做了一种——未见得是百分之百的歪曲，但明显是为我所用——解读：所有反抗本身、为正义而斗争本身，都是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专制的哲学是整体性哲学，整体性的反抗就是专制的哲学，你表面是反对意识形态，实际是用意识形态反意识形态。要怎么才能与专制的意识形态一刀两断呢？不反抗是最彻底的反抗。

有人提出一个口号：“知识分子有退出历史的权利。”貌似非常深刻，实际是勇气不够，为打哆嗦的人找了一个借口。

大概从 1990 年开始，有两三年，许多知识分子心目中弥漫着的都是昆德拉情绪。昆德拉给他们提供了一种过犬儒主义生活的非常精巧的形而上学的根据。

而且还有精彩的故事。比如武汉的学者到上海，就开始争论昆德拉的话题。当时朱学勤很夸张地加了一个名字，叫作“民间思想群落的互访”，上海中青年思想界真当成一回事，以最强的阵容接待，进行思想交锋。

上海人尽地主之谊，在市委一个很高级的礼堂放内部电影，就放《布拉格之恋》。看到苏联坦克进入布拉格，朱学勤就发感慨了，指着他们问：这种形势下你们怎么还有沉默的权利、退出历史的权利？对方觉得你是在对我们进行道德上的敲诈勒索，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谈论这个问题？我们本来是谈论学术思想上非常形而上、非常高深的退出历史的权利，你现在把苏军坦克入侵的特殊状况拿来问我们，好像把我们放在一个道德上很低下的位置。民间思想群落的互访，朋友之间非常动感情情的一个活动，最后变成了一场大争吵，不欢而散。

他们前脚走，我后脚就到了，所以我对这些中国学术界有意思的事情都了解很清楚。透过这些人事纠纷确实可以看出，一个时代，当压迫到来的时候，当专制机器开足马力显示出威力的时候，知识分子会有不同的态度，而且这种态度一定要升华成形而上的东西。

客观地说，昆德拉揭露的东西，比如那些西方抗议者作秀确实是实有其事。但是包括我在内的一些知识分子并不认可昆德拉。昆德拉一方面批评集体性的行动、斗争哲学、激进主义这些东西，马克思主义、法国大革命里面继承的这套东西；另一方面提倡的是彻底退出历史，不反抗是最大的反抗。有没有另一条路？我们马上就发现，哈维尔提供了更好的说法和做法。

**问：哈维尔与昆德拉的区别在哪里呢？**

**徐友渔：**他们都是专制主义条件下受迫害的人，但昆德拉在最关键的时刻采取是退的态度，他认为任何反抗都是滑稽的，都是表演作秀。当他跟哈维尔出现分歧的时候，我是百分之百站在哈维尔这一边的。

哈维尔丝毫没有好莱坞演员作秀的那种嫌疑，没有在反抗中鼓吹激进主义、强调整体性口号来对一般人进行道德绑架——就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面一再要人去签名、游行——哈维尔体现非常本真、个人的东西。他去参加游行集会可以在中途玩一圈，喝杯啤酒又回来，他参加这种集体活动是有效的，完全不是作秀的。所以昆德拉流行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一股力量，一种倾向，更小，但是坚持到现在的价值取向，就是哈维尔。

我很少佩服、崇拜一个人，但是哈维尔确实让我钦佩。他让你看到世界上还有这样罕见的人物，自然，率真，不同凡响。

尤其是见面时感受到那种洋溢着的人格魅力。

我认为我自己写过的最好的文章之一就是《昆德拉、哈维尔和我们》。第一个明确揭示出来在昆德拉和专制主义之间有一种可供我们选择的道路。而且对那些借口要跟专制主义彻底决裂从而完全退出公共生活的人，我把他们的画皮撕得一干二净。犬儒主义的人仍然是犬儒主义，但别想再用昆德拉作为武器来为自己辩解。

**问：那你怎么看现在昆德拉的书如同村上春树作品一样在国内如此流行？前不久译文出版社还刚刚举办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单行本的百万册销量纪念。**

徐友渔：我觉得昆德拉的流行有两个原因：一是它本身的艺术魅力，这一点是不可忽视的。二是不论他最后的结论我多么不喜欢，但他实际上把专制主义集权下的人们精神状态写得非常之好。《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面好多人物，看的时候真的是揪着心的。比如说托马斯医生，还有一个更深刻的形象，不断背叛的萨宾娜。

另外，现在之所以还这么热，有一个中国知识界没有言明的东西，是因为昆德拉提供了一些思想资源，而且这些资源非常漂亮、华丽、动人。只是他们不愿意说出来而已。这背后寻找思想武器的动机还是比较明显。

要选择信奉哈维尔实际很困难，你宣称选择哈维尔之后该怎么做？你就会冒险，很多人因为做不到而不喜欢。你喜欢了会让生活很尴尬。而喜欢昆德拉就特别理直气壮。就是说，你们现在还在反抗啊？你们还没有脱掉集体性的反抗那一套。说起来多振振有词啊。

但我觉得，在中国如果对旧的意识形态能够识破的人，有独立意识的人，首先应该理解昆德拉讲的话，肯定他。昆德拉是独具眼光，在这个社会里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如果对昆德拉的这种东西没有共鸣、没有领会还是不行的。对我来说第一步是共鸣，然后，昆德拉认为这是他唯一的选择，这个我认为是有问题的，哈维尔的选择比他更好。所以我不愿意简单否定昆德拉。

中国有很多正直或者善良的人，我把他们称作头脑简单的民主派，他们对昆德拉是不理解的。有些人不懂他提出的有些反抗确实是简单的反抗，是煞有介事的。从普及的意义说，我甚至觉得中国大多数朴素和简单的民主派，应该读昆德拉，然后再指出他的不足。

**问：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很严苛，一方面要求在学术上做出成绩，另一方面你又不是只专注于学术而不在公共事务上发言。其实学者也是有权力坐在象牙塔里的吧。**

徐友渔：当然，谁都有权利这么做，对于知识分子更多道德上的要求或者胁迫是说不过去的。道德勇气只能要求自己，要求别人是很荒谬的事情，就像我年轻时候的教训一样。但是，作为个人，要有内心的真诚。不能把“我必须做学术贡献”作为借口，来掩饰胆怯和懦弱。

**问：但这个很难判断，你怎么来界定一个人是否真诚地想要献身学术？**

徐友渔：所以不能有诛心之论。但内心会有一个判断，我熟悉他们，我坚信我的判断是没错的。

**问：这么说，你对当代知识分子很失望？**

徐友渔：客观地说，对于在民间维权的人，或者在新闻战线上为正义打抱不平的人，比起那些大知识分子、名教授，懦弱而只考虑自己名利的人，我内心要尊敬得多。

**问：你的失望在哪里？或者说你觉得他们应该做到什么？起码以身作则？**

徐友渔：这个问题又很复杂。一个人可以有多个身份，我是个教授，我必须把学问做好，但我首先是一个公民。公民不但要维护自己身为公民的权利，还要维护其他公民的权利，这点没做好是说不过去的。这点做好之后，另外的事情是锦上添花的事情。这点不做，人之为人的意义和价值就没有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每个人都要做，在这个充满了不公正和苦难的社会，每个人必须做点事情。

我当然也不会那么简单。对有特殊天赋的人，这些履行公民职责的人应该保护他。我想到的例子是普希金。当时普希金想参加十二月党人的活动，但是那些十二月党人说不行，你象征了俄罗斯文学，你跟我们一起做这件事情流放到西伯利亚的话，俄罗斯文学损失非常大。

偶尔有人对我进行道德绑架或者威胁的时候，我内心会有这种想法：我有权利选择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情！社会公正很重要，天下不平等的事情要去矫正很重要，但是有些深刻微妙的事也重要，我同时看到中国学术水平与国际上的巨大差距，这种东西是一个国家长远的东西。我私下里会想，假定那些人间疾苦的事情有更多别人来做，我就去做精神文化方面的事。我内心有这种期望，虽然也许显得很幼稚。

**问：你认为当代社会环境下，知识分子究竟应该肩负什么样的使命？**

**徐友渔：**要求一个知识分子成为志士仁人，或者一定要成为社会改革的先锋，当谭嗣同，是没有道理的。西方一个普通老百姓都有公民意识，看到不正当的事情总是会站出来。当然他不必牺牲自己。

其实，在中国也不是所有事情都需要牺牲自己。民国时代知识分子的道义感要比现在好。这可能是社会已经把这种道义感破坏了。中国的政治迫害太厉害了，就算一个正直的人，也经不起超乎寻常的打击。同时，转型时期诱惑也太多。你如果在道德勇气上退一步，能得到的东西很多。如果没有这么多诱惑，人总还是有天然的正义感，总是要骂娘、要说话的。现在尤其对于高校的知识分子，威胁和利诱两方面的强度都特别大，使得人几乎就是别无选择。

**问：所以很多人都在期待这一代人职务上退下来之后会有所改观。**

**徐友渔：**这个期望好像不是太有把握。总的趋势会这样，但是它会运行得非常缓慢，变化会比我们期待的小得多。这个体制的基因复制能力非常之强，无论是什么出身，一旦进入这个体制，权力的格局会把人改造得非常厉害。很多政治家对现实的不满意说起来比我们还深刻，他什么都知道，但做的又是另外一套。制度安排常常比个人受的教育训练重要得多。

**问：稍微把我们的主题岔远一点，既然这样，你觉得将来社会发生变化的动力到底会是什么？**

**徐友渔：**看不出来。经历过那么多政局改变，又看了那么多书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但是我的经验和知识还是不足以预见未来。我们处在一个全新的、没有经验和知识可以借鉴的阶段，到底会怎样很难说。我只能说我希望是哪一种方式，但是这种状况的可能性非常小。

我希望中国的变革是自上而下的，主张比较有序的、甚至非常缓慢的进步。

我能够容忍非常缓慢的进步，但是不能开倒车。在这种事情上，我表现出来的是一个义无反顾的态度。我做这件事非常有底气，道义上完全在我这一边。

**问：前两天吴思先生在一个讲座中也谈到转型动力的问题，他比较乐观，现在的既得利益者，会想办法让自己及子孙的财产合法化，这种动力将推动一些改革。**

**徐友渔：**他说的也许有道理，我们不排除那种在道义上不那么舒服的东西，我也很习惯这种视角的分析。但是他的这种观点由于不确定性太多，具有两面性。这种动力可能会最乐观地向他预测的方向发展，但也可能向更恶化的方向发展。我愿意充分听取这种意见，但不能一下子接受和相信这种意见，因为它朝另一个方向发展的可能性同样是非常大的。

**问：你的关注和参与是希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

**徐友渔：**这个目标跟很多人不一样。我并不认为中国会在短期内实现民主，或者短期内变成很自由的社会。我很悲观，我觉得中国未来道路充满了非常多的危险和陷阱。比如，那些偏激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里面猖獗的东西，民粹主义大泛滥，甚至法西斯主义，这些危险非常现实。如果某些人的那套在中国成功了，中国会走向法西斯社会，可能会回到毛泽东时代，或者出现文革时期造反有理的时代。

如果想不出最好的是什么，那就把所有最坏的东西去掉，总会好得多。我不是政治家，一定要给出一个图景。作为一个清醒的人，我对现实的危险很清楚，但只要拼命跟这些危险作斗争，未来中国社会是个次好的社会，我也会满足；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充满了自我怀疑。

**问：最早是什么事情刺激你，让你感受到知识分子需要走出书斋，对社会发声？**

**徐友渔：**这说起来就很远了。文化大革命中，突然之间全国的年轻人都发疯了，都去拥护毛泽东打倒政敌、左倾动乱。我是群众组织的头儿，陷得很深，带领大家做了很多荒唐的事。

**问：你在文革里怎么个“陷得深”法？用过武力吗？**

**徐友渔：**没有。但我必须坦率地说，客观原因是，文革初期打老师的时候我是没有资格参加的。我属于黑五类，其实按照当时的意识形态，我特想跻身于那种革命的，实际上是迫害者的队伍。但是我假定如果真的挤进红五类的革命队伍里去，我想我还是不会打人，会有一个底线，毕竟这一步还是不一样。但是至少我会做一些残忍的事情，会做对不起良心的事情。所以你问这些考虑和烦恼是怎么来的，都是因为有些这些经历。

**问：但有这些经历的不只你一个人。**

**徐友渔：**这种事情大家做了之后说反正是上当受骗，但是我做不到，我不能推说自己是受骗就行了。我自己有哪些不对的事情，究竟为什么会不对，我都考虑得非常之远。林彪事件爆发了，大家就说哎呀政治很黑暗，就完了，我不行，会想自己为什么会在这条错误道路上也走过。这种考虑使我走得非常之远，包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打下江山，上世纪前半叶共产主义运动为什么会在全世界蔓延，我都要思考。而且我花了大量时间找各种书籍，我觉得我必须要搞清楚这一点。我不愿意中途停下来，不愿意满足于一个简单肤浅的结论。

文革的教训就刺激我认识到：，一个人不关心国家前途命运是不行的。如果整个时代是黑暗扭曲的时代，你自己的奋斗是没有意义的。文化大革命我陷得非常之深，接触了大量的政治和阴暗面，有大量的经验教训，我就对自己有个要求，在国家的命运、大是大非面前都要搞清楚，不然你就会处在一个非常可怜的地位。我对政治的兴趣、对社会介入的要求完全是文化大革命把我锻炼出来的。

**问：嗯，我想这些困惑应该都是很早开始思考的结果。包括你提及中学时代的反思，很多你的同龄人没办法在那个年龄走得那么远，你这种做事情“一定要搞到底”的风格究竟是怎么来的？**

**徐友渔：**其实“一定要搞到底”有时候是优点，但搞不好可能是非常大的缺点。你看很多共产党人、法国大革命党人，自以为道德上很优越，事情做得很彻底，实际上做很多残忍的事。

**问：你说的因为这种彻底的性格遭遇到的教训是什么？**

**徐友渔：**文化大革命暴露出我们这一代人有些表面上看起来是道德上的优点，实际上是缺点。比方对自己跟对别人的要求都严格到了残忍的地步。说到底，我就是共产主义制度下那种禁欲主义的、清教徒式的教育培养出来的，没有人情，只讲原则。

文革前我是一个学习好但愚蠢、幼稚的学生，一个团员或出身好的人就可以教训我，我天生觉得一种原罪，老师说的话就是圣旨。因为我的父母在历史上存在问题。他们很早就参加革命，我父亲的资历可能和邓小平一样老，是和周恩来等人一起去法国留学的那一批。后来他在党中央机关工作，被国民党抓起来，那时允许亲戚去营救，结果营救出来之后就赶上抗战了。抗战时期反正国共一家亲，我父亲就去训练国民党军队打游击，后来在军校教外语。这样就成了“国民党反动军官”，而且是从共产党里面“叛变”出去的。他被定为“历史复杂”，算成黑五类，政治待遇是很低的。

我庆幸我的父母早死了，如果不早死，我肯定要做伤天害理的事情。我肯定会在文革期间把他们当成文化革命的对象，斗争他们时，我肯定要参与。跟我最好的一个朋友，他的父亲是国民党将军，他也是支持红卫兵斗争自己父亲的。我对自己很清楚，我既然相信了共产主义，另外的事情都是为了这么一个最崇高的目标，我能做到六亲不认。我们这代人很多人都能做到。

**问：在各种你感到困惑的轻与重的选择之间，总是要选择那个重一点的、难一点的，大概也是受这种教育的影响。**

**徐友渔：**你这种观察非常对。不过这要看怎么说，我们身上带的这种遗产是要一分为二的。一方面它会使人丧失人性，对自己和对别人都要求很残忍，好像我既然对自己这么残忍，就可以对别人残忍。它跟残忍结合在一起，作恶的可能非常大。所以我对二十世纪那种以共产主义的名义、以道德制高点名义做的坏事，有很多批判。但另一方面，从抽象的角度看，自强不息，对个人严格要求，我觉得还是有好处。甚至有些看起来讨厌的东西，也看你怎么用，比如刘少奇讲的“论共产党员修养”，跟中国孟子讲的“吾日三省吾身”，都强调自我批评和反思，我仍然认为这些东西是宝贵的。如果自己能够把两者剥离开，把非人性的东西滤掉，这些道德性的东西还是有优秀的。

只是这个度确实很难把握。我花了大量的功夫，但我仍然觉得自己没有把握住。比如我现在看到别人追求享受，我还是批评居多。使我受到触动的是在英国留学的时候，大使馆给我们留学人员提供了大量的经费，每两个礼拜就出去旅游，有机会看到另一种生活。当初印象非常深，觉得平常我最瞧不上的生活其实挺正常挺有意思的。英国年轻人就是无忧无虑，脸上就是傻笑，过着对日常生活满足的生活。我非常触动，后来理性上也承认人是可以追求日常快乐的。但对那种艰苦朴素的东西，更容易持肯定和赞扬的态度。我周围的人经常批评我，日常的人情还是不够，可能清洗以前的革命与激进的意识形态的工作还没有做够。

图为徐友渔近照

## TRANSLATION 译介

### 涂改乐谱

作者：菲利普·肯尼科特 (Philip Kennicott)

译者：朱芳艺 (美国·孟菲斯, [fangyizhu@gmail.com](mailto:fangyizhu@gmail.com))

在美国文化生活中没有跟英国批评家诺曼·莱布雷希特类似的人。他是一个善辩者，他擅长的领域是上流文化——特别是古典音乐；而他针对的读者无疑是主流。他是一个令人着迷又令人恼火的角色，无限武断，通常喜欢打破陈规，有时才华横溢，经常带有倾向性，又经常有点琐碎。他冲撞过很多杰出音乐家、学者以及音乐界领袖；他曾被公开谴责，他的出版社曾遭起诉；而他有着一个热心的读者群体，他们喜欢他轻松愉快的、易读而又富于煽动的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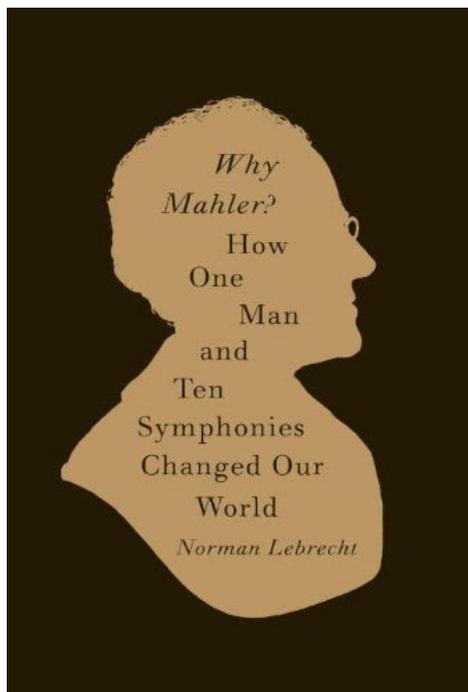
这就是为什么他关于马勒的新书必须严肃对待，尽管它论述得鲁莽并且写得极糟。《为什么是马勒？》是研究报告与传记的令人不安的杂合体，和对于这位维也纳交响曲作家的个人沉思，后者统治了十九世纪末的音乐生活，为歌剧作品订立了至今适用的标准，而且可能是古往今来凡执棒者中最伟大的指挥家。还有一些人相信他是 20 世纪最美和最深刻的作曲家。莱布雷希特这本古怪的书正赶上今年马勒的 150 岁诞辰，以及明年他去世 100 周年纪念。

莱布雷希特以前也研究过马勒。他的《记忆中的马勒》出版于 1987 年，是个很有用的原始资料集合，包括信件、评论、以及来自当时的音乐家、朋友及敌人的纪录。莱布雷希特的新书十分倚重这些材料，并精心挑选来强调两个主要主张：马勒的音乐预见历史、科学和社会的重要进展，以及马勒并非像很多学者认为的那样对他的犹太背景感到不安或逃避之，而是完全甚至快乐地带上它的烙印。

马勒的交响曲，大型管弦乐团的巨作，经常伴随着独唱家和合唱团，衔接着 19 与 20 世纪。尽管他从未越界到他最伟大的崇拜者之一的阿诺德·勋伯格倡导的完全无调性音乐中去，马勒却将这一形式在每个方面都推到极致——在它的基本维度上、旋律轮廓上、编曲密度与清晰度上、强弱对比范围上、以及复调上。对于他这一巨大的实验，当时的反应是复杂的。他不像经常说的那样是一位没有荣誉在身的先知。但他也没有被广泛而热情地接受，至少在他死后十年之前没有。今天，在录像片段以及 250 页易读小说盛行的时代里，当文化的基本单位似乎越来越短小和支离破碎的时候，马勒的交响曲因其雄心和宏伟，仍有着无数热情投入的支持者。

但莱布雷希特坚信马勒不止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他的交响乐还预言了战争、现代技术、以及环境恶化。“在他的第三和第七交响曲中，他暗示了未来的生态灾难；在第六交响曲中他警告了即将来临的战争，”莱布雷希特写道。

“他的第一交响曲着手儿童死亡问题，”以及“他的第二交响曲否认了教会关于死后生活的教条。”第四交响曲不但“宣布了



种族平等，”而且提出了“动物权利的问题”。

马勒不是唯一一个引来了这类胡说八道的艺术家，但他的支持者们似乎特别耽于此道，部分是因为作曲家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智性热潮时期。可是即使你相信时代精神的生机勃勃的外表——而且接受马勒在一个现代性的大熔炉中生活并且创造音乐的说法——认为他能够占卜未来的想法也仍是荒谬的。这是一个古老的比喻：将受苦的艺术师比作卡珊德拉。对于一些非常热爱马勒的人们而言，马勒作为先知的说法似乎能够补偿始终纠缠马勒音乐生涯的偏执和反闪族主义——未来为过去的错误而复仇。

莱纳·伯恩斯坦也不能免俗，他在1967年声称“只有在我们经历了奥斯维辛冒烟的炉子、被疯狂轰炸的越南丛林、经历了所有这些匈牙利、苏伊士、猪湾、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的闹剧审判、纳粹机器的重新抬头、达拉斯谋杀事件、南非的傲慢、希斯-钱伯斯事件、托洛茨基清洗、黑权主义、红卫兵、阿拉伯包围以色列、麦卡锡主义之祸、军备竞赛——只有在所有这些之后，我们听马勒的音乐并发现它一切都预知了。”（它当然什么也没有预知，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同情一下伯恩斯坦热烈的修辞，既然这位美国指挥家与他音乐上的祖先是如此相似，而他又如此热情地想要将音乐与当时的政治联系起来。）

在令马勒交响曲成为世界各音乐厅的核心曲目上，伯恩斯坦起了关键性作用。他在1960年代支持马勒的时候，这位作曲家的交响曲已经日渐衰微，在音乐世界的很多角落里处于一种令人吃惊的被忽略状态，作为晚期浪漫派过多的感情主义而遭到抛弃。然而，莱布雷希特却开篇就说马勒迟来的成功，他的广泛性、他在音乐厅里的无所不在、他对流行文化的影响（“在感恩而死乐队、平克佛罗依德乐队、克里姆森国王乐队、蓝色尼罗河乐队和约翰·佐恩的摇滚音乐中能够听到马勒”），以及他对政治和世界历史的影响（“马勒发明了现代世界？”）。

莱布雷希特的夸张与歪曲——真的有谁在感恩而死和约翰·佐恩中听出马勒来了？——并非旨在挽回马勒的名声或者复兴他的音乐。他眼下似乎在发明一种廉价和肤浅的马勒——对作曲家的一种粗糙而玄乎的理解，为了取悦新读者，特别是醉心于大卫·歌利亚式叙事的读者，这类叙事经常突然出现在马勒与既有观念、平庸、传统文化偶像、以及刻毒地反闪族的维也纳人的斗争中。

然而他不必要这样迎合。马勒的神秘生活的真相其实比莱布雷希特试图将他塑造成的超级英雄和犹太受害者的形象更为有趣，更为激动人心。想想马勒改宗基督教的事吧，1897年，授予他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指挥之职的前提就是他改宗。马勒痛恨这一任务，而且为其中的不诚实感到苦恼。莱布雷希特是这样讲述这个故事的（引用指挥家布努诺·沃尔特和奥地利音乐批评家路德维希·卡巴斯）：

他对改宗是最不情愿和最愤慨的。“我必须经过这个，”他告诉沃尔特。“这一行动，”他告知卡巴斯，“是我出于自我保护，我也完全准备好这样做，它让我代价巨大。”他告诉一位汉堡的作家：“我换了外衣。”这里没有假虔诚，没有虚情假意。马勒就是要让人知道，并留下他被迫改宗然而其犹太人的骄傲未减、他的本质未变的纪录。

而这里有一段更完整的致卡巴斯信件的摘录，在亨利·路易·德·拉·格朗日的史诗般的四卷本传记中引用过（关于马勒去维也纳之前在汉堡的职位，当时伯恩哈德·波里尼是歌剧院的经理）：

“你知道是什么特别冒犯并惹恼我吗？是一个人只要不受洗就不能担任公职的事实。这是我无论如何不可以接受的。当然不能说我为在维也纳就任的机会而受洗——我多年前就已经受洗了。事实上我十分渴望逃离汉堡这个波里尼手下的地狱，这才使得我考虑离开犹太群体。那是这件事侮辱性的部分。我不否认它令我付出很大努力，真的可以说是自我保护的本能促使我作出这一举动。内心里我完全不反对这个事。”



莱布雷希特在他的阐释中太有选择性了，而且对最后一句的模棱两可置疑得不够：“内心里我完全不反对这个事。”马勒

的改宗完全不像海涅的那么戏剧化，它只是获得职位的敲门砖，而不是“通往西方文明的护照”。而基督教对于马勒而言具有美学上的共鸣，海涅绝对没有这个。

这一复杂因素并未阻止莱布雷希特沉溺于想像马勒的虚伪，这又是全是伯恩斯坦说的，却没有很多学者支持。莱布雷希特像伯恩斯坦一样，认为马勒因改宗困扰不已，使他写下了另一个场景，作者在那里狂野地想像着在马勒与美丽、性情多变、不忠实的艾尔玛·辛德勒的婚姻中一个倒霉事的意义。在婚礼上，马勒在圣坛前下跪时绊倒或跌倒了：

想像一下这个场景吧：急切的小犹太人即将与金发美女结婚，绊倒在他的祈祷凳上，摔了个狗啃泥，哈哈，没有人比约瑟夫·法伯牧师笑得更大声了。当时发生的事就是这样的吗？我仔细想了想，觉得应该有更隐秘的情节。圣坛之上是一个巴洛克的旭日造型，中央有四个希伯来字母——哟，和，瓦，和（yod, heh, waw, heh）——上帝的不可称呼的犹太语四字神名。古斯塔夫·马勒在跪下时向上一看，便失足跌倒。艾尔玛认为他跌倒是因为他太矮。但是马勒刚刚看到了犹太人的上帝。负罪感和背叛感堵住了他的喉咙。他在宣基督教的誓言之前需要点时间来镇定一下。他跌倒以便争取时间。

这一段给莱布雷希特证明了他的大胆和性格。他注意到了一些有趣的东西：教堂里的希伯来字。他所描绘的心理剧并无证据，而马勒有意跌倒在地以便“争取时间”的说法更是毫无根据。（不消说，这肯定能在电影里作为一个很好的场景。）至于马勒的负罪感和背叛感，再来看看德·拉·格朗日：“无论是在马勒的公开言论还是在他的信件当中，对于他离开了他祖先的宗教一事，没有任何东西显露了他哪怕是最轻微的负罪感，以及来自他的悔恨。”尽管莱布雷希特哀叹着，一个“牺牲仪式”围绕着马勒，他却反复地纪念这一仪式的虚构场景。

这一类写作对马勒的曲解，就像现代同性恋权利提倡者对奥斯卡·王尔德所做的那样，他们把王尔德扮成某种当代人权提倡者。在这本书里这样的事情一再发生。在分析 1908 年的一首大型乐队歌曲形式的交响曲《大地之歌》最后一句的时候，他抓住了最后一首歌的最后几个字：“永远，永远。”在上下文中，它们是典型浪漫主义的对神秘的感叹。但是莱布雷希特在这个交响歌曲中看见了更深的含义：

马勒如何将这么多的感情塞进这么陈腐的一个词的？这个“永远”之谜一直困扰了我数年，直到 1988 年有机会看到维也纳的一个展出，才破解了这个下意识的密码。那是希特勒吞并奥地利 50 周年纪念日，而在展品当中有一张挂着旗子的火车站的照片：“永远的犹太人”。

这就引出了下面的结论：“‘永远’在《大地之歌》中就像犹太人身份在古斯塔夫·马勒身上一样，是那个改变了的自我，那个旧的、真正的马勒，在他生命接近终点的时候所竭力重现的马勒。”

再说一遍，这样的推断没有一点点的证据，它是基于把从唐诗变换而来的歌词里的一个单词，和三十年后的未来所发生的事联系在一起。而永恒是德国浪漫主义最古老的陈辞滥调之一。读者面临如此一个解释上的跳跃，也会有启示：这本书不应该叫做《为什么是马勒》这样一个自问自答，而应该叫做《我的马勒》。而他的马勒在很多方面来说都不是马勒的马勒。

这本书中的事实也不大可靠。当马勒在 1901 年 2 月指挥莫扎特的《魔笛》时，正当这部作品公演 110 周年，而不是 100 周年。作者在整本书中对现在时态的奇特运用也造成了时间上的混乱。莱布雷希特又用随便的并列使得事情更加混乱：“他心里有一个熟悉的画面，”他这样写马勒的第一交响曲，他声称这首交响曲是马勒由乡村音乐记忆得到的灵感——但是这个问题中的画面，莱布雷希特所指的那幅启发了马勒作曲的画面，是马克·夏加尔的画作《乡村集市》，它是 1908 年才完成的，比第一交响曲要晚好些年。

最后是莱布雷希特折磨人的行文。他的故事讲得不错，书的节奏掌握得很好，写得有激情。但是他没有品味。在描绘一位马勒培养的并在艺术成长上帮助过的美丽歌唱家的时候，他说：“当他与她做爱，他就像是一位整形外科医生与一位模特同床共枕，而后者的乳房是前者整的形。”在谈到马勒度暑假的沃尔特湖时，他写道：“破晓前的一个小时，满月蹲在湖上，像一个沉没了的救生圈，肥胖并有些可笑。”莱布雷希特还很容易被愚蠢的渴望诱感到实用性与时事性上去，就像他声明马勒的野心是为了“把管弦乐团从演艺团体变成智囊团。”到处都是这类胡说八道。

懂得一点马勒的读者会很快变得疑心，但是刚刚买了这本书，打算用作一个艰难而富有裨益的主题的入门教材的那类读者，只会被引入歧途。真是令人震惊，这样一位严肃的作家会把这么多的陈辞滥调和传说故事改头换面，并如此简单化地理解它们。很悲哀，入门指导读物的写作水平下降到了一个世纪以前，那时高等文化的作家经常纵容最浪漫化的编造文化迷思

的习俗。

所以这里是给不熟悉马勒的人的几个有案可查的事实：他生下来是犹太人，他的犹太之根一直是他的生命和音乐的一部分；他为了事业改宗基督教，基督教文化深深吸引他，尽管不是在宗教意义上；他的灵性不止是犹太教或基督教，而是源自哲学、异教、和犹太-基督教思想的混合体；他的属灵生活及其永恒的疑问，是他音乐中最重要的主题，从未曾改。他还是一位乐于支持的同事和一位专横的老板，时刻需要又乐意给予，和蔼又残忍，谦虚又野心勃勃。他去世的时候太年轻，才 50 岁，死于被细菌感染所损害的脆弱的心脏。他的交响曲，一直被严肃音乐家所推崇，从未完全地被忽视，尽管他的胜利来临时，他已经死了至少半个世纪。别的更重要的事情，的确还有很多，都可以在他的音乐里找到。

**Philip Kennicott** 是《华盛顿邮报》的文化批评家。

本文原载：The New Republic, 2010 年 10 月 4 日

**Why Mahler? How One Man and Ten Symphonies Changed Our World by Norman Lebrecht**  
Pantheon, 336 pp., \$27.95

《为什么是马勒？一个人和十部交响曲如何改变了我们的世界》作者：诺曼·莱布雷希特（Norman Lebrecht）  
Pantheon 出版社，336 页，\$27.95

鸣谢：季风书讯 合作媒体：

搜狐新闻  
news.sohu.com

搜狐读书  
book.sohu.com

博客  
网易

blog.163.com  
新锐人文生活

文章版权作者所有，欢迎订阅，转载请注明出处和订阅信箱：[shrbooks@gmail.com](mailto:shrbooks@gmail.com)，文章和图片如果涉及版权问题，敬请来信告知。

独立阅读讨论区：<http://www.douban.com/group/duliyuedu/>